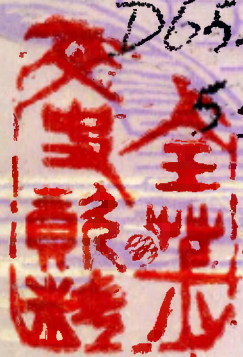


# 全椒文史资料

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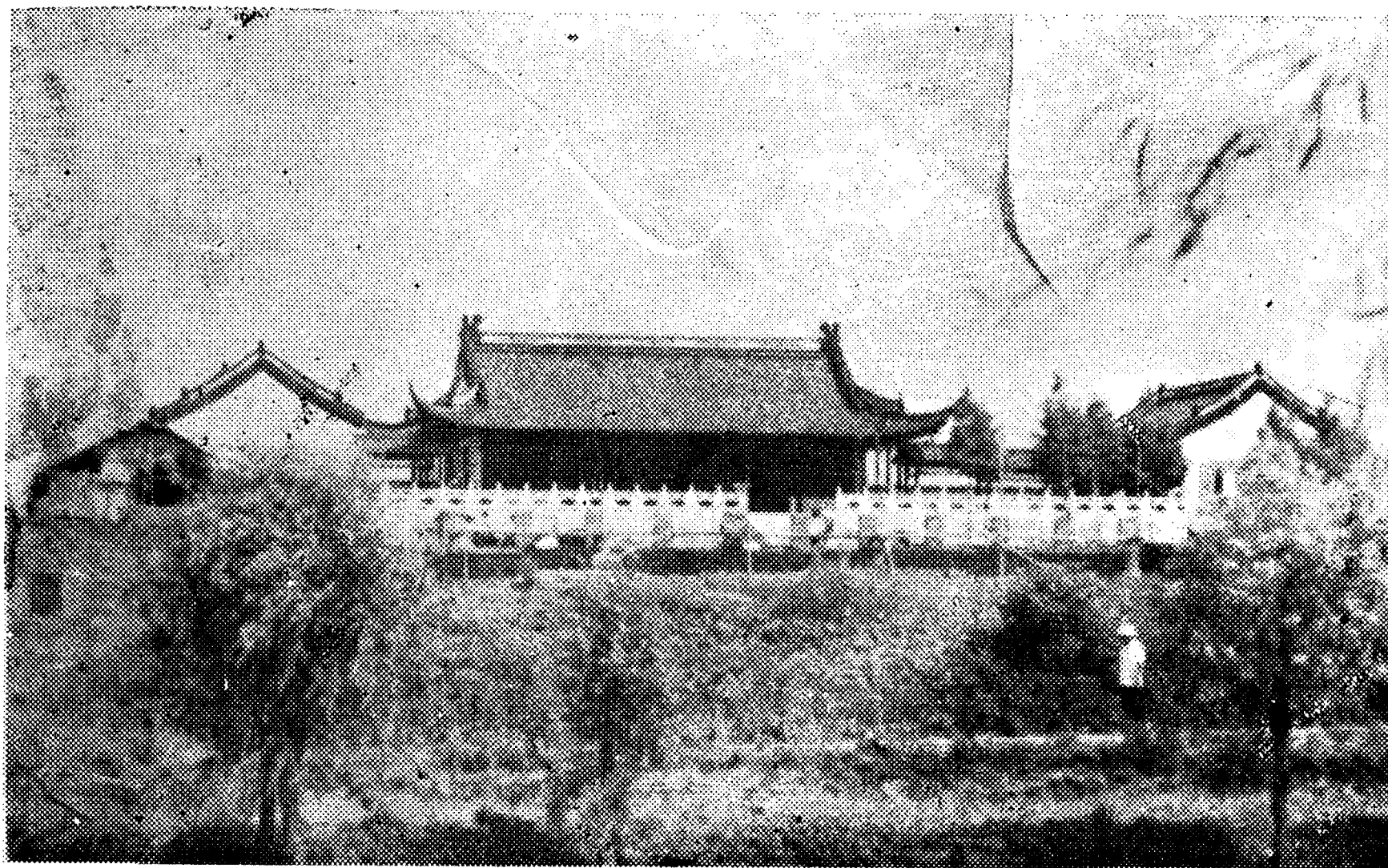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全椒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D652.4

53



兴建中的吴敬梓纪念馆

# 全椒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全椒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5年9月



封面题字：汪岳尊  
封面设计：张炳武  
篆刻：叶松  
绘图：章家骅  
摄影：贾绘  
编辑：潘禹三  
薛健驰  
叶松坪  
吴章家骥  
装帧、校对：张炳武  
胡廉风



# 目 录

前 言.....政协全椒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全椒县抗日战争时期总体形势图.....章家骅

## 统 一 战 线

回忆政训股.....章 达 ( 1 )  
抗战初期全椒县的《团结报》.....王福伟 ( 6 )  
新四军四支队在马厂.....王可宗遗稿 ( 8 )  
潘禹三整理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在全椒的片断.....陈葆经 ( 16 )  
我与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服务团工作队合作的回忆  
.....路国良 ( 24 )

## 抗 日 风 云

八百壮士之歌.....陈德松 ( 29 )  
胜利井的由来——六镇集歼灭日寇纪实.....刘琢如 ( 34 )  
真戈久平被歼记.....董光琰 ( 38 )  
禹拳师空手杀日寇.....杨宜森 ( 40 )  
张桥阻击战.....宋邦柱口述 ( 43 )  
鲁 玄整理

## 民间武装

- 马厂红枪会，黄旗会的兴起与结局……………王可宗遗稿（45）  
吴 坪整理
- 王宗正镇压东乡刀会纪实……………王学铨供稿（54）  
章家骥整理
- 张大鼻股匪被歼记……………王敦厚口述（56）  
潘禹三整理

## 文化教育

### 从望阳书院到全椒中学校

- 建国前全中历程的回顾…陈葆经（59）
- 解放前兴办全椒县农业职业中学经过……………江金惠（68）
- 全椒县最早的电影院……………张田有（73）
- 全椒最早的一份刊物《改良浅语》……………陈葆经（74）

## 实业开发

- 回忆全椒县蚕桑指导所……………常宗会遗作（76）

## 将军轶事

- 罗将军在全椒二三事……………孙梧明口述（79）  
费学义整理
- 张云逸将军轶事……………王延起供稿（83）  
章家骥整理

## 人物志略

- 忆我的哥哥金春祺……………金春林供稿（86）  
吴 坪整理
- 回忆校长印书城……………叶 松（92）

- 怀念阮明先生.....陈葆经(94)  
 忆杨尘因老师.....汪传珠(97)

## 沦陷区见闻

- 全椒县县城沦陷见闻.....吴德迟(99)

## 腥风血雨

- 古河血案——柏承君大屠杀纪实.....陈葆经(107)  
 潘禹三

## 名胜古迹

- 北极阁今昔.....吴坪(114)  
 史迹话神山.....叶松(117)

## 补白四则

- 釜山简介.....(7)  
 怀海外堂兄东原南原.....(116)  
 蜀道吟(九首之一).....(96)  
 一九四〇年元旦试笔.....(5)

## 前 言

全椒初为采邑，汉置全椒县，后县名及建置几经变更，隋复改全椒县。县名沿用至今。

全椒地处江淮之间，古为吴楚冲衢，自然环境优美，山明水秀，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历代人才辈出。清代吴敬梓有《文木山房集》、《儒林外史》等传世名著，蜚声海内外。太平天国后期将领，康王汪海洋，战功卓著，为坚持太平天国革命而献身。明高僧德清，俗姓蔡、号憨山，倡三教一致说。中兴曹溪祖庭，厥功尤伟。著有《梦游全集》、《经说》等行世。

全椒人民朴实、勤劳、勇敢。夙有华而不靡，朴而不俚之称。在抗日战争时期，全椒人民踊跃参加新四军，英勇抗击日寇。解放战争时期，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全椒人民的革命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于1949年元月25日全椒和平解放。

我们本着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推进精神文明建设，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精神，向各界人士征集文史资料。一年来，先后征集了全椒文化教育发展，古迹变迁的史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全椒人民拥护共产党，热爱新四军，进行艰苦革命斗争的史料；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全椒遭到新桂系破坏的史料。我们坚持“存真，实事求是”的原则，经过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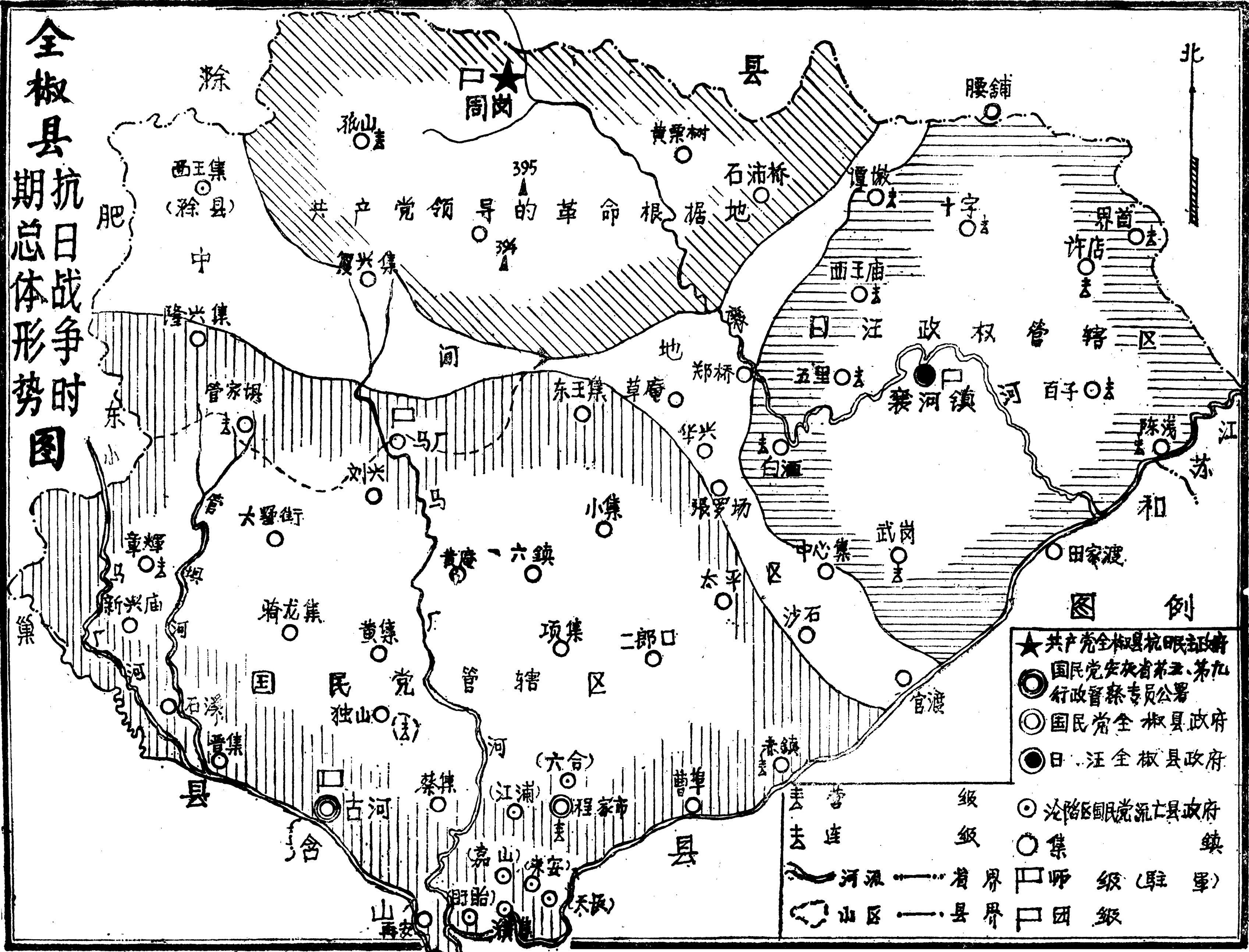


对、整理、汇编为本册《全椒文史资料》《第一辑》。

由于我们汇编文史资料处于开始阶段，限于思想、文化水平、缺点错误之处定多。敬请读者指正，並祈赐稿，使全椒文史资料不断充实，汇编工作不断提高，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政协全椒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全椒县抗日战争时期总体形势图



- 图例**
- ★ 共产党全椒县抗日政府
  - ◎ 国民党安徽省第五、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 国民党全椒县政府
  - 日汪全椒县政府
  - 沦陷区国民党流亡县政府
  - 集镇
  - 乡级 (驻军)
  - 团级
  - 县级
  - 区级
  - 镇级
  - 乡级
  - 团级
  - 营级
  - 连级
  - 排级
  - 班级
  - 连级
  - 营级
  - 团级
  - 师级
  - 军级

# 回忆政训股

章 达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了。十二月南京沦陷，全椒县城也于二十二日被日寇侵占。县城沦陷前夕，一部份国民党军队经过县境向西撤退。县政府和县直机关撤散到县境四乡，县长张其威逃往六安，地方秩序大乱。城内只有少数汉奸在组织维持会，居民四处逃难，青年学生有的向大后方逃难，有的留在家乡。留在家乡的青年看到日寇到处烧杀淫掳，国破家亡的情景，义愤填膺。正在这时，本县革命青年王永在延安学习结束，回到敌后的故乡组织抗日救亡力量，因此政训股很快地诞生。

王永又名王尧燮，南屏乡人，原在南京太平门外小学教书，三七年夏去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于三八年春回到敌后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他走到六安，巧遇刚发表的新任国民党全椒县县长王宗正。王宗正对全椒县人地生疏，两人叙谈之下，知道王永同志是全椒人，表示愿意合作抗日。王到全椒县接事后，整顿地方武装，成立了抗日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司令部内设立政训股，王永同志负责组织。散处在县境内的青年，有不少是王永同志的同学、同事，听说王永同志组建抗日救亡的政训股，大家很快聚集到他的身边，政训股就宣告成立了。这时是三八年三月上旬，地点在赤镇乡四乐村，股长王永，副股长童魁群，下设组织、宣传、总务三个组，组织组由童魁群兼，宣传和总务组分

---

本文作者系来安县农业局离休干部

别由何若人、夏泽民担任。陆续参加的男女青年绝大多数是小知识分子，约有七八十人，现在还能回忆起姓名的有：田国桢、夏泽民、卢其龙、许子展、傅明、何若人、童魁群、韩庸、罗应生、王祖武、韦雨农、印丹英、印绍、张启九、邱功锦、黄平、林廷诈、林世忠、阮业明、王福伟、张弓、吴文杰、马萃群、周建德、赵进、罗世华、陈敏、罗玉珊、陈佩、陈杰……等人。每人生活费一月四斗米，没有零用钱，大家都一样。每日天亮起床，练习抗日歌曲，学习进步书籍如《大众哲学》等。当时生活虽然苦些，但精神饱满，日夜工作，一天步行八十里路，没有一个叫困难。

政训股自始至终，认真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当时的工作重点：一是对县抗日人民自卫军所属的大、中队进行思想工作，灌输保家乡，爱祖国，抗日到底的爱国思想，大队、中队都派有政工人员驻队。一是向广大群众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说明日寇外强中干、抗战必胜的道理，消除“恐日”思想，增强胜利信念；动员群众参加抗日，组织群众成立青抗、农抗、妇抗、儿童团等抗日人民团体。宣传的方式：有时三五人一小组分头到农村，有时集中在县城，利用墙壁用石灰水书写大字抗日标语，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打倒汉奸卖国贼！”等；教唱抗日歌曲：如“大刀进行曲”、“抗日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有时搭简易木台表演话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当时津浦、淮南两线南段都被日寇占领，广大人民很难知道抗日战争消息，政训股在五月份办了一份《团结报》，地点在南屏乡花园大队王金祥家。报社有三人：何若人任编辑，收录延安电台及国民党中央电台所广播的战况，编写稿件；王福伟负责刻写和发行，还有一位负责修理收音机。报纸是八开的，

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只能用油印发行，不定期出版，深受广大群众欢迎。这份报纸发行时间虽然短暂，但它是全椒县在党的领导下发行的第一份报纸。通过一系列的宣传，群众思想认识提高了，前几个月的“恐日”病渐逐消除，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心。广大农民积极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参加县自卫军的人员日益增多，各区的后备大队也相继建立，到处可以听到激昂的抗日救亡歌声，群众与自卫军战士的抗日情绪大大高涨。

一九三八年二月间，一支与党有联系的东北抗日流亡挺进队，官兵约三百人，过淮南路东来，曾到全椒县管家坝、马厂、小集、赤镇一带活动，后去巢县方山，在淮南线南段打游击，发展有近千人。为了合作抗日，政训股与挺进队经常取得联系。当时县抗日人民自卫军已组成三个大队，四个区都各有后备大队，共约三千多人枪。争取团结这支武装坚持抗战，是政训股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政训股虽然对自卫军常备大队、中队都派有得力的政工人员，如田国祯、傅明等，加强对官兵的抗日救亡教育。但这支武装的领导人王宗正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坚持抗战的基本思想上，一时难以统一起来。王宗正一面抗战，一面趁抗日之机扩充个人实力，做官称霸。滁县县政府设在花山，王宗正由于私人对滁县县政府不满，竟在六月上旬派出自卫军攻打滁县县政府，接着又强迫编调东乡界首一带红枪会、黄旗会的人枪。红、黄刀会是在县城沦陷后，地方盗匪蠢起，群众为了保卫生命财产，抗击日寇，自己出钱买武器组织起来的。群众不同意地表示：听编可以，“调”决不行。王宗正不说服教育，竟野蛮地派出常备队，亲自到十字路要武装收缴刀会的枪支，导致发生武装冲突，还疯狂地下令烧掉大盛、大潘一带十几个村庄，枪杀了二三十个刀会会员。王永同志对王宗正这

一系列破坏团结抗日的罪行，事前曾多次提出意见，而王宗正却一意孤行，拒不接受，并对政训股和王永同志心怀不满。这时地方人士和东乡群众一面向安徽省政府控告王宗正破坏抗日屠杀人民的罪行；一面请求东北抗日流亡挺进队主持正义，解除县东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痛苦，因而挺进队开进了全椒县境。政训股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削弱抗日力量，同时防范王宗正对政训股的危害，一面将政训股同志撤到小集东仓房；一面动员自卫军常备大队顾全大局，避免冲突。因而挺进队进入县城，只收缴了一部分倾向于王宗正的自卫军武器。这时王宗正被撤职查办，扣留在古河镇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内，地方秩序渐趋安定。

东北流亡挺进队进入县城收缴自卫军一部分武器后，领导人刘冲竟又违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分是非，不以团结抗日为重，对地方所有武器，采取全部收缴的错误做法。王永同志几次提出意见，刘冲等拒不采纳，反而在东仓房一次会议上对王永、童群等以武力威胁，企图进行打击。同时派出武装要收缴马厂区余德扬的后备大队，遭到余德扬的反抗，未能得逞。王永同志考虑到全椒县及四周环境的形势，为了避免政训股遭受刘冲等的迫害，决定暂时解散政训股组织，待机再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在解散那天，王永同志对我说：“我和田国祯、何若人、许子展、傅明、卢其龙等去延安学习，其余的人分散隐蔽下来，待机再干抗日工作。”后又说：“分散时你最后走，看看有无动静。”（意思是看刘冲等是否来找他）这时已是八月下旬，气候还很热，到了傍晚，政训股的同志都陆续离开东仓后，未见动静，我才和王祖武、赵进三人告别东仓去太平庵，政训股至此结束。

政训股从组建到解散，时间虽短，还不到半年，但它由

于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不畏权势，敢于斗争，在全椒各界人民群众心中，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 一九四〇年元旦试笔

张海珊 遗作

话到平倭喜欲狂，  
俚言不耐任腾骧。  
辽围吉黑输三品，  
汉藏蒙回聚一堂。  
国共同心摧敌寇，  
工农合力振家邦。  
会盟坛上执牛耳，  
四亿神州眉宇扬。

# 抗战初期全椒县的《团结报》

王福伟

抗战初期，一九三七年冬，全椒县城沦陷。一九三八年元月，王宗正来任县长，同时王永同志（全椒人，原名王尧燮，抗大第四期毕业）从延安回全椒进行敌后抗日救亡工作。他们经过协商，决定团结抗日，成立了“全椒县抗日人民自卫军司令部”，王宗正兼司令，司令部内设“政训股”，王永任股长。政训股成员都是男女青年学生及教师。股下设组织、宣传、总务等组。宣传组在农村集镇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除书写标语，演讲，演话剧，教唱抗日歌曲外，还办了一份小报，名《团结报》。

《团结报》社地址，在白汪塘附近王金祥家，第一次出刊是五月十六日。何若人（原名何朝钺）任主编，我刻钢板并发行，夏守余修理收音机，报社一共只有三个人。当时限于物质条件，由何若人收录新华社及中央社发布的新闻，整理后编入新闻栏。何主编稿子，编写后，由我刻钢板，用光连纸经油印机印出，八开二版，每次印一百多份，分到全县大集镇发行点发行。报纸内容：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揭露日寇的罪行与阴谋；说明敌人侵略我国领土，占领的只是点线，只要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团结，抗日到底，一定能获得最后胜利；从而加强全县各族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群众对这份抗日初期仅有的小报，极为欢迎。报纸发出后，争相传阅，鼓舞了全县人民

---

本文作者现为全椒县政协委员





# 新四军四支队在马厂

王可宗 遗稿

潘禹三 整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全椒县城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沦陷。国民党县政府闻风逃跑，地方一时成了无政府状态、土匪蜂起，社会秩序大乱。我们第五区（今马厂区）是多山地带，土匪更加猖獗。当地人士集议，公推国民党全椒县第五区党部书记余德扬为第五区区长，我被聘为区员，区署设在马厂街上。国民党县政府恢复后，承认了我们的区署人员。当时我们工作主要是组织民间武装，维持地方治安，消灭土匪，打击日寇。但是我们的力量薄弱，对抗日形势发展认识不清，地方旧的势力渐渐复活，以致我们抗日工作开展困难。到了三八年中秋节那天，新四军第四支队老八团挺进到我们马厂一带，团长周骏鸣、政委林凯住在我们山根王村，政治部主任徐祥亨住在山根李村。随后老九团也来了，团长詹化雨住三合集、复兴集一带，四支队政治部设在周家岗，四支队军需主任戴××（名记不清，桐城人）住在马厂街北头李鸿禧家。三九年初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总指挥张云逸到了马厂，江北指挥部设在濠沟许村。我们区署从区长到勤杂人员只有六个人，区长在外面多，交办的事情多数由我经手。因此，我与驻军搞后勤的同志经常接触。四十多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回忆新四军第

---

本文作者原国民党全椒县第五区区员

四支队在马厂一带的各部队，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发动群众，打击日本强盗，写下了光辉的诗篇是马厂这块土地上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光荣史实。我年已八十有三，时不我待，仅将亲历、亲见的情况，予以纪实

## 马厂街上军民合作社

自全椒县城沦陷，津浦线南段被日寇占领后，敌人对人民生活必需的物资严密封锁，如布匹、火柴、肥皂、食糖等日用品，特别是食盐，更为紧张。当时食盐全靠小贩冒险从津浦路东偷运过来，贩运的人多了，沦陷区的汉奸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部队，到处设关卡，要小贩完捐，以致过去一块银元买十斤多食盐，涨到了一块银元只买一斤食盐的高价。新四军四支队到了马厂以后，于三八年秋末冬初，支队部的军需戴主任看到这种情况，亲自到我们区署来，为解决当地军民生活及生产资料，倡议筹办军民合作社，集资入股，暂定一百股，地方五十股，部队五十股，每股股金五十块银元。区长余德扬召集马厂街上商人和热心公益人士张茂官等开会讨论，与会人士一致赞成，纷纷报名入股。合作社设在李鸿禧家，社内业务由戴主任主持。戴主任派部队老马同志（名字忘记了）任采购员。老马这个人年纪轻，精明强干，上海人，善于经营业务。他深入沦陷区，采购来各种生活必需品，深受军民的欢迎。特别是那时商贩不敢出门去办货，去时怕土匪和国民党部队抢钱，回来怕他们抢货、征税。自从军民合作社成立，老马出门办货，部队送，回来部队接。商人和小贩看到这种情形，老马一出门，他们就跟着一阵，财货安全，大家都感激地说：“新四军真是我们大救星。”从此，马厂街每逢集期，满街是人，商店架上有货，战乱中出现了繁荣景象。抗战前我与人合股在马厂街上开了一个

小百货店，抗战后，这个小店因不敢出门办货停了业。这次我的小店也复业开了门。回忆起来，那时新四军到哪里，哪里就生气勃勃，人民就有了奔头。

到了一九三九年底，由于国民党在皖东不断地制造摩擦，新四军向马厂以北复兴集一带转移，从此军民合作社停办。停办前，戴军需主任召开了股东会议，公布了营业的盈亏，每股分得纯利二十七块银元。并当场以现金归还了各股股金和分得的利润。当时大家表示，股金收下，利钱全部赠送给设在马厂西观音庵的四支队后方医院。

## 军民亲如一家人

新四军四支队自挺进到马厂一带以后，处处爱护人民，人民也处处拥护部队，军民鱼水情深，亲如一家人的情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马厂一带人民永远难忘。

四支队挺进到马厂后，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协助区动员委员会组织农抗、青抗、妇抗、商抗等群众团体。特别是八团政治部有位年五十多岁、半大脚、大家称呼她“江西老大姐”的同志，日夜辛劳。九月间，他（她）们在一次组织群众工作中，了解到马厂街在六月里一天逢集时，遭到敌机轰炸，被炸死、炸伤的人，无人过问，比即进行调查登记；并将受难者的名册送到区署，以便做好善后工作。接着在街北头基督教堂，召开群众大会，老八团政治部主任徐祥亨在大会上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罪行。徐主任当场拿出现金对死者家属抚恤，对伤者进行救济和治疗。当时受害者的家属万分感激，所有参加开会的群众，都为新四军关怀人民痛苦的正义行为所感动。

三九年农历冬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扫荡皖东时，从滁县

城出来的一股日寇，进犯到复兴集附近。这时街上的男女老幼还未撤走完。老九团为了掩护复兴集街上人民安全撤出，不顾饥饿和疲劳，两天两夜奋勇阻击敌人。在这次阻击战中，老九团伤亡有五位战士。现在复兴集一带六十多岁以上的老人，每谈到那次战斗，无不以沉痛的心情怀念他们，从而更加热爱新四军。

驻在第五区各乡的新四军部队，每逢农村大忙季节，部队官兵帮助农民抢种抢收，突击干活，已成习惯。记得三九年农历五月间，正是麦收季节，一天马厂附近的叶河、山根李、濠沟许、山根王等村的农民，趁着晴天，家家在场上打麦。午后，忽然天下大雨，驻在各村的指战员全部出动，帮助抢麦。他们身上被雨淋得象从水塘里上来似的。指战员只有一套军衣，只好穿着裤头与衬衣，农民们看到这种情形，家家抢着为指战员们洗衣、烘衣。有的老年人看到抢回来的麦子，流下了感激子弟兵的热泪。

三九年春节、中秋节的两次联欢，充分表达军民亲如一家人的诚挚感情。三九年春节快到的时候，马厂附近驻有部队的各村庄，不约而同地推派几位老人为代表，向部队的领导说：

“你们部队到这里，我们开门睡觉，今年又丰收，人人高兴。春节到了，我们请指战员开开欢（餐聚），鸡、鹅、鸭、猪家养的，鱼是塘里长的，糕点是家做的，不花一分钱。你们部队给养困难，不要再回请我们。”领导同意了，从年初一起，各村请各村的驻军，各家联合轮流请，一直请到年初七。到了初八那一天，各部队的司务长同志，在村子上挨户打招呼请农民，一直吃到农历正月十三日，每天晚上真是“家家扶得醉人归。”村上有路远的亲戚，他们那里未驻过新四军，当他们来村上拜年时，看到这里军民团结的情景，惊奇地说：“过去说‘秀才遇

到兵，有理讲不清’。你们这里军民比一家人还亲，真是奇事。”三九年是丰收年，中秋节还未到，各部队司务长在各自驻村向各户打招呼说：“中秋节我们联欢，猪、酒我们部队办，别的菜你们办。”于是各村各户杀鸡、杀鸭、捉鱼、挖藕、摘菱角，炒花生、瓜子，男男女女，喜笑颜开，忙得不可开交。中秋晚上，联欢地点在稻场上，桌子、门板、竹床上面摆着酒菜，猜拳的、行酒令的、唱的、跳的，拉胡琴的，捉迷藏的，追瘸子的，笑声、歌声洋溢四方，军民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这是马厂一带从来没有过的事。

老八团、老九团等新四军的部队挺进到马厂一带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初期表面上讲国共合作抗日，实际上对共产党、新四军处处限制，克扣给养，部队衣食紧缺。三八年冬天到了，地方抗日群众团体和区长余德扬，发动各乡劝募大米一千四百担（每担老秤一百六十斤），都舂熟过筛。余德扬自己捐出二百担。三九年夏，九团军需长段忠良来说：“三合集驻军缺米。”余德扬虽肺结核病发，仍带病奔走，募集糙米二百担，交与该团自运。接着又在全区募到布鞋三千六百双。积极拥军、热心抗日事业的张茂官，与商抗在街上募得棉絮三十床，现金三百元和食糖、鸡蛋、豆皮等食品送给后方医院伤病员。老八团林凯政委和政治部徐祥亨主任亲自来区署致谢。这时驻在古河的安徽省第五行政区专员李本一知道余德扬为新四军筹募粮食与衣物后，几次从电话中警告余德扬，同时命令各乡不得为新四军筹粮、筹款。余德扬秉于爱国大义，置之于不顾。到了三九年冬，国民党政府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制造摩擦，马厂一带形势趋于紧张。约在农历十月下旬，张云逸参谋长亲自来区署对余德扬说：“现在时屈寒冬，我军还有六百套棉衣无着，请你动员地方设法解决。”余德扬当天晚上通知商抗及各

多有影响的人士，在二湖冲杨村杨毓璜家楼上开紧急会议，筹募寒衣。余德扬带头捐出二百元，表达拥军的诚意，很快完成任务。计募得六千元，交给八团军需主任刘淑行，在街上成衣店订购棉衣六百套，（每套十元）。这又被李本一知道了，把区长余德扬叫到了古河专署，当面斥责。余以抗日一家，拥军无过反驳。但他在气愤之下，肺病大发，当李本一面吐血不止，才免遭看押。余区长被抬到本乡桥头庵的庙里治疗。这时余德扬的区长被撤职，区后备队被编到十纵队第三支队。余德扬病情日益严重，驻周家岗的四支队政治部知道后，曾派人于夜里到桥头庵，（这时已是四〇年二月，国共在马厂区已公开冲突。）要抬余德扬到周家岗部队医院治疗；耐余病情恶化，无法行动作罢。几天后，余死于桥头庵中；我这时也回家务农。解放三十多年了，现在地方老人，想起余德扬拥护抗日部队、爱国爱乡的正义行为，无不怀念。

## 军民合作打日寇

新四军四支队各部，挺进到马厂一带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断在津浦线上和全椒县境内打击日寇。回忆三九年七月上旬一天，我们区署收到派驻在县城内工作人员的情报说：“城内日伪军约三百多人，向赤镇方向进犯，但城内敌人仍在拉伕子、扎担架。”我们立即向江北指挥部汇报，张参谋长说：“这是日寇声东击西，表面向赤镇进犯，目的是妄想扫荡马厂。”果不出参谋长所料，第二天日寇与汪伪军计八百多人，从县城出动，分成两路，一路由白酒岗、华兴集，一路由郑桥、东王集向马厂街进犯。进犯赤镇的日伪军转向小集，黄家庵，占据马厂的西面龙山。江北指挥部早作了布署。马厂区后备中队熟悉地形，派一分队做向导，两个分队搞后勤。这时各地的农抗、妇

抗也动员起来，各路部队严阵以待，准备打击来犯的敌人。天刚亮，从华兴集来犯的日伪军，遭到我军的伏击，地雷爆炸，狼狈回逃，由东王集一路来犯的敌人，刚进入破山口，我埋伏在两面山头的部队，枪炮齐发，敌人乱成一团，仓皇逃命。占据龙山的敌人，一枪未发，掉头回逃。战后，江北指挥部参谋孙乐宜，在庆功大会上说：“这一仗，我军缴获日伪军步枪三百支，迫击炮一门，打死打伤日伪军一百余名。我军在军民密切合作下，在领导正确指挥下，无一伤亡，获得全胜！”三九年农历冬月初十日，日寇集结近万名的兵力，从津浦、淮南两线，扫荡皖东，妄图消灭新四军第四支队的主力。部队领导早已得到情报，作了部署。我们区署的后备大队，开到复兴、三合一带，靠扰老八、老九两团，替他们做向导和动员群众撤出火网。当滁县的日寇经施家集向我马厂、周岗、三合集、复兴集、马厂街等地进犯时，我新四军展开了激烈的反扫荡战斗，节节阻击。在复兴集附近的黎家河、岗子扬等村一带，利用旱河有利地形，顽强堵击。仅这一处，消灭日寇一百五十余人。老九团乘胜追击，一举收复了安徽省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所在地——全椒县古河镇。军威大振。为皖东抗战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

## 廖秘书揭露国民党顽固派

### 克扣新四军粮饷的阴谋

新四军四支队各部到马厂以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新四军有险恶的用心，对新四军的供给处处刁难，蓄意克扣，以致广大指战员生活困难。三八年农历十二月中旬，安徽第五区专员李本一到马厂来视察，在街北头空场搭了台，召开



群众大会。邀请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派人参加，指挥部派廖秘书（名字记不清）参加。李本一讲话后，廖秘书讲话，回忆那天廖秘书讲话主要内容是从国内外形势讲到八路军在华北各地英勇抗战的辉煌战绩，新四军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持久战的重大意义。接着揭露国民党对抗日部队待遇不公平，对国民党嫡系部队粮饷充裕，对新四军给养却处处刁难、克扣，现在冰天雪地，我军还身穿单衣。廖秘书质问道：“国民党不是讲民生主义吗？为什么对新四军不讲民生呢？现在我们后方医院伤病员，最低疗养条件都没有，惨不忍睹……”讲到伤心处，廖秘书声泪俱下。台下几千群众，鸦雀无声，无不满腔义愤，怒目看着台上的李本一。廖秘书长达三小时的讲话，教育了广大群众，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行径。李本一在台上坐立不安，台上还有全椒、滁县两县县长，低头不语。最后，李本一向廖秘书表示，将情况向长官部汇报了事。



#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在全椒的片断

陈 葆 经

## 一、政训股揭开了全椒县国共合作的序幕

抗战的烽火燃烧到祖国的每一个角落，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的存亡，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的主张，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

民国二十六年冬月二十日（1937年12月22日）日本侵略军两角部队占领了全椒县城。次年三月，本县青年王永同志由延安回来，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当时全椒县长是王宗正，兼“县抗日人民自卫军司令”。他原是军人，因此不愿人称他“县长”，要称他“司令”。王永同志和他见面后，首先提出要组织青年抗日，（当时学校停办，失学青年甚多）王宗正便决定在“司令部”内，设一个政训股。王永任股长，童魁群同志任副股长。一时男女青年踊跃参加。如时生、罗应生、何若人、田国桢等。政训股内设总务、宣传、组织三个组。何若人并负责主编一份油印的报纸《团结报》。

当时县抗日人民自卫军司令部下设二个大队，“三三”编制，计六个中队，十八个分队。这支队伍里的官兵，有些是安清帮师徒关系，且各自为政。自从政训股人员分派到大、中队当政训员，便积极在部队中宣传合作抗日，发展民先队员，从而使这支乌合之众的地方武装，成为初步有组织性、纪律性的抗日队伍，因而能与当时各种社会力量合作抗日。政训股起着主导

作用。

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1938年5月16日），日军两角部队第一次退出县城，王宗正带着部队，王永同志带着政训股同志立即赶进县城，协助人民重建家园。王永同志提出要惩办汉奸，发扬民族正气，王宗正赞同了，便以政训股为骨干，发动人民清查县城沦陷期间组织“维持会”的大小人员，半个月时间内，通过群众检举，材料核实，逮捕了一批“维持会”分子，分别其罪行轻重，该判死刑的，立即执行；该关押的，看管教育；该警戒的，责以军棍示众。

他们对失学的青年，则办学施教。凡是愿意抗日的各阶层人士，一律加以团结合作。如马厂区区长余德扬，思想进步，英勇抗日，政训股同志与他经常交心，对其部下讲时事。

不久，王宗正因对东乡人民自发武装——“红枪会”问题处理失当，且不肯接受王永同志的合理建议，被撤职而离开全椒，王永同志也重回延安。一九三八年九月，由汪心森来接任县长了。

虽然如此，政训股在全椒已揭开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序幕，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 二、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东进 为全椒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民国二十八年（1939）农历年初九，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分为两路向东挺进。一路由副团长汪道涵率领八位同志从六安出发，经合肥的梁园、栏杆集及全椒的古河而进入全椒县城；一路由团长程启文、副团长郑时若率领三十几位同志由六安出发，经合肥的梁园、全椒的大墅街而进入全椒西北乡周家岗。

当时的全椒县县长汪心森原任安徽省保安处科长。抗战开始，新桂系执皖政，省府由安庆迁六安，全椒与省会之间被淮南路隔断，成为游击区。据该团团员张式同志（现安庆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回忆：战地服务团到全椒来，认为“当时该县县长汪心森系本县人，对我军态度比较友好，是我们团结争取的主要对象”（见82年第一期《淮南革命史资料》选编）。因此战地服务团为了便于做好团结争取工作，选择了当时随汪心森任“第二科科长”的禹成栋家（原地名碾坊巷，今名新华路）为住地。一则他家房屋高大，有多余的空屋；二则他家来往的上中层人士较多。他们住下后，首先结识了韦雨农、邢维敏等。至今邢维敏还记得有个团员赵永鸮患痔疮，曾请邢的大伯配过敷药的。

每星期一早晨，战地服务团成员和国民党县政府成员于县城积谷仓内在一起做一小时“纪念周”。县长汪心森讲话以后，汪道涵同志以生动的语言，诚挚的感情，简短而扼要地讲抗战道理，句句深入人心，提高了人们合作抗日的认识。一天汪心森请服务团全体同志和一些地方上人士吃饭，有邢维敏在座。据邢回忆：饭后品茗闲谈，汪道涵同志提议大家一同唱抗战歌曲，他站起来打拍子，教唱了《义勇军进行曲》、《芦沟桥小唱》、《大刀进行曲》等等，把官场酬应的场所一变而为宣传抗日的阵地。

在此之前，全椒城里有一个青年自发组织——“全椒青年救亡服务团”团长金道平系金陵大学学生。他集合了陈葆经、金克明、杨宜麟、韩治政、金道广、雷天鸣、杨寿宗、黄治和、董平等二十余人，以演话剧、写大幅标语、出墙报、编抗日小调，举行时事讲座等方式宣传抗日。这个团的团员与战地服务团的八位同志是从不接近的。而汪道涵同志却不止一次地到服

务团驻地——县财委会大楼下，从听“时事讲座”到两次为这个“讲座”主讲，并且利用开场与散场之前后时间教唱抗日歌曲，从而争取了县服务团许多团员。如雷天鸣、杨寿宗、黄治和等经常和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促膝交谈，往来甚密。

战地服务团来全椒不久，便团结了不少进步青年，如王连甲（后改名张凯，周岗战役中牺牲，追认为烈士）周舜哲等，不久，城内的“妇抗”、“青抗”先后成立了，还组织了一个“襄河镇文工团”。汪道涵同志能自编、自唱，战地服务团的同志皆多才多艺，通过宣传、鼓动，使群众的抗日情绪日益增长。

战地服务团用石灰刷写大字标语，在全椒中学门前墙上，刷上“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十个大字，引起了该校训育主任刘伯绰怒气冲冲地来质问。该团一位王渠方同志作了正确的解释：“蒋委员长能抗战到底，我们就要拥护。”在一次会上，县党部、县政府发言人强调了“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汪道涵同志针锋相对，口若悬河，宣讲“抗战到底”的意义，听众无不点头称是。因而战地服务团在县城的宣传、组训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由团长程启文、副团长郑时若二同志带领到周岗的一部分团员住在陈郢子，分成几个小组，每组三至五人，走村串户，刷写标语，进行家庭访问、到街头演唱、搞社会调查，还通过教儿童唱歌，与群众逐渐水乳交融，建立了团结抗战的感情。在他们召集开会时，群众奔走相告，相约而来；散会后还恋恋不离会场，拉住团员们问这问那。因而不久“青抗”中就吸收了戴星、蔡筱波、姚孝谦、高克俭等一大批青年；“妇抗”中吸收了马宝珍、何虹霞、杨素琴等一大批女青年。农抗、商抗也相继建立。儿童团也组建了，并成立了自卫武装。

民国二十八年（1939）春，国民党周岗区长王元臣，奉命限制群众抗日活动，但战地服务团却以团结合作为重，经常主动与之商谈，规劝他与服务团并肩抗日。一天，王的大儿子王天保结婚，大办喜事。战地服务团同志也去祝贺，并利用贺客盈门的大好机会，向国民党的大小官员宣讲“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把喜堂变成了课堂，为贺客们上了一堂政治课。

战地服务团在全椒，尤其是在周家岗，时间虽然不长，但是通过宣传、组织，为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强有力的基础。

### 三、新四军救死扶伤，鼓舞了军心， 激励了民心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初七（1939年4月26日）拂晓，（距日军第一次退出县城11个月零10天），日本侵略军西野军团两个分队由滁县向我县城进犯。这时县长汪心森正在召集会议，闻报后，即亲率县自卫军一个大队和县政府全体人员，由白汪桥向西撤退。为了掩护县政府人员退却，县自卫军副司令罗国宁，责无旁贷地率一个大队阻击日军，在护家庙与日军相遇，开始战斗。

罗国宁（字季咸，贵州人）抗战前毕业于中央军校，在安庆集贤关的“社训总队”受过训，毕业后派来全椒任“社训教官”，办理壮丁训练。自王宗正来任全椒县长兼抗日人民自卫军司令起，罗即被任命为“副司令”职。

这次护家庙一战，罗国宁不幸身中敌弹。子弹穿过腹部，擦破了大肠的边缘，流血不止。还有十几名官兵，受了轻重不同的伤。

罗国宁受伤后，自卫队官兵四散，县城里的县政府早已南迁殆尽，受伤人员，无人过问。适与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汪道涵所部相遇，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们便借用民间门板，把所有负伤者抬送到黑石头（东王集至三合集间）的新四军七团医疗队，连夜又把门板送还给群众。

在设备简陋，药物不足的情况下，新四军医院为罗国宁等精心治疗，精心护理。新四军的政工人员，一次又一次地为伤员读报，和伤员拉家常，进行合作抗日的教育。团、营首长还先后到病房予以慰问。新四军对他们免药费、免伙食费，并发给生活日用品。罗等十余人休养达三、四个月之久，伤好后才被护送回到当时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罗继续任其副司令职务。

这件事在群众中传为美谈，新四军在群众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接近边区的乡、镇中的青年们，踊跃参军，为壮大新四军抗日队伍奠定了基础。

这是国共合作在我县的一次典范。

#### 四、在国共合作中，民主人士、县长

##### 朱遂，做了积极的工作

民国二十八年（1939）6月，县长汪心森被免职，接任的是朱遂。

朱遂、字旦复，湖北省当阳县人，早年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大革命时，响应北伐号召，在25师政治部工作，后调第四军任军训处长。一度任广东龙溪县乡政实施处主任（即县长）。抗战开始，他到大别山，任21集团军48军政治部中校秘书，五十五岁时来全椒任县长。

朱遂县长生活简朴，到古河时，仅穿一套土布灰衣，背一个背包，带一把纸扇。全椒的古河青年们，于盐仓开了一个欢迎会，会上，朱遂表示要与全椒人民共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抗战到底的决心。次日他到了县政府所在地——程家市大汪村，在安排人员时，大刀阔斧，把原有的县政府秘书、科长、办事员中一些不称职的人一一进行撤换。以进步青年黄宜生为秘书，在进步的广西学生军中，选择了陈镇东、励功森等先后任科长、区长，在政工队中，选择了李鸿渠任区长；并向21集团军政治部要了喻正刚、覃冠林、李兆麟（当时才十六岁）分别担任科长、督导员、区长等工作，并选用了地方青年彭钧林、江全等，使当时的县政府面貌一新。朱遂经常步行四乡，访察民情，激发民气，一扫历任县长前呼后拥、耀武扬威的旧作风，因而所到之处，和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当时省、县皆有动员委员会的组织。县动员委员会由县长兼主任委员，而实际工作，是由指导员去做的。当时全椒的指导员是王若水同志。动员委员会下设有工作团，团长李振农，副团长金诚，团员二三十人，活动在县境黄庵、广平、再安各地。民国二十八年（1939）夏，日机轰炸广平后，县工作团全部出动，进行善后工作，召开群众大会，宣讲防空常识，这天新四军还派代表参加。国民党县党部派人向县工作团提出质问。工作团理直气壮，以“合作抗日”予以答复，使来者无语而回。

县工作团趁热打铁，在卜集又召开了一个大会，斗了一个贪污的保长，在群众中更树立起威望来。

由于县长朱遂的支持、配合，几个工作团曾在石溪斗争过放高利贷的大地主，并宣布了减租减息；在赤镇处决了查获红土（鸦片的一种）隐瞒不报的违法区长；在古河处分过私运肠



衣资敌的奸商，而对于爱国、爱乡，抗日的人士，则团结合作，共同抗日。

未久，国民党便切断了对新四军的供给。当时周岗区署，为了开展抗日工作，区长覃冠林，（现名秦超）区员滕野翔积极支持新四军筹粮筹款，组织训练群众，集中武装，做了许多军民团结抗日的工作。

十月间国民党的《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公布了，摩擦专家们便蠢蠢欲动。十二月间日军扫荡古河，专员李本一带一营人逃到和县善厚集。新四军四支队九团一举收复了古河，体现了团结抗日的精神。尔后，李品仙继廖磊主皖政，召开反共会议，决定对省动员委员会系统包括各个工作团、政工队等，一律调省集训。国共合作从而遭到了破坏，进步人士，纷纷出走，还有些地方武装自愿随之弃暗投明的，参加了新四军。

也就在此时此刻，进步的县长朱遂，在高吟着：

“去去天涯任所之，  
行行东顾欲归迟。  
九旬义母垂慈爱，  
万户灾黎系梦思。  
两袖清风两行泪，  
半肩行李半囊诗。  
去时却比来时好，  
杨柳依依送别离”

的时候，而告别了全椒人民，被关押到当时的省会“立煌”了。

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全椒的国共合作被破坏了。中国共产党在这块土地上播下的革命种子，却从此生根萌芽，茁壮成长。

# 我与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服务团

## 工作队合作的回忆

路国良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间，津浦、淮南两线南段的日本侵略军，集结兵力，分三路扫荡皖东地区。当时驻在定远县藕塘镇及滁县、全椒县边境的新四军各部，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奋勇杀敌，于周家岗、太马厂一带给进犯日寇以沉重打击。日寇进犯古河时，国民党安徽省第五行政区专员李本一率队打了几枪，逃亡到和县善厚集，古河沦陷。新四军四支队老九团趁胜猛攻，一举收复了古河镇。老九团指战员为了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随即撤出古河，移防到西北乡的大墅街驻防。四支队政治服务团工作队队长戴贤忠率领全体队员，随着部队也进驻大墅街。

大墅街当时属全椒县大沙乡、乡公所在章辉集，乡长李玉珊，我是副乡长。老九团和工作队到大墅街驻防的前两天，我们知道了消息，就积极准备欢迎。十二月廿四日，我们乡公所人员、大墅街学校师生、地方开明人士和群众等四百多人，整队到骑龙集迎接老九团和工作队的到来。沿途贴着欢迎标语，鞭炮齐鸣，团长詹化雨、政治部主任吕青、工作队队长戴贤忠等和欢迎人员亲切握手，边走边畅谈这次收复古河镇的辉煌战果，军民情感，水乳交融。元旦后，工作队分组派往石溪、黄家庵、大马厂、程家市和大墅街等乡镇工作。

---

本文作者现为全椒县政协常委

国民党对待新四军的待遇是不公平的：部队指战员缺食少衣、生活非常艰苦。距离四〇年元旦只有四五天了，有的战士还没有布鞋穿。我们乡公所人员协同工作队同志开展宣传，发动地方爱国人士筹募粮食和肥猪，慰劳从前线胜利归来的子弟兵。计募得大米约二百石（一石合一百五十斤）、肥猪八十头，布鞋近千双，群众敲锣打鼓送到团部。

为了庆祝元旦，准备白天开会，晚上演话剧。我帮助工作队向群众借材料，在街南大塘底子搭了一座讲台。从此，我与工作队同志几乎整天在一起，认识了叶珍、计非、石群、马玉顺、黄启等队员。在扩充兵员，组织群众，筹粮筹款、劝募鞋袜等活动中，他（她）们与我经常接触，做到密切配合。元旦后不多天，老九团移防到滁县、全椒、肥东边界。工作队队部移到管家坝，各组仍留在各地坚持工作。

一九四〇年春节前，工作队叶珍（女）组长率领计非（女）、石群（女）、黄启、马玉顺等，从大墅街到章辉集街上工作。我家住在章辉集街上，他们住在乡公所，后迁到我家对门路定魁（我的大伯）家住。我们相隔只有十来米，晚上，他们经常到我家来玩。我们谈话的内容，从抗战形势到地方情况，从个人理想到生活琐事。时间长了，我们开诚相见，无拘无束。这时他（她）们的生活艰苦到一定的程度，吃饭有时没有菜，化点盐水当小菜，穿的是家织的老粗布单衣，多数打了补丁。寒冬腊月，还穿着草鞋在乡下跑，住在两间小草屋里。但是他（她）们一早起来学习、唱歌，早饭后就积极工作，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组织群众参加农抗、妇抗、青抗、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他（她）们虽然生活苦，工作忙，但人人精神振奋，终日喜笑颜开，充满着革命乐观情绪。这种忘我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一家三口人。我母亲和我爱人都是乡下

人，记得我母亲说：“这些年轻人，吃不好，穿不暖，还这样手不离书本用心念书，天天往乡下跑，真象铁打的人一样。这样冷的天气还穿着布草鞋，要是妈妈看见了，心里该有多么疼啊！”还常常教育我和我的爱人要向他们学习，要帮助他们。我和我的爱人也经常对他们说：“生活上缺什么，尽管到我家拿用，衣服来不及洗，拿来我们帮你们洗。”春节到了，我邀他们一组人来我家作客，大家齐动手，做菜、煮饭、烧茶，热热闹闹，亲如家人。最使我难忘的是元宵节那天，刚好戴队长也来了，我请他们到我家吃元宵。因为是炒的元宵，大家先用筷子夹着吃，后用手拈着吃，吃热闹起来，便抢着吃。由于供应不上，大家一齐跑到厨房，站在锅边候着吃。那一次闹的最有趣，现在我还记忆犹新。他们平时教我唱抗日歌曲，把《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章》送给我学习，他们把我当成同志看待了。

这时，安徽新桂系李品仙在大江南北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反共。安徽第五行政区专员李本一在古河镇积极策划反共活动。一时在李本一控制下的古河一带，党组织和进步的抗日群众团体、进步青年，纷纷进入民主地区。但四支队政治部服务团的工作队仍驻在各乡坚持工作。队长戴贤忠和科长江枫以及蒋可、曹奎等同志不断来章辉指导工作。这时古河的反共气焰日益嚣张。农历二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队长戴贤忠叫我到管家坝去谈谈，晚上在队部里，戴队长对我谈了当前国内外抗日形势后又说：“我要求你两件事：一是继续支持我们同志的工作；二是你知道有不利于我们的情况，请你能及时告诉我们。”我当即表示说：“请你放心，一定做到。”以后叶珍、石群等同志每晚来我家时，总要问我外面有什么情况。

农历三月中旬，田里的早大麦已经出穗时候，专员李本一

召开古河镇四周的区、乡长紧急会议，乡长李玉珊病在家里，叫我去参加。会场在专员公署的小会议室里，外面警戒森严。李本一在会上大肆污蔑共产党、新四军，叫嚣要消灭共产党、新四军以后，当即下令：“各区、乡、保要挨户清查，凡有共产党、新四军人员，一律逮捕，不要解送，就地处决。处决方法：一不准枪决，二不准刀杀，要一律事先挖好土坑，用铁丝或绳索勒死后埋掉，不得留痕迹，我派特务队协助执行，如有泄漏消息和包庇的，同样处理。”李本一还未讲完，我思想翻腾。我想大敌当前，怎么自家人打起自家人呢？这样下去，抗日前途如何得了！共产党、新四军，为了抗日救亡，不怕苦，不怕死，为什么对他们要下此毒手呢？更想到工作组同志马上就要被杀害，他们有什么罪呢？同情、不平、担忧，一时头脑里似大海波涛。我暗下决心，要送信给驻在章辉集的一组人。

散会了，李本一早在街东姜顺兴饭馆准备了饭菜，叫我们跟他一同去吃晚饭。一出专员公署大门，转脸西看，太阳只有丈把高，这时我心急如焚，暗想我今晚如不回去告诉他们，明天他们即有杀身之祸。于是我对李本一说：“我母亲病危，无人照料，我不能吃晚饭，要回去，一面将会议精神转告乡长李玉珊；一面回家照料母亲。”李本一刚一犹豫，旁边的马厂乡乡长王石志顺口代为证明说：“他（指我）母亲是病重。”李才同意点头，我如箭脱弦，当晚奔回章辉集。

古河镇距离章辉集有四十华里，天已快晚了，为了争取时间，避开熟人纠缠，我抄近走小路。一个人越走越急，天色黑下来，路旁麦穗被风吹得沙沙响，又怕起来，到章辉时已经是近十二点钟。叶珍、黄启还未睡，可能估计到这次会议对他们不利，听到我喊家里开门声，叶珍随即过来跟着我进家，问我

有什么情况。我拉着她到街后荒地上讲了开会的情况，并向她建议：一、要这里同志即刻全部撤离；二、立即派黄启向戴队长报告。深夜我含着泪水把全组同志送上街北的大路，回来以后，我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考虑到驻章辉集的小组同志走了，其他各集镇的小组情况如何？我又如何向专署交代呢？第二天拂晓，我到了李玉珊家，告诉他开会内容，并说驻章辉的工作组全部走了，不知去向，叫李玉珊去回报。我又立即去管家坝看看工作队是否走了。到管坝街时，街上人们表情紧张，惶惶不安，科长江枫正把街上群众集合在礼拜寺前空场上开会，散发《告皖东同胞书》。江枫科长在会上控诉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恶行为，《告皖东同胞书》里揭发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还记得上面写有“……办干训班，上摩擦课；黑暗重重，屈指难数；官官相卫，……”等句。会刚结束，江枫科长和一部分工作队队员向北转移，我想找他们了解一下情况也来不及了。这时李本一的特务便衣已到管坝街南头，赶集的人四散回家，这班特务扑了一个空，我暗自高兴，但又为驻在其他集镇的工作队同志是否都已脱险而担忧。一九四九年春，江北解放，戴贤忠写信告诉我，那次二十多位工作队同志都安全脱险，未遭到反动派的毒手。



# 八百壮士之歌

陈德松

**编者按：**陈德松同志是我县章辉乡人。现年65岁，身体健康，精神矍铄，现为政协全椒县委员会委员。今年在政协全椒县委员会与县委统战部联合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上发言，追述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在上海“四行仓库”英勇抗击日寇的经过。与会人士深受教育，为使全椒广大群众详细了解“八百壮士”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现将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政协报》所载《八百壮士之歌》一文全文转载，以征史实。

一九三五年，我在国民党八十八师二六旅五二四二团当兵。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晚一点，我们师接到上级命令，从无锡乘火车至上海站，七点左右，奉命跑步进入上海宝山路一带阵地。

八月十三日，我们奉命开始向日军反攻。当时日军气焰嚣张，宣扬六个小时全面占领上海，六个月占领全中国。日军用飞机、大炮掩护，从上海吴淞口登陆。

十一月，由于上海吴淞一带是平地，守卫在那里的国民党部队伤亡太大，蒋介石遂下令大部队后撤，于是师部召集旅、团军官开会，问谁带一个团留守闸北，抵抗日军，掩护大部队

后撤。当时任旅部参谋长的谢晋元站起来说：“我愿留下。”后决定留一个营的兵力作掩护，因当时营长杨瑞和受伤，委任谢晋元为团长。晚上十二点左右，我团奉令转移至“四行仓库”。谢团长对我们说：“大军已撤退，我们现在好象是无爹无娘的一个孩子，四面受日军包围，但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们是中国人，这就是我们的根据地！只要我们有一个人在，也要和日本鬼子拼到底！”

“四行仓库”是六层高的建筑，靠苏州河北岸，一河之隔，是英、法租界大楼。全仓库长一百二十米，宽十五米左右。当晚谢团长查看了地形，命令把所有门窗用麻袋装土堵上，并留有射击孔。全大楼火力兵员当晚就配备就绪。这时日军并不知道我们在“四行仓库”阻击。

第二天早上五点，日军成队向西追击而来，当接近“四行仓库”时，团长下令开火，全楼所有火力一齐射击，日军受突然攻击，队伍无掩护，伤亡惨重，死伤二百人左右。日军虽然前进受阻，但后续部队立即就组织几倍于我们的兵力反攻。十点左右，日军增援部队上来。我军东南方向受日军火力封锁，西北方向受日军重兵包围。当日军发动第二次猛烈攻击时，团长下令停止用枪射击。等日军攻到楼下，我们以成捆手榴弹消灭敌人，日军进攻又失败了。下午一点，日军把西北方向楼下小房全部浇上汽油烧着，并发动第三次进攻，浓烟滚滚，好象全上海都在燃烧。当时成千成百的中外人士在苏州河南岸大楼上观战。由于东南是英法租界，日军不敢放炮，怕打到租界不好办。于是，在谢团长指挥下，我们一面阻击，一面把两个自来水龙头用帆布袋管接上扑灭大火。下午五点左右，大火被扑灭，日军进攻又告失败。晚上八点左右，靠楼东租界方向，一个记者通过英租界帮忙，送来一个字条，问我们有多少人，团长



答复：我们有八百人，当天阵亡二人，伤四人。

第二天上午八点左右，日军发动第四次进攻。为了节约子弹，等敌人接近大楼时，我们又用手榴弹把敌人打退。中午，谢团长在全楼阵地看望战士，并拍拍战士肩膀问：“你们饿不饿？”战士们豪爽地说：“我们就是再打几天都不饿。”谢团长高兴地说：“你们真是中国的好男儿。”下午五点左右，敌人又发动第五次进攻，同样遭到失败，这时日军在楼下的死尸已遍地都是。

交战之际，上海各界团体已派人和万国商团谈判，通过英租界把慰劳食品用布袋装好，用绳子摔到我们这边，我们在一楼边打一个洞，派人抢运食品，当时阵亡三人，接到食品后，对全营战士鼓舞很大。

第三天日军向国际上宣布，上海全部被日本占领。但当天日军对我们的第六次进攻又宣告失败。晚上十点左右，女童子军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从苏州河南岸泅渡过河，把一面国民党政府的国旗送给我们。

第四天早上四点左右，谢团长命令我和另外两名战士，把我们的国旗升在“四行仓库”六层楼顶水泥台一个铁管旗杆上。日军发现这面国旗，发动疯狂的第七次进攻，并用机枪猛烈向我国旗射击。这时谢团长从六层楼带两个卫兵一直下到一层楼，向大家喊话：“弟兄们，你们要和国旗同存亡，誓死不要投降，狠狠消灭敌人！”在苏州河南岸大楼顶上，有成千上百群众观战，用帽子、手巾向我们呼喊，并用黑板写字给我们报信，标出日军行动和进攻情况、时间。到下午两点左右，日军士兵已成批成批倒在楼前地下。

下午五点，许多中外记者冒险来到“四行仓库”采访，谢团长坚定地告诉他们，八百壮士坚持抗战，决不后退。随后报

纸上登出“四行孤军八百壮士坚持抗战”消息，轰动一时。我们在“四行仓库”里受到国内、国外爱国华人的关注和尊敬，事后有人就编了一支《八百壮士》的歌。这支歌一直流传到大后方和南洋。《八百壮士》的歌词是：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  
你看那八百战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  
宁愿死，不退让，  
宁愿死，不投降，  
我们的国旗在炮火中飘荡！飘荡！  
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敢挡，  
我们的行动威武，我们的志气豪壮，  
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  
快快赶上那战场，  
拿八百壮士做榜样，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这时，国民党大部队已撤退到南京、芜湖一带。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谢团长率领我们于三十一日凌晨冲破敌阵，由新垃圾桥退入英租界，驻在胶州路胶州公园。

由于进入租界，我们失去了自由，手无寸铁，但是在谢团长带领下，仍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除此之外，我们自力更生，学搞手工业，做肥皂，织毛巾，做木工活。这时生活由工部局负责，日夜由外国人站岗监视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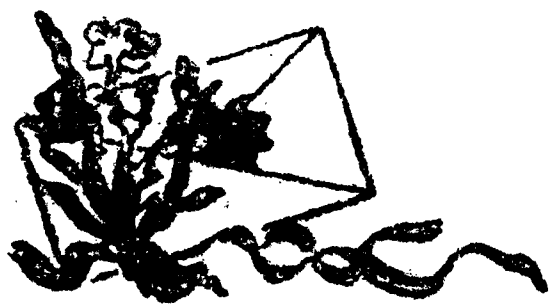
就是在这囚犯般的岁月里，在既无国旗又无军号，甚至连旗杆也没有的情况下，谢团长每天仍率领我们举行“精神升

旗”，向空中敬礼，肃立唱国歌。

一九三八年，为了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我们还冲破重重阻挠，搞到一面国旗，在八月十三日那天早上六时举行了升旗仪式。旗升起一个多小时，工部局组织外国军队把我们包围起来，要我们降下国旗，说如果日本人看见不好交代。谢团长率领全体人员把国旗围护起来，外国部队用自来水喷头和棍棒围攻我们，我们用石头和拳头还击，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出操场，随之我们的国旗也被工部局没收去了。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五时许，上早操时，谢团长指挥全营战士从操场西头向东头跑步，这时突然有几个被日军收买的叛徒郝鼎诚等四人从宿舍进入操场，迅速向团长靠近，以铁镐猛击团长头部，六时许，谢团长含恨殉难。

谢团长牺牲后，我们悲痛万分，上海人民自发地组织了各种吊唁仪式。四月十五日，举行棺殓，吊唁送葬者十余万人。人民怀念这位英勇不屈、以身殉国的英雄，人民追思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打击日寇的英雄业绩。人民永远忘不了，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光辉篇章中，有着这永世不朽的一页。



# 胜利井的由来

## ——六镇集歼灭日寇纪实

刘琢如

小集乡六镇集东头，有一口用石礮子封实的古井，人们称它是“胜利井”，是符合事实的。它纪载着四十六年前，六镇集及邻坊（当时即现在的乡）人民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怀着无比的仇恨，以大刀、长矛等劣势武器消灭一股日本侵略军，取得胜利的史实。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十二月全椒县城被日寇占领，县长前三天闻风逃跑，县政府及直属机关纷纷逃散，地方成了无政府的局面，社会秩序混乱。日寇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占领县城的侵略军，不断四出“扫荡”，人民群众不堪其苦，既仇恨日寇的滔天罪行；又痛恨地方政府对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的痛苦毫不关怀。

当此国破家亡的时候，地方许多有识之人，倡议集中分散在各家的武器，组织具有爱国爱乡思想的勇敢青年，进行军事训练，抗击日寇，保卫家乡。六镇集当时是六镇坊的一个保，坊的联保办事处设在小集街上，我当时是六镇街小学教师，暂代六镇保保长，在我的倡议和组织下，成立了一个自卫分队。这个分队有四十名队员，十四支步枪和土造枪，其余都是大刀和长矛，我们推选杨继贵为分队长。这些队员，大都是我的学生，自“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我经常给他们讲日寇在东

北的残暴罪行及抗日救亡的道理，激发他们爱国热忱，深受他们的尊敬。因此，当我出来倡议组织武装保家卫国时，他们纷纷响应。

一九八三年农历正月二十七日，县城日寇出动了七十多人，在二十匹马队前导下，向西进行扫荡，一路上不断开枪射击，耀武扬威，群众闻风逃跑，躲开鬼子的视线。午饭前，日寇由小集到了六镇，镇上居民在自卫分队掩护下，安全转移，敌人放火烧了街上大部份民房后，向黄家庵方向窜去。这时，敌众我寡，分队中虽有少数人想打，大家不同意。当晚，日寇盘踞在黄家庵西北大黄村一带，第二天向马厂进行扫荡。我们由于怕鬼子从原路回来，派了几个队员，日夜监视鬼子动向，到了下午，监视鬼子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发现有九个日本鬼子，赶着四条驴，上面驮着子弹箱、电线、衣物等，向六镇方向走来。”这时队员们思想紧张、犹豫，以为鬼子人少我们人多，不打可惜；打吗？子弹少武器差，没有打仗经验。我当机立断地说：“这是打鬼子的好机会，我们地形熟悉，只要大家沉着战斗，听从队长指挥，利用街外有利地形，首先打它一个伏击，先消灭几个敌人，但一定要守住街口，不能让鬼子进街，否则，对我们就不利了。”杨队长同意我的意见，立即在街西头大庙前，选择了有利地形，布置了埋伏。当日寇还未进入我们的伏击圈时，队员杨德山未等到队长下命令，突然向鬼子开了一枪，鬼子闻到枪声，及时卧倒向我们还击。我们伏击鬼子计划落空了，就这样我们和日本鬼子打起来。

当时我考虑到：我们的人虽多，但武器没有日本鬼子好，子弹没有鬼子多，打仗经验又缺乏，要想把鬼子干掉，单凭这点力量是不容易的，否则，要付出大的代价。于是我派人分头送信到小集联保办事处及邻近的东王、黄家庵等地会堂，请求

援助。不一会日寇撇开我们的伏击圈，由西窜到街的东北，并向街上靠近，这时自卫队迅速回到街上，凭借街后各家的后围墙、厕所墙作掩护，把日寇堵于街外，日寇因为处于不利地势，几次用密集火力向我们射击，妄图攻上街来，均被我们打退。突然有几个鬼子窜到一个干坑里，想利用坑的东南面菜地矮墙作掩体，以此作为窜到街上的突破口。为了不使敌人阴谋得逞，杨分队长带了几条枪，我带了几名持刀矛的队员，跑到菜园南边，始终把日寇堵在塘坑里。这时，高塘、黄家庵、封家岑各坊的自卫队，先后来了三百多名，共同包围了敌人，群众也来助威。一时枪声、呼喊杀鬼子声，惊天动地，日寇吓得龟缩在干坑里不敢乱窜。天色已晚，为了不让日寇趁天黑跑掉，队员们用柴草燃起几堆熊熊大火，把阵地照得一片通红，约一个多小时后，日寇急了，几次露出身来要突围逃跑，都被排枪压了下去。为了要快点杀掉这一小股日寇，我们队员把仅有的两颗手榴弹扔向干坑里，由于缺少军事知识，尚未爆炸，就被日寇扔了出来。这时，我急中想起了“火攻”战术，叫杨分队长派了几名年纪较轻、勇敢活泼的队员，仰卧在地上，把稻草捆子烧着，用扬叉将草捆子扔进干坑。一个草捆接一个草捆，在排枪的掩护下扔进了干坑，这时坑里的日寇难以存身，乱作一团，叫喊起来，拼命向坑北突围，在群众的呐喊声和密集的枪声中，日寇纷纷倒下。日寇枪声听不到了，一检查，坑上打死了三个、坑内打死了一个。稻场打死两个。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未能及时清查搜捕。被日本鬼子趁着火光稍落时跑掉了三个。为了顾虑县城日寇出来寻尸报复，我们将这六具敌尸，埋进附近一口古井里，用稻场石礅把井口封实，用石板盖好，至今干坑和古井遗迹犹存，它是六镇一带人民群众团结合作、保家卫国、英勇杀日寇的历史见证。

跑掉了三名鬼子，有两个躲进街西头大路边孤单一户的杨良山家里。第二天早晨，附近村庄群众来街上看看昨夜打鬼子的情况，鬼子看到路上有人就开枪，封庄盛广兴的二儿子被这两个鬼子打死，接着这两个日寇、强迫理发匠陈某带路，沿着街北村庄向北逃跑，被六镇、黄庵、小集自卫队击毙于姚桥南边的刘家坝，另一名日寇逃到程家市附近，也被当地人民武装消灭。

在六镇人民英勇歼灭八个日寇的战斗中，六镇自卫队员张木匠。勇敢杀敌，献出了自己的年轻生命，是值得我们纪念的。还有杨德山、张洪禧、王结巴、张十哥等八人负了伤，当时地方作了妥善的处理。



# 真戈久平被歼记

董光秘

一九三八年正月下旬，扫荡马厂掉队的九名日本兵，在六镇及其附近被地方人民武装两次击毙八名，剩下一名窜到了程家市。

程家市是一条东西向的长街，东西各有一座关闸，木栅为门，早开晚锁。这天，看管闸门的於老头在天蒙蒙亮时，刚开了东闸门锁，用手拉开闸门，发现一名戎装持枪的日本兵，由蹲势而立起。於老头便拔腿向西边跑边喊：“鬼子上街啦。”肖秃子的独生子小肖，闻声手持短马枪赶来，一看鬼子离自己不远，就扳开机头打了一枪，谁知是个“瞎火”。鬼子回头看看，小肖喊道：“你看什么，非干掉你不可！”随之，肖父和坊勇二三十人亦持枪跟踪而至。肖父对准日兵打了一枪，日兵头一缩往西紧跑，钻进了程家市西边“梅花垆”的第一条垆道。程家市的民间武装人员越来越多，紧追不放，也有些群众是跟来看热闹的。人群中纷纷喊道：“鬼子就一个，干呀！”日兵闻声从垆道里继续逃跑，人们跟着追。日兵跑进第三条垆道时，突然一条恶狗拦住了他的去路。日寇发了第一枪，把狗打死了。人群中又喊道：“鬼子枪里有子弹要注意呀，！”这时，鬼子又放了一枪，小肖中弹牺牲了。日兵便坐在地上，以古墓作掩体，很快地脱下一双大皮靴，赤脚继续奔跑。

---

本文作者现为县政协委员



一人倒下，众人齐上。一位姓张的青年，手持二十响连发的盒子枪，一梭子愤怒的子弹打出去。日兵身中二弹，一只手已负伤，只好用另一只手持枪坐在堞旁，翘起一只脚来，用脚趾支撑着枪，准备瞄射，可是手已无力，枪歪倒在地。肖四秃国难家仇集于一身，一口气追至日兵面前。此时，人们在喊：

“捉活的呀！”肖四秃哪里肯听，猛地上去将鬼子按倒，用手中的刺刀把日兵的头砍了下来，掷在地上。大家一拥而上，扯下鬼子的呢上衣、呢裤子，发现鬼子上衣左襟内一角，有一块白布印制的标记，才知道他名叫“真戈久平”，大阪人，昭和十四年（按：1937年），二十三岁入伍。程家市坊联保主任於筱如也及时赶到，当场缴获了“三八式”步枪一支，枪膛里还有一发子弹。

这天整个上午，观者络绎不绝，众口争云：“鬼子没有什么可怕的，来了就和他干。”因此，鼓舞了人民抗日的斗志。



# 禹拳师空手杀日寇

杨宜森

八年抗战时期，我县各族人民为击败日寇，而抛头颅洒热血，舍身卫国的英雄事迹甚多。拳师禹成荣就是其中之一。他宁死不屈，舍身拼搏，赤手空拳连续打死三个日寇，为全椒人民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禹拳师是本县襄河镇人，回族，少时于南京一家皮货店当学徒。这家皮货店与“清初八大剑侠”之一的甘凤池家乃一巷之隔的襟邻。在甘凤池的影响下，少年时代的禹成荣便酷爱武术，由于他心诚意坚，出手不凡，为甘凤池的高徒童清泉所赏识而收为徒弟，终于学得了一身真传正宗的“少林武功”。后来他又随“神枪李”学会了使花枪。他为了刻苦自练气功、硬功、童子功，竟达到如痴如迷的地步，知道的人就送他个绰号叫“痰包”，于是“禹痰包”便喊出了名。

禹拳师年逾花甲以后，为发扬民族武术精华而培育后代，不遗余力，一度任过全椒中学国术教师。当时拜他学艺的青少年数不胜数，如张田有、林延祚……幼时皆从禹拳师学过拳术。禹拳师许多传奇式的故事一直广为人们传颂。他真是一位武艺超群，功底深厚的武林人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椒县城两度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一九四二年秋天，日寇调动了盘据在滁、来、全、定等地的日军倾巢出动，疯狂地向定远藕塘和全椒周家岗等地新四军根据地进犯。驻全椒城的鬼子兵一出动，就抓伕子运弹药。他们抓不

---

本文作者现为离休干部

到青壮年就抓老人。禹拳师此时已经年迈，他不忍心丢下相依为命，双目失明的老伴而离城逃命；抱着活在一起，死在一处的念头守在家里照应老伴。结果，他和邻居老人吴三一齐被日寇抓去，强迫背运子弹。

禹拳师和吴三在敌人的刺刀威胁下，一天一夜，饿着肚子爬山越岭，走到离周家岗不远的钓鱼台，在去天王庙的陡坡上，劳累加上饥饿迫使他俩寸步难行。吴三老人倒在地下，鬼子兵恶狠狠地吼叫着，逼他爬起来再走。吴三无法起来，遭到敌人用枪托猛击几下，晕了过去。敌人此时已陷入我新四军包围圈内，急欲突围，情况紧急。见他俩拖延不走，便暴跳如雷，用刺刀对准他俩心口，逼他俩再往前走。禹拳师看在眼里，恨在心头。顿时，他怒火中烧，咬牙切齿，立即伸开两臂，使劲挣断套在肩头上背子弹箱的绳子，子弹箱跌碰在石头上，子弹散落一地。禹拳师向眼前的鬼子兵厉声喝道：“野狼，别想用我们背来的子弹打我们中国人！”鬼子一怔，立即凶狠地端起刺刀朝禹拳师胸口刺去。禹拳师一闪身，让过鬼子刺刀，趁鬼子兵扑空，站立不稳之际，飞起一脚，踢中了敌人下部（小腹以下），只听鬼子一声惨叫，顿时一命呜呼。另一个日寇居高临下，高举带着刺刀的枪，直朝禹拳师猛刺过来。禹拳师迎着敌人的来势，猛地一脚将鬼子手中的枪踢飞。随急跃至敌人身后，双手抓住敌人后腰将敌人高高举起使劲抛向石壁，敌人脑浆和鲜血立即涂满山石。禹拳师豪迈地自言自语地笑道：“我不仅够本，还赚了一个啦！”说时迟，那时快，又一个鬼子哇哇大叫直冲过来，想一下把禹拳师刺死。禹拳师急弯腰闪过敌人刺刀，一腿扫去，敌人立即倒地，枪也落手。他就势用一只手按住敌人，腾出另一只手，象铁钳一样狠命钳住敌人咽喉骨，使劲一扭，将敌人喉管扭断，敌人鲜血四射，顿时毙命。

骤然，“砰”的一声枪响，躺在地上的吴三老人看到禹拳师已经遭到远处敌人的枪击，倒在血泊之中。原来他是背后中弹而壮烈牺牲。

在禹拳师打死三个侵略兵的时候，这股日寇正遭到我军狠狠打击，仓皇溃逃。我军在清扫战场时，发现了在血泊中壮烈牺牲的禹拳师，又从吴三老人口述中，得知禹拳师这一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的详情。当时抗日民主政府派人将禹拳师的遗体掩埋好，并向禹拳师坟墓默哀，

禹成荣拳师已死去四十三年了，可是他那不怕牺牲，勇敢杀敌的英雄事迹，至今还在全椒各族人民中间广为传颂着。



# 张桥阻击战

宋邦柱口述 鲁玄记录

自1937年“7·7”芦沟桥事变之后，到38年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已经占领津浦铁路南端滁县，并分兵侵略滁县南40华里的我县全椒县城。当时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施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气焰十分嚣张。

在全椒县城南乡40华里的赤镇，有四、五百户人家，是全椒县境滁河岸上比较大的镇市。38年农历正月初五日，日本飞机在赤镇上空丢炸弹并扫射，以致当时赤镇人心惶惶，恐日病严重。

当时赤镇有一所盐局子，是官办盐商，有支查辑私盐的武装队伍二、三十枝人枪，队长叫李金标，还有一些逃到赤镇的散兵游勇，带有十几条枪，为当地商人所收买，加上本镇原有十几条人枪，组成地方商团武装，地方士绅鲁汉生，当时是商团武装的总领导人。

在赤镇西北30华里有个小乡，名叫小集，也有地方武装三、四十人枪，与赤镇武装互相呼应，联合自卫。

38年农历2月14日夜间，处在全椒县城到赤镇中间的中兴集，来人送信说：日本鬼子就要来攻打赤镇了。当时鲁汉生与队长李金标率领辑私队武装，布置在赤镇街北面的猪市岗及二里庙一带，从正面阻击日军。商团武装从张家坂绕到和尚庙，抄到日寇的背后，从侧面打击敌人。同时派人送信给小集，请小集群众武装支援，从大孙村抄到日寇的右侧，夹击敌人。

2月15日清晨，天钢亮，由一名和尚带路，三、四十个鬼子马队及步兵，跟在和尚后面，向赤镇方向进犯。在鬼子刚到赤镇北约五华里的张桥水沟北面时，辑私队开始从正面阻击敌人，这时商团队伍从鬼子侧背后抄过去。不多时，小集的武装也赶到了，他们从敌人的右侧夹击。这时枪声四起，呼声震天，鬼子兵遭我伏击，凶顽抵抗，从天亮一直打到下午三、四点钟。中兴集、武家岗、二郎口等地的民间武装，陆续赶来参战，鬼子终于不支，败退。

张桥阻击战，打死了鬼子20多人，只剩下十一个鬼子，用马匹驮着鬼子尸体（一匹马上两具），向县城方向撤退。还有一个鬼子被打散了，跑到赤镇西北约七华里的大孙村骚狗冲芷在土地庙里被打死。

张桥阻击战，我方伤亡有九人。有位名叫鲍老五的，作战很勇敢，被打死。宋帮柱被打伤，子弹在右后背，至今还未取出来。

自从那次阻击战之后，鬼子兵就不敢再到赤镇一带侵犯了，赤镇得以安定一个很长时间。人民群众从张桥阻击战的胜利，看出鬼子兵并不可怕，只要团结起来，一致抗击鬼子兵，是可以取得胜利的。

# 马厂红枪会、黄旗会的兴起与结局

王可宗 遗稿

吴 坪 整理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皇帝，但并未能改变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帝国主义不断入侵，军阀连年混战，贪官污吏，重重压榨人民，到处盗匪为患，各级政府置若罔闻。人民不堪其苦，为了自卫，纷纷组织起来。当时安徽淮南一带广大农村，曾出现过各式各样自发的民间武装组织。人民群众或利用封建迷信设立会堂；或集资购买武器成立民团；或建立区、坊联防。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零年间，我县马厂街一带就曾办起了红枪会和黄旗会。这两个民间封建迷信武装组织成立后，和县、含山、肥东等县受其影响也相继建立了不少会堂。这个迷信组织，当时对全椒、和县、含山、肥东以及江苏省的江浦等地的治安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后来会众日多，会员成份复杂，由维护社会治安变为祸害人民的组织，招致官军收剿的结局。现将我对马厂一带红、黄两会的兴起与结局，据自己亲见、亲闻，回忆所及，记述如后。

## 马厂一带 两会兴起

一九二六年二月间，全椒，合肥两县交界处，有一股土匪经常出没于全椒县的章辉集、管家坝和合肥县的栏杆集、马家湖、周家岗一带，进行抢劫。匪首名叫许大发，开始匪徒仅有十余人，后来由于无人过问，任其横行，发展到四、五十人。

我县南至古河，北至周家岗一带，人心惶恐，不得安宁。这股土匪到处拉牛绑票，抢劫财物，特别是绑架“肉票”，限期交钱赎人，如逾期不赎，将人质杀害，名曰“撕票”，或将被绑人的房屋烧掉。大墅街有户姓吕的儿童被绑架，未能如期赎回，房屋被烧光，妇女惨遭奸淫致死。因而乡里的百姓，谈虎色变，人人自危。当时的全椒县衙门，仅有卫队八十余人，连同商团也不过百余人，保护县城方已不足，更谈不到派兵下乡清除匪患。况且那时的县官老爷，无一不是花钱买来的，自然贪婪成性，那里还有为民除害之心。他们听凭土匪在乡里抢劫，只求不危及县城，虽然各地连篇累牍上报匪情，只是充耳不闻或敷衍搪塞了事。有些乡绅也意识到，即使费九牛二虎之力请来官兵，也是剿匪不足，扰民有余，不如自力更生维持地方治安。

马厂坊（旧制乡叫坊）乡董余宜之，王兰亭等，为了维护马厂坊治安，除匪防患，同时也为自家安全着想，商讨发起组织地方武装。先由余宜之出面，请马厂街上大地主赵子藩家的保镖卢三（肖县人），去肖县请红枪会老师来马厂铺设会堂。是年农历六月上旬，卢三请来了几位老师在余村建立了会堂。几天后，王兰亭也请了在马厂街做京货生意的商人柏茂林（合肥人），前往定远县池河、藕塘等地，邀请了几位黄旗会老师，于六月中旬在马厂街西北两里许的山根王、喻河两村，铺了黄旗会会堂。乡里青壮年农民，为了除匪保家，响应乡绅号召，纷纷前来两家会堂入会者达到两百人之多。余、王两人原是塾师出身，明知红、黄会“烧香求神、吞符念咒，就能使血肉之躯刀枪不入”实是欺人邪说，但为了发动乡勇入会，只好借此作为权宜之计。自此红枪会、黄旗会便在马厂一带开始兴起。

## 红、黄两会 所见所闻



红、黄两会会堂在马厂铺开以后，有人想寻根究底，知其来龙去脉。一些传道老师只是言词支吾，不道其详。据笔者所见，黄旗会的香堂里供奉着“弘光老祖”的神位，点传老师皆说有神灵附在自己身上。会员入会，烧香膜拜，在家早、中、晚向着太阳念咒吸气，谓之做“太阳功”。晚饭后人人带着武器（大刀）进会堂拜神做功。每月举行一两次“请老神”的仪式，各个会堂皆有一个极愚笨的会员自说神附其身，胡说乱讲，荒诞不经。每当黄会出发打仗，必举一面黄布八卦旗，会员身上斜背着三寸宽、四、五尺长的黄布符带。“符”是用黄纸裁成长二、三寸，宽约半寸、叠起几寸厚的纸条。每次出战前，由老师或资历深的会员跪在香桌前念“法子”（咒语），念一遍“法子”向符上吹口气，说是“法子”念的越多，符上吹的气越多，这个符的力量就越大。会员将吹过气的纸符装入袋里，打仗时，便可刀枪不入，老师还向会员口传：“神灵降旨，弟子（会员）上阵不得弯腰或躲闪，只许向前，不许后退，自有神灵保佑，违者必受神灵惩罚。”

红枪会设堂祭神，类似黄会，不同的是：白天不做“太阳功”，不是会员不准进入会堂，会众出战时举红旗，持红缨枪。会员身上不背符带，不准别人抚摸或拍打头部。

## 首战告捷      两会发展

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全椒合肥两县边界，自从以许大发为首的这股土匪窜扰以来，民众受其祸害，难以尽述。当时全椒县政府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合肥方面也不例外。许匪掌握了只要不染指县城，在乡下为所欲为，不会有人过问的诀窍，便有恃无恐，到处横行，无恶不作。

余宜之、王兰亭两人，平素相处较好，能合作共事。自两

会成立，他俩肩负维护地方治安责任，不断集议，研究马厂一带治安情况，认为半年来马厂街上未遭到许匪抢劫，主要是这里民间散布的民枪较多，匪徒未敢轻易下手。一旦匪势扩大，马厂定难幸免。为了早日消除这股匪患，趁其肆意横行，尚未遇过对手，趾高气扬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为宜。约在农历七月中旬，余宜之了解到土匪活动情况后，率领了红枪会会员百余名和马厂街上自卫团一班枪兵，向骑龙集、黄集许匪盘踞的各个据点进行突然袭击。由于红会初兴，锐气难挡，许匪又毫无戒备，未及交手，匪徒便四散逃命。会员与马厂自卫团枪兵分组清剿，将许大发子和几个小匪头子在大邹村一带击毙（有个小匪头子名叫刘映仓，逃跑到滁河南岸，被庠水的农民拦住打死），红枪会及自卫团无一伤亡，大获全胜，缴获的长短枪近十支，及弹药、衣物、现金等，全部奖给了红会老师、会员和自卫团的官兵。

红枪会初战告捷，声威大震，仅在一月之内，程家市、古河、赤镇各地不断派人来马厂请红会老师去铺堂立会。因肖县距全椒较远，原来请来的红会点传老师人数不多，定远县离马厂较近，于是从定远请来黄旗会老师有十几位，分别去各地铺设黄旗会会堂。到了年底，全椒县境内，特别是西乡几乎每个有二十户人家的村庄都铺设了红枪会或黄旗会会堂。到了一九二七年底，合肥与全椒毗连的边界各地，也纷纷成立了红、黄两会。

## 江浦剿匪

## 两会鼎盛

江苏省的江浦县和全椒县毗连。江浦县境内的星甸庙街附近有座独峰山，山径崎岖，森林茂密。山上有座独峰寺，一股土匪盘据寺内。匪首名叫林八爷，纠集匪徒近百人，拥有长短枪

近百支，四出枪劫，为害已久。据星甸庙人说：官府也曾派过军队进行清剿，但未能除掉。人民群众不堪其苦，一九二六年农历八月间，星甸庙人为求得匪患消除还派人来马厂黄会会堂请派老师去铺堂子。从定远县来的贾中元老师带着另几位老师来星甸庙一事被匪首林八爷所知，林即派一夥匪徒将贾中元等围困起来。星甸庙地方乡绅派人送信到马厂，向黄会求救，马厂黄会堂立即抽集年轻力壮素有胆量的会员一百多人，于中秋节晚上星夜奔赴江浦星甸庙。次日清晨黄会到达该镇，镇上饭关门店皆闭户不敢向会员出售饭菜，深怕得罪林八股匪。会员们首先为贾中元等人解了围，然后各人吃饱干粮，一鼓作气冲上山，直扑独峰寺。当时匪徒由于从未受过重创，目空一切，对于持刀矛武器的会员，更不放在眼里。会员们有老师傅压阵指挥，心齐人勇，猛地冲到寺里。匪徒们的长枪已失去作用，乱成一团，被砍死、砍伤的有十余人，余者从后山逃跑。会员追至后山，匪徒四散，不知去向；另一年轻会员在桃树林里，中流弹身亡。黄会缴获了几支长枪和细软、布匹等胜利品，装了六、七辆手车运回马厂。

黄旗会在独峰寺清剿林八爷股匪老巢得胜后下山，星甸庙街民摆香案、放鞭炮，办酒席慰劳他们。黄会胜利回师那天，星甸庙街上民众手捧香烛，跪求留下为本地铺堂子。原从定远县来的点传老师及几位资历较深的会员，留下来为该地铺堂子，其余会员挑着几个匪徒脑袋，返回马厂，同时向全椒县政府报捷，县长王建常奖给他们四百银元。

黄会在独峰寺清剿林八爷股匪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开，一时间江浦、和县의人民群众迷信黄旗会会员是神附的“钢人”，纷纷来请点传师为他们铺堂子。到了一九二七年初，和县、含山、江浦等县的会堂普遍铺开。农闲时，这里的会员不断到马

厂及定远县的池河、藕塘朝拜老堂子。他们认为朝一次老堂子就加深道行和资历。这一时期，是我县马厂一带红枪会、黄旗会成立以来的鼎盛时期。

## 剿匪受创          神话破产

早在一九二四年，定远县境东南一带，曾有以丁某为首的一股土匪，伙同其弟兄为非作歹，经常出现于全椒、滁县、定远、合肥等县边区，不断抢劫。丁匪为了扩大地盘，于一九二七年夏，派其兄丁大在章辉集附近某村，以承佃何姓庄田为名，搬来居住。丁家首次搬家来章辉，就来了几顶小轿。不久丁大妹妹出嫁，又来了两顶小轿。一个佃农家庭竟如此阔绰，自不免引起当地人的惊疑。关心地方治安的人士多方探询，知道其底细后，立即向马厂集区自卫团团总余宜之报告（余宜之这时已被县政府任命为区自卫团团总，团部设在马厂街）。余接到报告后，率领红枪会会员及自卫团兵士，连夜赶至章辉将丁大捕获，连同缴获的武器解送全椒县政府。丁大被捕以后，丁三又纠集几十名匪徒从定远县窜来我县和滁县交界的孤山长冲谢村盘踞，四出抢劫。一九二七年农历九月二十五日，马厂黄旗会闻讯，由马文金带领六十余名会员去孤山清剿。马文金原无军事常识，他带着会员直冲到长冲谢村的围墙外面。匪徒凭借坚实的土围墙进行顽抗。黄会会员在围墙外，大刀、长矛不能发挥作用，虽有几支长短枪也无济于事，加上四周没有隐蔽，暴露于匪徒火力之下，战斗没有一小时，被匪徒打死三十一人，受伤近十人。此外，应邀赶来助战的滁县小马厂黄会老师——杨矮子，带来几十名黄会会员，也有二人被打死。正当危急关头，马厂东山的陡山坊“沿山自卫团”派十名枪兵赶来支援。丁匪无法顽抗，才出村向山里逃跑，被击毙有十余名。

这次战斗黄会会员共有三十三人阵亡。事后，会首王兰亭筹集巨款，抚恤死者家属，医治伤员，安定会众情绪。这时，两会“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会员群众中已无法取信了。

黄会在长冲谢村受挫后，丁匪气焰嚣张，时常出现于三合集、复兴集一带打家劫舍。这里的会首有些胆虚，向马厂红、黄两会求援。一九二七年农历十二月初，马厂红、黄会调集三百多名会员去三合集一带清剿土匪。一天拂晓，匪徒窜到复兴集附近村子绑票，黄会会员闻讯赶到，把匪徒一直追到孤山老母猪河，并砍死匪徒三人。匪徒在孤山的巢穴被剿以后，他们窜到滁县西北乡的孙家围子，作为据点，在合肥、滁县、定远、全椒等县边界四出抢劫。一九二八年农历正月，马厂一带红、黄会的小头领，为报长冲谢之仇，自行发动会员，会同三合集、复兴集等处会堂，集合有五百多会员，去打孙家围子。匪徒凭借既高又厚的围墙顽抗。两会有约在先，鸣锣为号，凡听到锣声，各地会堂必须不分昼夜派人前往助战。此时锣声四起，越传越远，至第二天中午，江浦县、和县会员也闻讯赶来助战。一时，滁、全两县边界，自孤山到孙家岗一带，漫山遍野，黄旗招展，杀声震天。匪徒见寡不敌众，弃围逃散，丢下十几具匪尸。这次战斗两会会员有十七人阵亡，受伤的更多。两会几次剿匪，会员皆有伤亡，威信日益下降。

## 骚扰和含            两会被剿

军阀割据年代里，肥、全两县交界的一些乡村，普种鸦片。县衙门为了乘机捞钱，一面张贴告示禁种鸦片；一面征收“烟苗税”、“烟土捐”，以致越禁越种，越种越多。有势力的大户竟种鸦片达十几亩之多。烟土产量日多，价格因而下跌。一九二九年夏，有些刀会会员为了贩卖烟土赚钱，仗刀会之势，

结夥成阵身背符带、大刀，去和、含两县南乡兜售烟土。因有利可图，贩毒的会员越来越多。一次，有四十多名会员结夥往和县南乡贩卖烟土，途经含山县的仙踪镇。该镇的警察分驻所人员要进行检查。会员依仗人多势众，拒绝检查，还砸了分驻所。此后，会员结夥贩毒、便通行无阻，胆子越来越大，事情也愈演愈奇。有的掺假骗人，有的克扣分量，有人甚至把泥土，板酱冒充烟土，用红纸包着强行去买烟户，并限期付钱。有的会员强行聚赌抽头，奸淫妇女，闹得和、含两县南乡人民不得安宁。当地群众纷纷组织“鱼叉会”自卫。这时，我县管坝白庙王村开牛行出身的黄旗会会首王学清，带领二十几个会员去县南乡吴兴集铺堂子，为当地的地痞流氓撑腰，与“鱼叉会”发生了战斗。王学清等跑到黑杆桥，被叉死、叉伤七八人，余者争相逃命。后来听和县来人说：去和、含两县南乡横行的会员，被各地“鱼叉会”叉死的有近百人。那时正是和、含两县南乡开镰抢割早稻季节，全椒、合肥边界去打短工割早稻的农民，由于与当地人口音不同，有人被“鱼叉会”误认为是黄旗会会员而遭叉死。当时和县县长叶家龙，是全椒县人，写信给黄旗会发起人王兰亭，要求约束会员，不得再去和县骚扰；同时制止“鱼叉会，不准伤害好人，因而合肥、全椒边界红、黄两会不敢再去和、含等地骚扰。

自从黄旗会、红枪会在和、含两县南乡危害地方治安以后，当地政府纷纷上报，请求清剿。省政府派了一个梅团长，率一营兵来滁县、全椒一带进剿，会首王兰亭、余宜之听到消息后，即将马厂街附近的红、黄会堂解散，将大刀、符带和旗帜收集，等候官兵到来，悉数上缴。一九三零年春，梅团长首先到了大墅街，当地的范某与管坝的王学清所辖的会堂，集合有三百多会员反抗清剿。官兵枪炮齐发，黄会无法抵抗，四处

逃散。梅团长本是军阀余孽，自不会关心人民痛苦。部队追赶会员时，不分青红皂白，在大墅、管坝一带，烧了十多个村庄和所有会堂。王学清家住的白庙王村房屋全被烧光。

梅团长到了马厂后，王兰亭、余宜之申述了红，黄两会已经解散，会堂撤销，并缴了符带和大刀长矛，保证以后两会不再活动。

这就是轰动一时，前后活动达五、六年之久的马厂一带红枪会、黄旗会的兴起与结局。



# 王宗正镇压东乡刀会纪实

林延祚 王学铨 供稿

章家骥 整理

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十二月下旬，全椒县城沦陷，县政府逃亡，盗匪四起，盘踞城内的日寇不断下乡抢劫，人民日夜不安。城东、界首、陈家浅、三汊河等地人民群众，为了抗日保家，纷纷组织封建迷信的刀会——红枪会、黄旗会，认为烧香念咒，有神保佑，可以刀枪不入。红枪会会堂是请滁县八子湾会堂老师来铺的，界首乡农民参加的较多；黄旗会会堂是请江浦县老黄董村一带会堂老师来铺的，陈家浅乡农民参加较多。后来两会合并成立总指挥部，各乡设会堂堂长，总数约三千人，长短枪约千支，每人都有大刀、长矛。会众的口号是“抗日保家乡”。声势较大。

1938年四月初，县城日寇撤走，新任国民党县长王宗正（滁县百庙人，绰号王疯子，又叫乌脸巴。）率部进城。王在开始任县长时还表现出抗日爱国的面貌，和王永等配合较好，这时却暴露出个人野心，不顾团结抗日，只想积极扩充武装作为自己的升官资本：当时滁全两县交界的韦家湾设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皖东特派员公署”，由于公署没有武器，特派员余品三（滁县人）向王宗正借六十支长枪，王丝毫未给；与此同时，国民党滁县县政府设在花山，与全椒县接壤，县长谢震欧与王既是同乡又是同学，滁县县政府的税收人员和士兵到全椒县的腰铺、谭墩、界首、石沛等集镇收税，王宗正未经交



涉，即派第一大队长张士敦带两个中队攻打滁县县政府，缴来长枪三十多支；特别是王宗正见东乡刀会枪支较多，要进行改编，刀会认为改编可以，听调不行，王即派陈家浅区区长樊益三会同驻在十字、许店的一个中队进行督编，企图收缴刀会的枪支，因而导致冲突。刀会集中会众分三路攻打县城：一路攻宝林桥、拖板桥；一路攻打兴塘坝桥、红栏桥；一路沿襄河攻打古城镇、火神庙。先头会众，有的攻到火神庙，有的进了街。由于守城的自卫军集中火力坚守红栏桥、宝林桥，会众当晚退回城外。

王宗正在周家岗知道后，连夜赶回县城，集中六个自卫中队兵力，配备轻重机枪二十多挺，又调东王、武岗各地后备队作后卫，往东乡攻打刀会。当时我（王学铨）在县干训班工作，王宗正也叫我随行。兵分三路：一路从河沿向三汉河；一路从许店向杨庄；一路向界首对刀会进行围攻，并命令所部见人就杀，遇村庄就烧。我们提出建议，认为不能伤及无辜，王宗正不听。由于王宗正占有武器优势，会众是迷信神鬼又无军事知识的老百姓，所以刀会节节败退，直退到袁港、三汉河一带过河东去，王才恨恨收兵。

这次，刀会被打死三十多人，被烧毁的民房有二百多间。杨庄、大郑、大潘、小潘、大高、二闸、三闸等村庄烧得最惨。这是王宗正走向破坏抗日，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彻底暴露。

东乡刀会被镇压后，就向“东北流亡挺进队求援”，挺进队随即进入县城，缴了王宗正的一部分枪支。王宗正也在这时被撤职。

# 张大鼻子被歼记

王敦厚 口述

潘禹三 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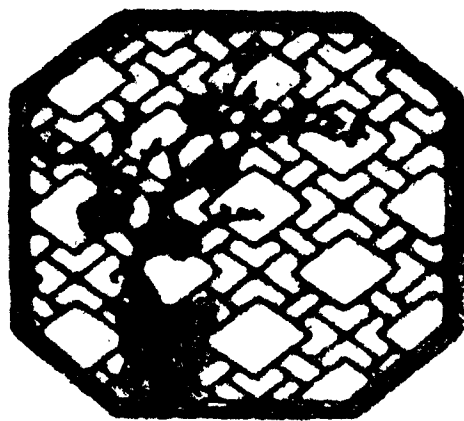
反动统治的旧社会，到处土匪丛生。一九三零年后，淮南、霍邱、定远、滁县、全椒、肥东等县的股匪，以张大鼻股最为猖獗，号称千人，绑票抢劫，无恶不作。一九三三年夏，一度窜扰含山县境，并占领了县城。淮南各县惶惶不安，纷纷设法防御。全椒县西北乡与滁县、定远、肥东接壤，早已戒备。一九三一年县长周崇颐（湖南人）到任后，即着手抓地方治安，在各坊（即现在的乡）招募青年壮丁二百多人，集中县城训练。社会上人看我们年纪轻，大家叫我们“学兵”。我是从封家岭坊招募来的，经过六个月的训练。县政府解散了旧的常备队，把我们编为两个保安中队。

一九三三年农历八月初八日，张大鼻股匪带领一支匪徒从定远、肥东窜到全椒县西乡大墅街、程家市，接着由赤镇过滁河，窜到和县东乡乌江镇。所经之处‘大肆抢劫绑票，没有遇到堵剿，城乡人民终日惶惶不安。当时和县、含山属安徽省第五行政区管辖，专署设在滁县。这时专员沈鹏（江苏吴江县人）到了全椒县城，和全椒县接任不久的县长杨中明（舒城县人），召集我们两个保安中队讲话，他分析情况说：“土匪一定不会过江，抢劫乌江后就要回老巢，仍要经过全椒赤镇的。”并命令我们两个中队于九日下午开到赤镇布防堵击。沈鹏驻在赤镇东北的沙石岗，杨中明驻在赤镇北边的新兴寺（即现在的宝塔大队）指挥。这批股匪九日到了乌江镇抢劫后，果然连夜由和县

北乡张家集原路回窜，十日天刚亮就到了赤镇河南的小街渡口，一面强渡滁河，一面派百余名匪徒从下游的小罗村附近，用农民挖塘泥的木盆渡河，企图绕过圩心抢占二里庙高地，与赤镇渡口过河的大股土匪夹击我们。天刚大亮双方就打响了枪声，一直打到下午四点多钟，土匪始终未能冲破我们猪市岗、芥子园的防地。这时，一群约有二十多个佩带有长短枪的土匪，其中还有两个女土匪，大模大样地到了猪市岗对面，在一棵大黄栗树下面，对着我们高声地连喊：“梢子卖高些！”“梢子卖高些！”（黑话是子弹打高些）那个喊黑话的土匪一边喊，一边从腰里掏出钞票、银元向我们扔过来。那两个女土匪也把抢劫来的大小包袱扔向我们两个，看样子那喊话的土匪是个头头了。我们年纪轻，当兵时间短，土匪喊的黑话，不知是什么意思；后来看到他们向我们扔银元扔包袱，才明白土匪的企图是叫我们不要打，用财物收买我们，让他们走路。但我们没有一个兵敢出来抢钱、抢衣物、（后来才知道这种情况是当时官兵与土匪勾结的一种形式）就在这时，我们中队长欧阳奎（湖南人）命令我们加紧打，瞄准打。一阵密集的排枪，那个喊黑话的头子被打倒抬下去了。土匪头子打倒了，他们气急败坏地发了疯，一齐打了赤膊向我们猛扑过来。我们子弹不足，退守二里庙高地。这时天色渐黑，土匪向程家市逃跑。据被土匪绑票逃出来的人说，张大鼻子在猪市岗黄栗头树下受了重伤抬走了。我们听了，人人高兴。

匪徒逃窜后，专员沈鹏来到新兴寺，补充了子弹和手榴弹。县长杨中明带第一中队跟踪追击。我们第二中队从二郎口、黄家庵、西王集进行侧面追剿。（在赤镇堵击张大鼻股匪的战斗中，我们也有王增高、刘笃云、孟宪法三个士兵阵亡。）股匪从来的老路大墅街、管家坝一带向北逃跑，我们紧

跟不放。他们跑到滁、定、肥东、全椒几县的交界处广兴集，界牌集不走了，利用距界牌集附近约两华里的一个土围子进行顽固地抵抗。八月十一日下半夜，滁县、来安的保安队也到了，我们把土围子包围起来，打了整整一天一夜。这股残匪见情况不妙，在十二日深夜逃散。我们十三日天亮进了围子，里面丢下了十几具死尸和未带走的“肉票”（被绑人质）。据被匪绑去的人说：张大鼻子在赤镇受伤拾到大墅街附近就死了。从此淮南这股猖獗一时的土匪被消灭，地方得到暂时的安宁。在界牌，我们也阵亡了十二人，地方群众纪念他们为地方治安而流了血，在县城召开了追悼会。



# 从望阳书院到全椒中学

## ——建国前全中历程的回顾

陈葆经

### 引 言

屹立在全椒城襄河北岸的全椒中学，是我县的重点中学，也是滁县地区重点中学之一。教师们正在为“四化”育材而教，学生们正在为四化成材而学。

这所学校到今天已经历了八十三个不平凡的春秋。

我于一九三零秋至一九三三年夏在这所学校里读书。抗战后至建国前夕我曾三度在该校任过教员。因而我与这所学校有较深的渊源和较厚的感情。少年同学，已寥若晨星，中年同事，亦所存无几。为了使光荣的校史，不致因时日积久而有所残缺，爰就亲身所历和记忆所及，作简要的叙述，错漏难免，愿求明教。

### 书院溯源

据《全椒县志》载：明代嘉靖时，全椒即有“大观书院”“南谯书院”的设置、到万历（1573—1620）年间，本县孝廉金九陞等联名建议并得到知县杨道成批准，把县学东的樊公祠（祀故令樊玉衡）改为书院，并定名为“望阳书院”。

由王阳明弟子周汝登任主讲。

望阳书院以讲授王阳明“心学”为主旨。清康熙间，一些反对王学的文人，便废掉这所书院，改立为“朱文公祠”。朱文公是宋代“理学”倡导者朱熹的谥号，与王阳明“心学”是对立的。

乾隆中期，书院恢复，改名“襄水书院”。

书院经费一直是困难的。道光八年（1828）知县赵晖璧，有鉴及此，乃筹制钱三千串，存典生息，经费初有着落。咸丰初，知县陈麒昌，为了镇压太平军，竟移此而作军费，书院停办。光绪二年（1786），曾任杭州太守的薛时雨，为了家乡教育事业，捐出制钱二千串，以一半修理书院，一半存店生息、作为经费，书院又得以恢复。光绪廿七年（1901），皇帝载恬接受康、梁维新主张，制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下令开办学堂，“书院”也就至此结束。

## 风雨鸡鸣

光绪廿八年（1902），本县举人薛葆琏、进士邱景章、叶尧阶禀准抽提盐厘票费并原有的书院田租等款约银元三千元作为基金，改襄水书院为全椒县立中学堂，这是全椒最早的一所中学。当时有学生两班，附高等小学一班，公推举人汪鸿海为监督，主持校务。一年以后，因清政府又作出“州县书院只能改为小学堂”的规定，所以便改称“全椒县官立高等小学堂”，由岁贡王福铨任堂长。堂长下设学监一人，教席八人。虽名曰“小学堂”，实际仍授中学课程，有中、英、算三科必修和音、体、美三科选修。又招收新生两班，采取四年制，至

宣统三年（1911），有两届毕业生。

民国元年（1912），改称全椒县立中学校，公推邱景章为校长，学生三班，有两届毕业生。八年（1919）邱逝世，进士张德需继任。

张校长接任之年，全国规模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当时三个班的学生整队上街，呼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从而除旧布新的思想在学生的脑海中生根，发芽、开花、结实。据前贵州大学教授张汝舟生前回忆：九年（1920）夏，他和米光炳同班，米任学生会会长，他任《会刊》编辑，为了对旧式丧礼的抨击，曾执笔为文，刊登出来，触怒地方豪绅，控告到省教育厅，说他们破坏礼教，有伤风俗，被分别处以开除和记过的处分。张汝舟回忆这段往事，并在1979年4月安师大滁州分校《酿泉》创刊号上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有：

“……民八西一九，五四浪迫天。……椒陵虽小邑，乡校敢领先。米长学生会，校刊我主编。校刊连期发，期期讨权奸。一篇最辛辣，余所执笔与。触起豪门怒，一状轰省垣。省垣黑示下，霜飞六月天。开除米会长，贫儿反保全。斗争六十载，愈老愈扬鞭！……”

学生在被压制下，终未屈服，从此，便接二连三地参加历次的爱国运动。

民国九年（1920），张德需逝世，庠生汪文鼎接任校长，直至民国十三年（1924）。

这时学制仍为四年制（后称旧制中学），分甲、乙、丙三

班。课程增加了历史、地理、博物、格致等；中文课之外，还有读经课。学生还要参加每年二、八两月逢“丁”日的“丁祭”礼，以示尊孔。

民国十四年(1925)，由于军阀混战，学校暂时停办十六年(1927)，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省教育厅颁布《安徽中等教育改造方案》，并颁发了部分的中学课程规定，改四年制为“三三制”(初、高中各三年)，学校更名为全椒县立初级中学校，厅委贾怀瑜为校长。课程有国文、英文、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植物、动物和体育、美术、音乐，另有“童子军训练”、“三民主义”两课程，“三民主义”课后改称“公民课”。

同年五月，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该校学生参加全椒群众游行，砸烂了一家公司和几家洋货店，把一个大奸商两边嘴巴用红漆写了“奸”“商”二字，拖着游街示众，真是民心大快，民气昭苏。此后学生纠察队成立了，经常查抄洋货；并参加了省抗敌后援会，进行反帝斗争。

民国十七年(1928)，增设一个女子部，十二人。女子部比男生多一门“家事”课。

民国十九年(1930)夏，部份教员联名向省厅控告校长贾怀瑜，贾被撤职。派鲁志焕接任校长(详见《安徽教育周刊》五卷26期)，又有部分教员一面向省反诉，一面发动学生张贴标语，抵制鲁来接事，闹得很厉害。为了缓和局势，县长周崇颐(湖南宁乡人)乃与地方人士协商，请当时在导淮委员会任工程师的盛德纯暂时回县任校长。得该会同意后，盛亦以家乡教育事业为重，同意以一年时间，决心把学校整顿好再回去。

盛接事后，首先就感到现有的教员力量薄弱，全年经费



只有7974元，比较拮据。于是节约了办公费，向南京上海延聘了汪砥安为英语教员，孟亚述为教学教员，谭瑛、解国桢为音乐、美术教员，朱霜菊为国文教员，解国华、施延之为体育教员。此为延聘外籍教员之始，也是外籍教员最多的时期（当时全校教职员十四人，男生一百卅三人，女生廿九人）

一年过去了，学校大有起色，盛仍去治淮，换了史镜古任校长。民国廿四年（1935）史辞职，省厅派李晏平（凤台人）继任，直至民国廿六年（1937）农历冬月二十日日本侵略军强占县城，学校仓皇解散。

## 战地弦歌

民国廿七年（1938）五月，日侵略军第一次退出，县城颓垣败壁，满目疮痍，学校的课桌凳损失大半，乃因陋就简，于八月间草草恢复，县长汪心森兼校长。这时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正在我县从事抗日宣传，团长汪道涵常到学校去讲解时事和教唱抗战歌曲，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并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

次年四月廿六日，县城再陷，学校迁程家市大孙村，印书城任校长，当时新桂系和国民党游击队正横行一时，从很多方面影响到学校的正常上课，印书城目睹时艰，心怀感愤，曾作“桂人吸皖血，白鬼笑红楼”之慨叹！虽然阻碍重重，而学校弦歌未辍。民国三十一年（1942）增设简易师范班，培养小学师资（一年制，后改为四年制初师）。民国三十二年（1943）秋，开学不久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印书城积劳成疾，病逝校内，身后肖条，全校师生为之执紼，丧礼较为隆重。

刘继鑫接任校长，此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三青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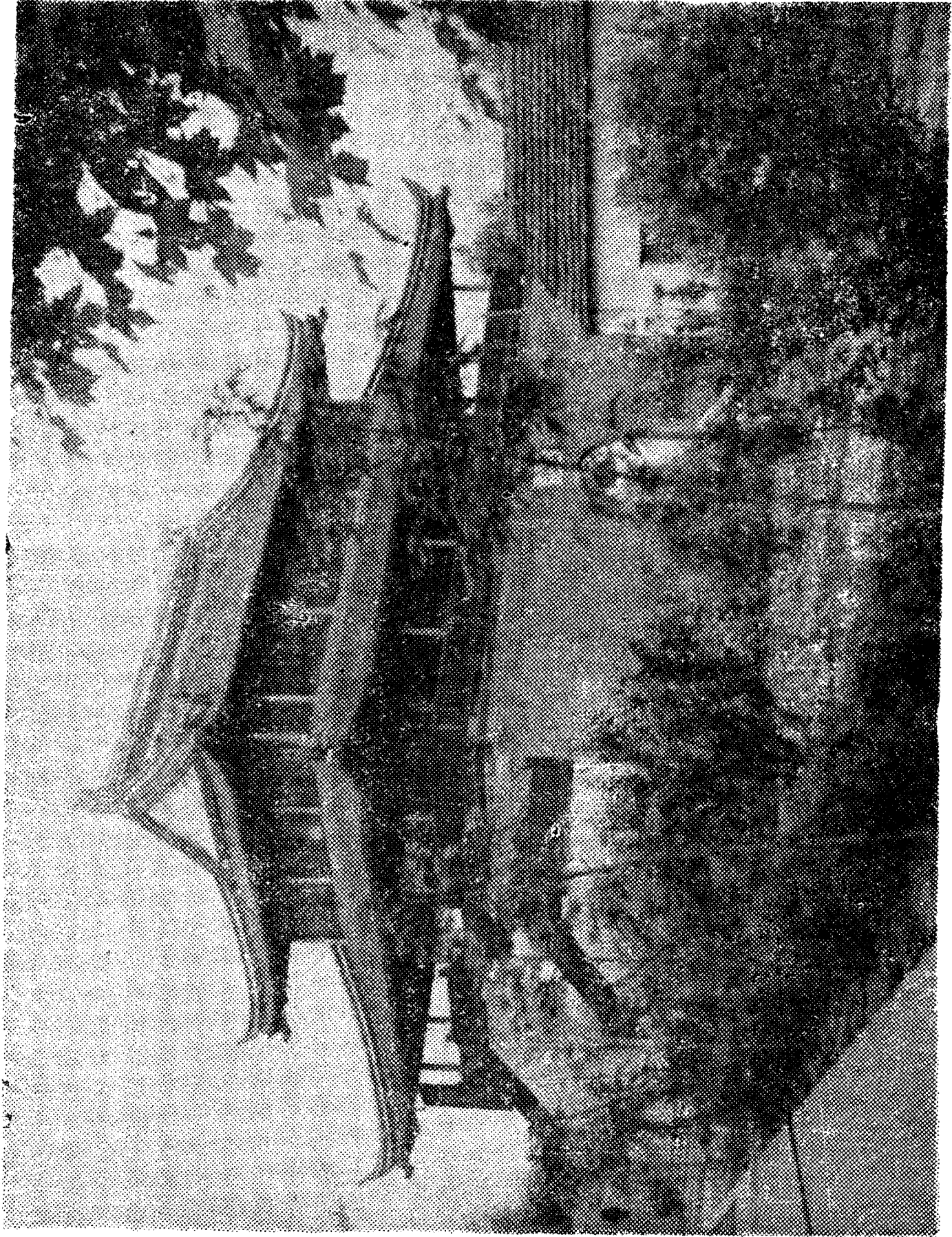
全椒分团第七区队，国民党全椒直属第十三区分部成立，增设童训、军训课，它们相辅相成，影响了正常教学。次年十二月，刘继鑫辞职，淮南路阻，省厅无人可派，县长江波乃以其军法承审员陈秉徽（嘉山人）兼代校长职务。迁学校于程家市西庵。

1943年，民主人士校友阮明回县，遭汪伪杀害于赤镇大阮村故居，消息传来，全校师生结队前往吊唁，要求当时政府军队进行抗战，也是学生的一次示威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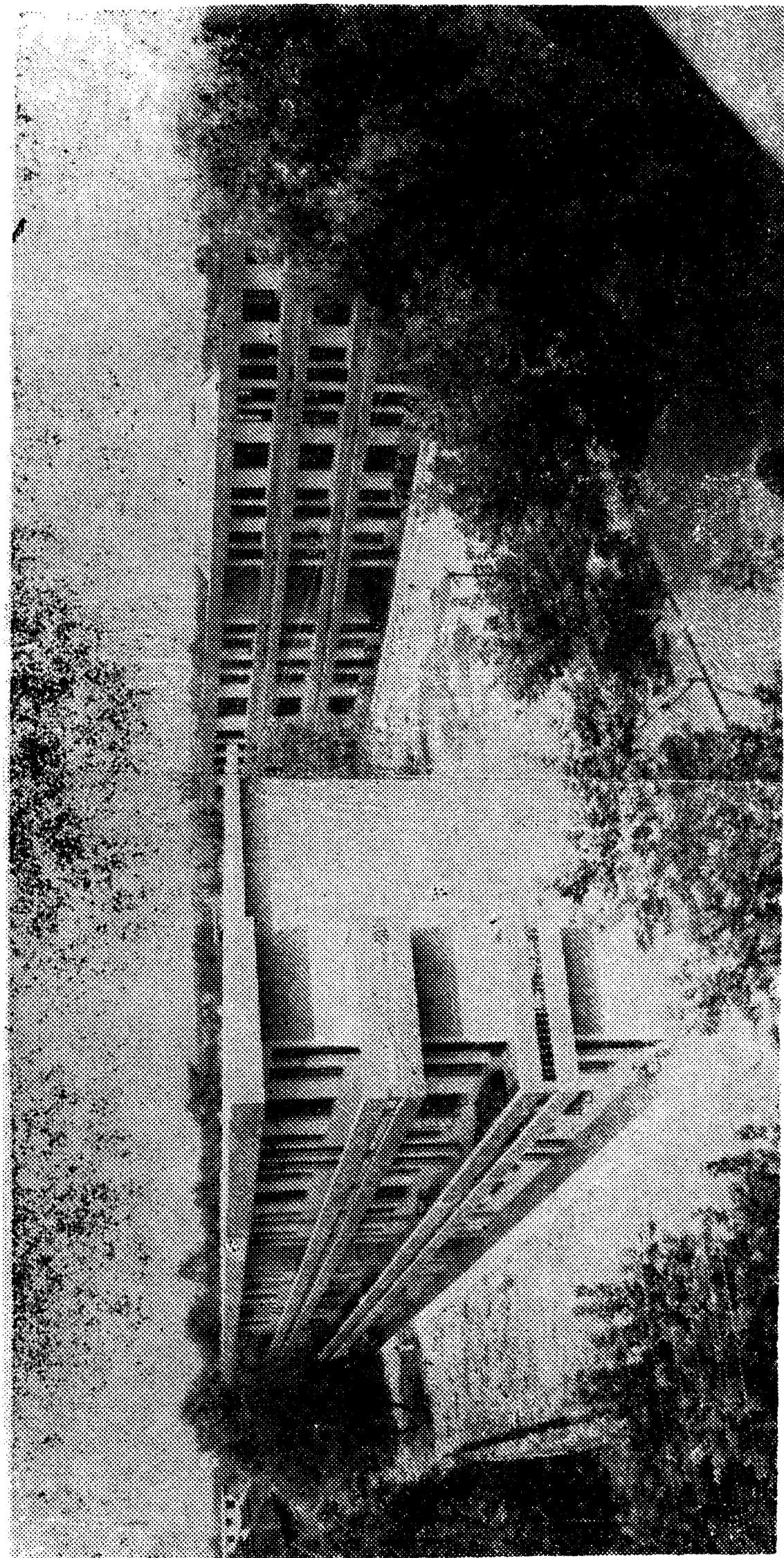
一年后，陈的校长职随军法承审员的去职而去职，县长江波上报夏禹功（和县人）为校长，因夏资历不足，未获准，继而江波兼校长，夏为校务主任。不久江波卸任，秦秉文任县长，报厅委任马德黎为校长。九月，日本投降，学校迁回县城。

## 重整校园

县城收复，扩原女小校舍而增加了班级。当时计有初一年级三班、初二年级两班，初三年级两班，简师两班，学生五百余人。由于教师中有些尚未回城，有些另作高就，师资十分缺乏，马亦不安心于此，民国卅五年（1946），也就应嘉山中学校长贺义昭之聘去明光了。1947春章寅接任校长，聘用一些大专毕业的青年、中年教师如江绍基、宗兆民，傅达等，一时生气勃勃，并增设高中部，校名经批准改为全椒县立中学校。次年，章寅辞职，江金惠继之。民国三十七年。（1948）秋，江调长农中，适卸任的宿松县长张汉英回乡，经报省厅，接替校长。又增加教师任康平（现江浦学中校长，县人大付主任）、刘国钧、龙翠屏夫妇、禹寿玉、吴种述……为化学、数学、英语、国文教员。未及两月，张汉英患重



樓光園



金椒中学教学大楼

病，经报省厅，据批复，“由该县教育会理事长暂代校务”。我是1943年当选为本县教育会理事长的，该会长期未改选，乃由我一直挂名。当此批复到县时，我正在南京教育部任职，是以实际校务即由县教育会常务理事、老教员董衡仲负责主持，直到1949年一月全椒和平解放。

## 国光蔚起

从校园内东隅石级而上，有几度作为学校图书馆的一座古楼——国光楼。也是县重点保护文物之一。

楼建于明隆庆六年（1572），当时称“尊经阁”，清嘉庆二年（1797）重修，改称“奎光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改称“国光楼”。

书院时期，楼是书院的院舍主体；中学堂时期，楼是学堂的图书馆（后来扩大为县民众教育馆）；今年又修葺一新，恢复成为全椒中学的图书馆了。

民国元年（1912），改称全椒县立中学校时，校长邱景章曾撰书一长联，悬于作为图书馆的国光楼上：

“政革卯酉，统通丑寅。恨老天忒不仁，  
忍抛却四万万黄民，任南拉丁，西条顿，  
北海斯拉夫，伺隙争来。攘攘几家儿，腾  
蹕中原，吁何劫运！？”

尔雅方言，春秋朝报。愿吾党休自馁，好  
准备一双双赤手，算椒伍举，棠专诸，阜  
陵范亚夫，留芳未艾。区区百里境，诞育  
豪杰，是我乡凤！”

与此同时，原中学堂的筹办者之一、县议会议员叶尧阶也作联一付：

“自由钟吼，革命旗翻，风潮随地轴东  
旋，澎湃奔腾，射弩何人能撼海？  
击揖大江，着鞭前路，星夜倚觚棱北  
望，激昂慷慨，解衣有客正谈瀛！”

两联并悬，传颂一时。

民国二十四年（1935），教育界人士王宗沂等倡修作为全中图书馆的国光楼，当时在湖南任师长的校友王东原曾捐赠《万有文库》一套；旅沪女画家宋秋尘曾捐赠《中学生文库》一套；国民党中央社特派员盛维桢、张祥凝夫妇曾捐赠各类图书一百册；还有各界人士捐赠的。一时大大地丰富了精神食粮。可惜这一楼图书均遭日侵略军付之一炬！又一次“吁何劫运”！

## 人才辈出

曾经在国光楼图书馆里孜孜不倦的学生，后来有不少人出国深造的：如前北师大校长张贻惠、化学系主任张贻志教授和张贻侗教授，心理学家、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周先庚教授，蚕桑学专家、江苏省政协委员常宗会博士，安徽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副厅长王修愷博士，卫生工程专家、淮北矿专前副校长朱皆平博士，省文史馆员、全椒中学校长汪东木，参与福建人民革命政权并遭汉奸杀害的爱国人士阮明，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炮队总指挥官童焕文中将等；在国内高等学校毕业、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有测绘专家张贻信、理化专家，曾任省九师校长的汪开崧、教授汪开模、江绍英，省中医院副研究员尚启东，老诗人

叶国璋，和毕生为教学而尽瘁的周介藩、董衡仲等。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任县、团级以上干部的校友有：王永（王尧燮）、时生（曹万书）、童甦群（童志澄），罗应生（罗德聪），何若人（何朝钺）、马翠群、吴均和、卢其龙等。

现居海外和台湾省的高级人士中的校友有：著有多种经济学专论的金克和教授，著有蒙藏问题专著的高长柱，高级工程师王南原，工程师金元善等。

此外，在国内高校毕业后，获主任工程师、工程师、教授、主任医师、主任会计师、经济师、农艺师等职称的和博士硕士研究生研究的校友，更不胜枚举。正是：春风万里，桃李成荫。

## 结束语

今天这一所全日制的全椒中学，有高初中二十六班，学生一千五百余人，教职工一百二十人。学校有新建的三层教学楼三幢，二层的一幢，图书楼、实验楼、宿舍楼鳞次栉比，校舍已扩增到包括原女小、一小、夫子庙和国光楼东的老菜园，明伦堂后直到肖江宗祠、马益兴后院——也就是比建国前扩大了八倍以上。气象一新，正在为四化建设而培养、输送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

一九八五年五月

# 解放前兴办全椒县农业职业中学经过

江金惠

解放前全椒县立农业职业中学从一九四八年初筹备，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学，到一九四九年元月结束，虽然时间是短暂的，但却反映了当时群众和一些人士迫切要求改变农村文化低，技术落后和贫困的愿望。我县是个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地区。境内绝大部分是丘陵，地势平均海拔一百公尺左右，最高的龙王尖也不过三百一十多公尺。这些丘陵水源丰富，宜林宜牧。我县有栽种桃、李、杏、梨、柿、栗各种果树的历史，也有培植桑、竹、苎麻的经验，更有开辟茶园及用材林木的广阔前景。但是解放以前，由于长期封建统治，致使农民缺乏文化，不懂技术，生产落后，资源荒废，童山秃岭，景象萧疏，因此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针对这种情况，我县群众和县参议员们要求在农村开办一所农业中学，就近招收农民子弟入学，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水平，以便他们毕业以后，能够开发家乡资源，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一九四七年夏，潘禹三和阮业明等在同乡程亚柱同志家会见时（当时亚柱任合肥《公正报》总编辑，我在中正学校教书），禹三同志谈到要在家乡办农业职业中学的想法。这一倡议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一致认为这是一件对家乡人民切实有益的工作。经过商量，他们要我回家乡主办其事。

万事开头难，何况校舍、经费、人员一无所有，而我自己

---

本文作者现北京市海淀区业余大学离休干部



又很穷，靠工资维持生活，不能一日无工资收入，更谈不上出资办学了。总之，主客观都存在困难。不过，我知道开拓任何事业都不容易，都要付出代价，所以我尽管知道困难重重，还是接受了任务。

接受任务之后，我又仔细地分析了存在问题，认为要想搞好这项工作，第一要速战速决，要在最短期内筹备开学，因为筹备时间越长，耗费越大，困难越多，越难支持；第二要依靠群众，只有群众通力协助，才能速战速决。根据这两条方针，首先我乘仍在合肥教书之机，事先拜托我在省教育厅工作的同学张俊、张兴宗，请他们必要时帮助“农中”解决备案问题（当时创办学校须经省教育厅备案），以免事后全椒、合肥两地往返，费时、费财、费力。其次，一放寒假，我便回到家乡着手工作。当时全椒中学校长章寅辞职，一时未找到适当人选，县政府派我一面担任全椒中学校长，一面筹备职业学校工作。

所谓筹备，就是聘请教职工，筹备财、物。可是当时政府没有预算，无钱可领。无钱当然无物，钱物皆无，办事也就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依靠群众来解决。春节一过，我们便以潘禹三、阮业明和我三个人的名义邀请全椒农村各乡人士于古历正月十四至十六日在小集开会，商讨办法。这次会开得很成功，农村各乡人士都出席，并一致表示支持。会议通过，校址设在小集附近的三塔寺。这是因为第一，地点适中；第二，利用原有僧舍，稍加修缮即可招生开学，大大节省筹备时间和经费；第三，可以利用寺庙附近田产作为实验园地，便于教学。会上还通过地方赞助学校开办经费的办法。仅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这样原则上解决了人事任命，校址确定和开办经费这三个主要问题，取得速战速决的初步胜利。

尽管如此，学校一时仍无经费，所以我不得不一方面私人

向同学李玉珊暂借大米两千斤（当时通货澎涨，货币贬值，借贷均以实物计值）作为筹备费用；一方面请杨仁玉、李德义负责总务工作，收集地方资助款项，着手修理校舍，购置桌椅。在此应该说明：这一期间所有参与这一工作的人都没有任何报酬，完全是自己出钱出力尽义务。这一点似乎不可想象，但它确系事实。因为当时学校还没有开学，政府还没有编制，从而政府不发经费，当然也就无处可拿报酬。不过，我们却是明知没有报酬而自愿参加这一工作的。

经过半年努力，我们修缮了两座教室，办公室，宿舍和厨房，其中包括部分学生宿舍，购置了八十套课桌椅，为学校招生开学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学校所在地三塔寺是个偏僻而又孤立的寺院，离最近的小集还有三华里。这里没有汽车，没有电灯，没有商店，除了正月十五举行庙会的时候，平时很少有人来到这里。庙里有十殿阎罗，胆小的人白天都不敢进去。这样的鬼地方谁愿意来工作？说到待遇，更是可怜，一位教师一月工资折合大米一百多斤，说实话还没有一个做小买卖的挣得钱多。所幸不是所有的人都向钱看，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贪图安逸，而是有相当一批人愿意做些切实的、对人民有益的工作。至今我一想到当年和我甘苦与共的老同学和老朋友，我都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感谢他们。他们有王维摩（安徽大学毕业）、李云鹤（安徽大学毕业）、陈德生（安徽大学肄业）、吴庆芬（安徽农业专科学校毕业）以及徐成、崔贤璋、陈先本、华秀峰、江金莺等同志。他们分别担任学校行政工作和教学工作，都曾积极地为开办这所学校作出贡献。

学校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开始招生，这时全椒中学校长由张汉英接任，我专办农中。根据我县的地理环境，亟需发展森林

及果树的特点，农中决定首先招收林业及园艺各一个班。每班四十人。在课程设置上，我们考虑到培养学生将来继续深造和自学的 ability，决定在一年级开设语文、数学、英语、生物、历史、地理、体育、农业概论等课程，以打好学生的知识基础，学校于当年九月上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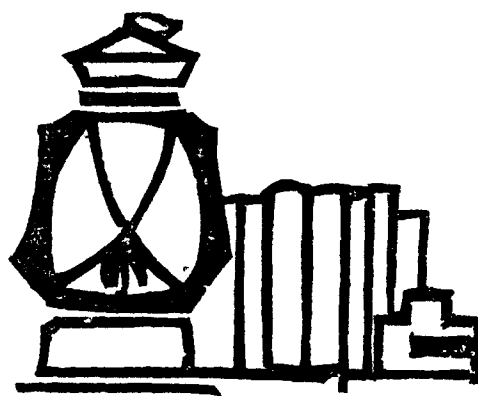
学校对入学学生实行走读与住校相结合的办法：附近学生实行走读，在家宿食；远道学生住校，宿食由学校帮助管理。学生除根据自己条件和需要决定自己伙食标准，提交费用外，学校不再收费。因此，学生所花费用较少，适合农村贫困学生的情况，受到学生家长的欢迎。

学校开学以后，县政府才开始按普通中学标准发给经常费，即教职工的工资和办公费。记得当时教师工资折合大米一百五十斤左右，一般职员一百二十斤左右，生活十分艰苦。再者，当时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政权已经土崩瓦解，县长吴翹将大批公粮外运，准备逃跑，一切工作处于瘫痪状态，但是我们学校全体师生仍然坚持上课、坚持工作，直至学期结束。

一九四八年底，潘禹三同志回全椒主持县政工作，程亚柱同志也回全椒协助，他们积极准备起义，迎接解放。他们都十分关心学校的前途，解放前夕，我曾和程亚柱同志具体讨论了学校的未来，当时我们都考虑到这所学校开办伊始，基础薄弱，继续兴办，需要大力投资，而解放以后必然百废待兴，一时有无力量，难以预料。特别是现有教职员多系外地同学和朋友前来支援的，各人情况不同，将来能否继续留任，更难把握。因此，我们作了两手准备，如果有力量则继续办下去；如果条件不足，则将这个学校并入全椒中学。解放后亚柱在全椒县主持教育工作，旋即收到他的来信，告诉我县政府已经决定将学校合

并到全椒中学，学生已经作了妥善安置，让我放心。于是我便去芜湖担任安徽学院外语系助教了。全椒县立农业职业中学就这样结束了短暂而艰难的历史。

三十七年过去了，现在在全国各地已普遍建立了农业中学，但是家乡许多的年青同志可能不知道在那样黑暗的旧社会里还会有人能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而努力。始终爱护这所学校的程亚柱同志已经作古，积极赞助开办这所学校的潘禹三同志已经年逾古稀，家乡了解开办这所学校始末的人已经很少，我作为这所学校的创办人有义务说明这一历史情况。



# 全椒县最早的电影院

张田有

解放前，全椒县城工商业不景气，人民文娱生活贫乏，只是有些寺庙，在菩萨过生日时，乡人从外地请来戏班子唱唱旧戏，时间也不过三五天。一九三零年前后，朱云鹤、江中文、孟楚卿等倡办电影院，招股集资，从南京买来发电机、放映机、电灯、电线等设备，利用夫子庙房屋做电影院。放映场在孔庙的明伦堂。明伦堂五大开间，相当宽敞，可容纳七百多人。发电机安装在明伦堂后进启圣殿，银幕挂在明伦堂东墙，西院几间屋做卖票房和办公室。坐位用长板钉成，约二十多排。每晚放映一场，场场客满。我父亲张树村是股东之一，我家发有入场券。我那时才十三四岁，时常去看。

那时放的影片，都是黑白片、无声的，记得一共放过五六部故事片和几部纪录片，纪录片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故事片放过《破镜重圆》、《小英雄方世玉》等，一次放映一部外国纪录片，内容是一家钢铁厂，正在冶炼钢铁，高大的厂房庞大的机器，工人手执钢钎，在铁水奔流、火花四溅中操作，场景壮观。观众惊叹不已。群众初次接触到现代文明，开阔了眼界。后来这所电影院，由于租换影片不及时，经营管理不善，特别是人民收入低，观众日益减少，造成亏损而破产。这就是全椒县最早的电影院。

---

本文作者现为全椒县政协委员

# 全椒最早的一份刊物——《改良浅语》

陈葆经

为了写《志》，我曾于1984年9月先后拜访了两位八十以上高龄的老人（省中医院副研究员尚启东和县医院主治中医师汪岳尊先生），承告有关全椒最早的一份刊物——《改良浅语》的创办和停刊经过如下：

民国五年（1916）基督教徒杨海如等接受教堂津贴，筹办油印16开本的《改良浅语》，以宣传改良风俗（如发“香楮券”，建议改革婚、丧旧礼、提倡节约、介绍地方掌故……）为主，摘旧、新约全书语句以补白。封面除刊名占五分之一外，全系正文、无插图，每期印300份，半销半赠。

民国八年（1919）“五四”运动开始，由县教育会接办，副会长金作砺（肖岩）任主编，小学教员米光炳（星如）任副主编，李世余（庚九），吴承潞（佩之）任编辑。并向当时的北大学生周介藩（字屏东，安大历史系讲师，已死）、保定军校学生惠济（字民桥，贵州省文史馆员，已死）、唐山工学院学生朱泰信（字皆平，淮南矿专副校长，已死）南洋中学学生汪开模（字轶少，安徽师范学院教授，已死）……等等以及本县教员董衡仲、江兆沂、叶家楷、金凤翥、刘金波、尚启东等征稿。从此，在“五四”提倡新文学的影响下，刊物内容一新，提倡白话文，语体诗，号召男女剪辫，破除迷信。如周介藩剪辫后自题小照：“专制圈，困微躯十八载；奴隶帽，戴同胞三百年”。金作砺作春节习俗新诗有“鸡抓豆，斩肉园，一壶冷

酒闹猜拳”的通俗句子。汪岳尊先生还记得有一篇介绍“太平桥”历史的文章。我少年时从家藏书堆中也见过此刊物，有民国七年（1918）秋，李世馥悼念先兄剑虹的一首长诗，其中有：“剑可杀贼，虹气如龙”这两句。还有当时全椒中学中文教员汪仑元（乾初）所作一付挽友联：“勤勉过人，精细过人，留给子孙做榜样；储蓄救国，节约救国，改良社会革奢华。”汪先生古文根深，受“五四”之熏陶，能写出这样对联来，受新文化的影响所及，于此可见。

“五四”后的《改良浅语》仍16开本，改油印为铅印，改由江苏第一模范监狱附设印刷组以铅字承印，每期印600份。

民国十年（1921），金作砺病逝，米光炳赴沪深造，乃告停刊。



# 回忆全椒县桑蚕指导所

常宗会

## 一、求学及从事蚕桑事业的经过

我祖籍全椒，家住北乡西王庙枣树刘常家竹园。家庭务农，兼营酿酒。我六岁入私塾读书，十一岁进全椒城读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十五岁考入县立中学。毕业后，于1915年考入安庆龙门师范。1919年12月份去法国勤工俭学。先在法国蒙白垒（Monpellier）农业专科学校桑蚕科毕业，接着又进郎西（Nancy）农学院学习，获郎西大学理科科学博士学位。1925年归国后，任东南大学农科蚕桑系教授。不久又任南京蚕桑试验场场长。在职期间，使该蚕桑试验场不断扩充壮大，达到年产改良蚕种五万多张，与苏州、镇江两地形成鼎立之势。

## 二、成立全椒蚕桑指导所，发展家乡蚕桑事业

我国蚕丝在国际市场颇著声誉，丝绸是我国主要出口商品之一，经营者多获重利。在我回国时，上海、苏州、无锡、杭州等地丝厂林立，因此需茧量很大，而农村的土种茧产量低，质量差，丝厂都争购改良蚕种茧。在此形势下，《中国合众蚕桑会》应运成立。该会以法国商会董事长麦田为主持人。我与该会法国总工程师维埃尔素有交往，因此在总会会议上我提

---

本文作者原为江苏省政协委员



出。江苏、浙江两省推广良种很有成绩，安徽也应推广。这一提议得到总会同意，并委托我全权办理，并作出十条决定如下：

1. 成立全椒与青阳两个蚕桑指导所；
2. 这两个所隶属于南京太平门外蚕桑试验场，技术人员由该场选派，经费由该场负担；
3. 联系当地县政府取得支持，对广大农民进行宣传使农民懂得改良蚕种的好处；
4. 赠送桑苗；
5. 赠送蚕种；
6. 共同催青，稚蚕共育；
7. 估计桑叶产量，按桑支种；
8. 介绍外商到县设立烘茧灶，收买改良茧；
9. 议订收茧价格由指导人员参加，与农民、厂方三个方面共同议价。保护农民利益。
10. 改良茧价每斤比土茧价高五至十元（银元）。

全椒蚕桑指导所的地址在全椒河湾，房屋是租用邱源盛杂货店的房屋，地方宽大，可作稚蚕共育的示范场所。第一任所长名路振维，江苏宜兴人。第二任所长为邱仲谷，全椒人，原系该所技术员，因工作勤恳，事业心强而提升为所长。

指导所成立后，向农民开展宣传。我亲自在大会上讲了改良蚕种的意义以及养好改良种蚕的方法，结合放映冯玉祥将军参观晓庄指导所影片，农民非常欢迎。

指导所自己养蚕示范，接待农民来所参观，推广养蚕技术的先进经验，按时派技术员下乡巡回指导。我又与无锡丝厂联系，劝他们将每张一元的改良蚕种免费送给全椒农民。每张蚕种有28圈，可以出25—30斤鲜茧，每百斤收购价35—40元，（银元）而土种只有30元，产量还低。

当时的桑树都栽在家前屋后，路旁，不占良田。一棵桑树可采几十斤的桑叶。

指导所对改良蚕种养得好的农户进行奖励，曾有一户农民得奖一头大牯牛（约值300—400银元）。滁州专员沈鹏还亲自来参加评比发奖大会，影响很大。全椒县县长杨中明是南京安徽中学的校友，我是安徽中学的校董，他对我很尊重，见我办蚕桑为家乡出力，当然十分欢迎。

全椒蚕桑指导所从一年只发出几张纸（蚕纸）发展到发出一千张纸，有的农户达到户产茧250斤以上，农民收入大大增加。全椒蚕桑指导所成立于1932年春，后来由于我国厂丝的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人造丝的强烈竞争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而衰落，蚕桑事业受到严重摧残。全椒蚕桑指导所于1935年结束。虽然如此，全椒蚕桑指导所已在全椒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三、几点体会

1.农村开展多种经营，蚕桑是很重要的一项。

桑树不占地，栽在路旁可遮荫，叶子可养蚕，养羊。桑椹可酿酒，制药，树皮可造纸，树干是上等的家具材料。养蚕可发挥老弱妇孺的作用。

2.安徽人才很多，散在全国各地，海外也有，要希望他们到安徽“寻根”、“认根”，发挥他们爱祖国，爱家乡的思想，为家乡做贡献。

3.发扬安徽人民吃苦耐劳和土地面积较多的优势，学习江苏、浙江等地区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经验。

我今年已经八十六岁了，年老体衰，不能再为家乡贡献力量，感到惭愧。现在应家乡父老之命，写这段回忆十分高兴。敬祝我的家乡全椒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 罗将军在全椒二三事

孙梧明口述 费学义整理

罗炳辉将军是云南彝良县人，生前英勇善战，敌人闻风丧胆。对于部下，他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具有慈母的心肠，是一位深受军民爱戴的首长。现将他曾多次率部在全椒县活动的二三事敬录如下。

## 铁质兰色公文箱

一九四〇年的一天，我挑着两个两尺对方的兰色（兰油漆）公文箱子，随着罗司令从来安马集湾赶到周家岗。当时我干的这门活算是最轻的了。箱子里装满了党的重要文件，还有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司令的一副望远镜。两个箱子上配有两只小铜锁，它被司令的双手磨得发亮。

这两个公文箱说起来是我挑的，其实呀，我们的罗司令可挑一半。平时我们行军，他看我累了，就下马走过来说：“给我挑挑，梧明同志，你歇一歇！”“那可不行呀！”“为什么不行呢？我还比你有劲呢！”司令说完以后，拍拍胸口，接过两只箱子挑着就走。

记得一次在全椒境内，要涉过一条小河。因为我的个子矮，便把裤筒卷得老高的，把箱络子的绳索往扁担两头绕得短短的，挑起箱子正好过河，一下被司令看见了。他说：“梧明同志，看你也不告诉我，你个子矮呀，快让我来挑吧！”我说：“司令，那能让你挑呢，再说箱子是经过油漆的，绝不会浸水进去的。”“你看我的个子比你高呀！挑起箱子好过河。”

完他说便严肃认真地接过扁担，挑着就走。我知道司令是说到那做到那的人，因此我也没有说下去了。

现在回想起我们的罗司令，你别看他是个司令，可跟我们士兵是一个样，一点当官的架子都没有，他时刻关心同志。

## 罗司令挑粮

一九四一年春天，我们的部队来到全椒县周家岗，当时我们的县政府也设在那里。那时候粮食可真是宝中之宝了！眼看着我们的粮食快吃完了，必须到枣岭集去挑粮。

这一次我们一共去了三百人，带去二百多付担子和一百多支枪。一大早司令就穿上一套灰色的军装，脚上穿了一双草鞋，腰带上挂了一条白毛巾，担着一付挑子，领着我们从周家岗出发了。

我们接连到枣岭集挑了三次粮食，都是由罗司令领着我们去的。他每次都和大家一样的挑着沉甸甸的担子。每当罗司令去挑粮时，大家都劝他说：“司令，你军务重要，事情忙呀，不能去挑粮！”“怎么不能呀，要知道粮食是宝中之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就一定要挑粮食。”

有一次，在运粮的路上，队伍里有位战士小周（名字记不得了，周岗人），他的脚被磨出了血，被司令发现了。司令匆忙地走过去，一把拉住他说：“小周同志，快把担子放下来，去卫生员那里敷些药。”“不。我还能挑！”“不行。”司令严肃地把粗大的手一摊说，“不准你挑粮了，这是命令。”

顷刻之间，战士们都走过来要分担小周所挑的粮食。司令固执地接过小周的担子说：“谁来挑我都没有意见，不过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司令你快说。”“谁的个子比我长得

高，谁就替小周挑粮食。”罗司令接着又说，“身大力不亏，这里该算我的个子顶大了吧，因此还是把粮食加在我的担子上边。”

## 军民互爱 亲如手足

罗司令经常教育我们：要爱护老百姓，要关心群众，要珍惜他们的东西，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借群众的东西用过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一九四一年秋天，我们驻在周家岗，记得警卫班里有位战士王学荣（天长县人），因为手榴弹的袋子裂开了，而自己的针线包又丢了，就向老百姓要了一根针线把它缝起来。这件事后来被司令知道了，就找到王学荣，对他进行教育说：“你还记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我们革命就是为老百姓，所以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我们都不能够随便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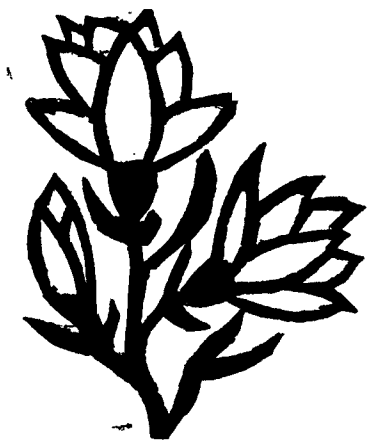
罗司令经常关心群众疾苦，处处为群众着想，还表现在他每到一处总是访贫问苦。老百姓一有困难，他就千方百计设法帮助解决。一九四一年元月，我们队伍从定远三和集赶来周家岗过春节，临出发前，司令发现住在部队附近的有三户老百姓没有年夜饭米下锅，他马上叫炊事班送去粮食分给这三户人家。到了周家岗驻地，刚一住下，司令就去了解群众情况，发现同样有几户无年夜饭米下锅，生活十分困难。司令迅速通知炊事班送粮去给困难户过年。第二天他还亲自去走访这几户人家。群众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说：“共产党就是我们穷人的救命恩人。”所以我们的队伍来到哪里，就受到哪里老百姓的敬佩和爱戴

一九四〇年以后，我们在周岗、枣岭一带同敌人三次周旋较量，在敌势优、我势劣的情况下，一次失守，两次克敌制

胜。这虽不象三夺来安城那样激烈，但却打得敌伪晕头转向，狼狈而逃。敌人只要知道罗司令率部驻守在周岗、枣岭一带，就不敢轻举妄动。因为这些地区在四〇年前属于拉锯地带，敌伪经常来干扰、捣乱、破坏——烧杀抢掳，无恶不作。所以老百姓一旦见到人民子弟兵，真是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充分体现了鱼水深情。

罗炳辉司令关心子弟兵，爱护老百姓的伟大形象，对我来说，一辈子也忘记不了。说起他忠于革命，热爱群众，关心战士的事情太多了，是说不尽，写不完的。

本文摘自《奔流》月刊



# 张云逸将军轶事

章家骥 整理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于一九三九年初春，设在我马厂镇西北约两华里的濠沟许村。军参谋长兼江北总指挥张云逸将军，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深入下层，接近群众。如今四十六年过去，但将军的言行举止，仍给人们留下深刻的记忆。

## 一、一堂深刻难忘的军事课

三九年三月一天下午，张将军偕同一位随员，身着灰粗布军服，面带笑容，步行到我父亲（王稼宗）在山王村办的私塾里。当将军健步跨入教室时，我父亲正在对三十几个同学讲解《左传》中的《曹刿论战》一篇文章。父亲立即中断讲课，迎上前去，并叫我给张将军让座倒茶。记得我用两只粗瓷碗倒了两碗山茶送上，将军接后问我是谁，父亲如实相告。而我当时不知来客是谁，只猜想可能是新四军中一位当官的。事后听父亲说，他早听我大伯王可宗（当时在马厂区署任职）讲过，新四军江北总指挥张云逸将军最近来在濠沟许村。父亲今天一见来客，气宇不凡，谈吐出众，即已意识到来客是张将军了。谈话开始时父亲显得有些拘谨，而将军微笑着先拉起家常，询问私塾的情况，并说他幼年曾就读于私塾，那位老师很严厉，但自己确从中获得不少知识；参加革命后，仍经常怀念那位私塾

---

本文整理者现为离休教师

老师。父亲见他如此平易近人，态度又十分和蔼，遂消除顾虑，谈话也十分融洽，颇似旧友重逢。

既而，将军问我父亲对《曹刿论战》一文中“长勺之战”，弱鲁打败强齐一事，有何看法。记得父亲说：平民曹刿深谋远虑，鲁庄公从谏如流，左丘明的文章言简意深，文笔优美等。将军听后，在表示同意时说出他对这篇文章的看法：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的“长勺之战”，是我国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有名战例。曹刿是一位杰出农民军事家，他眼光远大，排除众议，在与庄公交谈中，先了解鲁国在战前的准备，能取信于民，可以一战。仗打起来以后，又能正确分析敌我双方虚实关系，知己知彼，料敌如神，抓住时机，大胆而果断地进攻，终将实力强大的齐军打得惨败，使弱鲁转危为安……接着又结合当时国共合作抗日问题谈了良久，直至傍晚方始离去。我随父亲送至村前，将军与我父亲握手告别，并说有时间将再次来访。可是随后战火纷飞，将军忙于军务，不久离开我地，再也没有来过。

那次张将军对《曹刿论战》一文的思想见解，不仅启发与教育我父亲，也是对我们私塾学生上了一堂永远难忘的深刻的军事课。四十多年过去，回忆往昔，恍如昨天。如今中国大地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尚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终将不可一世的日寇和蒋家王朝打倒，这是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不也是取信于民，深得民心的结果吗？

（县政协委员王延起供稿）

## 二、将军无拘无束话家常

张云逸参谋长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驻在濠沟许村离马厂区署很近，时常来垂询情况。有次他和老八团政委林凯



一阵来到区署，只见林政委蓄着油亮亮簇齐的胡须，但并不觉得比参谋长老。于是有人问参谋长：“您老人家高寿多大？”参谋长微笑着说：“我今年已五十四岁了。”这时屋里的人一齐把目光投向林政委，参谋长会意了，介绍说：“林政委今年整三十岁，担任政委时，怕人嫌他年纪太轻，少不更事，二十八岁就留了胡子。”说着引起了哄堂大笑，林凯政委也笑了。

### 三、与下级共甘苦

参谋长驻在村上经常和老农民谈天，问这问那，时间久了，军民如一家人一样互相关心。三九年初冬，天空开始降雪，一位老农民看到参谋长还未穿大衣，就问参谋长：“这么冷的天气，你的皮大衣为什么还不穿？”参谋长说：“我们的战士还穿单衣，我怎能穿大衣？”后来村上老人都知道了，一齐来劝参谋长穿大衣，并说：“你已年过半百，身负重任，如果病倒了，怎么得了，为了抗日救国，你保重身体要紧。”参谋长在村上老人一再要求下，才勉强地披起了皮大衣。这件事很快传出去，广大群众无不为之感动。

### 四、保证战士学习时间

一九三九年三月的一天上午，我和区动员委员会三位同志到指挥部汇报情况和请示工作。张参谋长亲自拿烟沏茶殷勤地接待我们。一位通讯员坐在桌子旁边看书写字，动也不动。我们几个人都困惑不解，当时又不好问。有次在另一场合见到参谋长，还是向他问了这件事。参谋长说：“我们新四军不问是谁都规定有学习任务，这是我们打胜仗的保证。那次你们去我那里，通讯员正在执行学习任务，所以生活上的事，就是我的任务了。”参谋长讲着笑了，我们不禁肃然起敬。

（原国民党全椒县第五区区员王可宗供稿）

# 忆我的哥哥金春祺

金春林 供稿

吴坪 整理

每当我想起我哥哥金春祺为新中国的诞生而献出年轻生命的时候，既为失去一位好兄长而悲痛，又为能有这样一位好哥哥引以自豪。“襄河岸边育新秀，图云关下祭忠魂”，他短暂的一生中勤奋学习，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的事迹，使我永远难忘。

## (一)

一九二二年七月八日，我的哥哥金春祺出生于全椒襄河南岸古儒学巷（旧称金家巷，今县委党校附近）。他自幼聪颖过人，性情倔强，富有反抗精神。他年刚七岁即入私塾读书。一次，因塾师对他责备不当，他据理争辩，不甘受无端训斥，回家虽受到父亲教训，但事后父亲得知详情，却暗地在母亲面前夸他“敢于据理反抗”。

不久，他进了“全椒县立第一小学”读书。一九三一年日寇制造了“九·一八”事件，强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人民要求收复失地，抗击日寇侵略的怒火，很快便燃遍祖国大地。刚刚九岁的春祺哥哥就在老师指导下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记得，有一回他站在凤凰桥（今宝林路东段）叶家茶馆门口一张大桌子上，宣传抵制日货，抗日爱国的道理。他的讲演虽然是童声稚气，但慷慨激昂。听他演讲的群众越聚越多，皆交口称赞，无不为之感动。

---

本文供稿者为离休教师

春祺哥哥自幼勤奋好学，酷爱读书，十岁左右就读过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他为了满足自己多读书的要求，除了节省吃零食的钱用来买书以外，还设法借书读。因此，一到学校放假，他便成了“县民众教育馆”阅览室里的“常客”。

他年仅十一岁那年夏天，就只身离家到滁县“省立八中”求学。当时交通不便，滁、全相隔虽不甚远，但对他来说，往返是颇为艰难。他初入“八中”，心里虽时常想家，但由于求学心切，每个学期中途从不回家一次。

一九三六年，他刚十四岁，于“八中”初中毕业，即考入安庆“安徽省立第一中学”高中部。入学不久，他不幸患了伤寒症，被迫回家休学一年。翌年，他病体稍愈，便毅然返校复学。

## (二)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学校提前放假，学生被疏散回家，他只得回归全椒故里。同年冬，日寇占领南京，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全椒县城也于十二月二十二日沦陷。自此，刚进入青年时代的金春祺开始了流亡生活，只身辗转皖、湘、浙、赣等地。他途经浙东，曾投奔过于该地国民党政府任职的表兄叶××，后因不满其腐败政治现状，旋即离去。不多时，他得知“安徽一中”在皖南复校，便不避艰辛赴校报到，直至一九四三年于该校读完高中。毕业后，他力求深造。由于此时高等学校多迁往西南，他只得向大西南长途跋涉，寻求升学机会。

他流落到贵阳，为经济困难所迫，不得不首先寻觅栖身之所和解决眼下生活问题，几经周折，才找到一家酒精厂搞化验工作。因当时报酬微薄，每月收入除挤点钱买书以外，余下的已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所以他只得在一月当中，常有好几天

只吃一餐饭，仍不忘坚持自习功课，准备报考高校。以后，他又多方设法，转到贵阳市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一边工作，一边自习，终于在一九四四年夏，考入了“国立贵州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

他进入“贵大”后更加勤奋学习，加之接触了一些进步同学，和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贵阳的黑暗社会景况，因而思想逐渐进步，觉悟不断提高。

日寇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谈，发动内战，大举向解放区进犯。一九四六年中共中央暂时撤离延安作战略转移，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危言耸听，大肆鼓吹，刊登“胜利”消息时，春祺哥哥便公开向同学们说，“据外电报导，实际上他们（指国民党）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城。”

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种种骗人的宣传极端蔑视，常和李学聪、章书年……一些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议论，针对各种反动宣传，予以驳斥和揭露。他就说过，“你（指国民党）说你好，贪污腐败，一片黑暗，我们都看到；说共产党不好，我们没看到，敢不敢让我们到延安去一下”，“国民党政府昏庸无能，暴虐腐败，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我看，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在于共产党。”他平时总想方设法找一些进步书刊，和李学聪、章书年、叶慎真……等要好的同学们在一起互相传阅。一九四七年，特务头子、贵大校长张廷休的老婆黄东升，贿选“国大代表”时，他对李学聪等人说：“真不要脸，她凭什么当代表？”选举那一天，他把选票撕了，根本未去投票。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困，由于外受侵略，内受腐朽的政治制度束缚，形成农业十分落后所致。他常说：“中国是以农立国，蒋政府迟早是要被推翻，今后必须首先改革农业。”因此，他专心致志研究许多国家的农业经济体制，以探求仿效之途

径。他的毕业论文就是以《我国实施合作农场关于劳力和土地的研究》为题。在他给我的一封信中曾叮嘱我：“平时应留心农事，我想将来回乡能和你一道开办农场，为改变家乡农业面貌做点贡献……”此信至今仍保存我处。一九四八年他以全班第二名的优秀成绩，毕业于贵大农业经济系，并被留校担任该系助教。

### （三）

一九四九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已濒于灭亡，仍图作垂死挣扎，到处特务罗网密布，残酷镇压人民。曾任过国民党政府首都卫戍司令的谷正伦，此时正担任贵州绥靖公署二级上将主任，兼贵州省主席，省保安司令及省军管区司令，对所辖地区人民的镇压尤为残暴，除政治上高压以外，并对公教人员及公费学生，在供给上克扣，甚至停发。

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从三月二十六日开始至五月间，国立贵州大学进步师生，多次开展了“反内战，反饥饿，要和平，要活命”的爱国民主运动（称三·二六事件）。他们举行罢课，游行示威，上街讲演，唱进步歌曲，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一九四九年六月，贵大校长张廷休（国民党中委）与谷正伦暗地勾结，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首先下令逮捕这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贵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安徽籍学生史健。我的哥哥金春祺对每次运动都积极参加。当白色恐怖笼罩着贵阳，特务到处搜捕史健及其他几个进步同学的危急关头，他不顾个人安危，把史健接到自己住处，掩护起来；自己带头捐款、赠物，多方设法为史健筹集路费，探寻去云南找共产党游击队的路线。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他和胡业民、班泌儒一道护送史健离开花溪，脱离险境。国民党贵阳保安司令

部获悉此事，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下令逮捕了我的哥哥。

#### (四)

春祺哥哥被捕入狱以后，特务到他的宿舍查抄，拿走了他的写有拥护共产党和反对国民党暴政的日记。敌人在审讯中对他施以种种酷刑，诸如挟指头，锥指头，灌辣椒水以及昼夜不停地进行疲劳审讯。他都坚贞不屈，坚不吐实，并咬牙切齿，义正词严斥责敌人的种种罪行。

在狱中，他强忍着敌人残酷折磨所造成的痛苦，去照顾伤病难友。贵大工学院学生胡业明和他关在一间牢房里。胡业明身带刑伤又染上了痢疾，行走艰难，每次上厕所都是我哥哥背着去。春祺哥哥对敌人威武不屈，对同志亲切关怀的表现，使难友们深受感动。

一九四九年九月，盘据在大陆上西南一隅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仍然妄图作垂死挣扎，更加残酷地镇压人民。就在新中国于北京宣告成立的前夕——九月二十八日，国民党贵阳保安司令部，对我哥哥下了毒手。这天深夜，天气阴沉，外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几个特务突然打开囚室的铁门，吼叫我哥哥的名字，喊他出去“马上转移！”我哥哥问：“带不带行李？”一个特务回答：“不带。”这时，我哥哥已完全明白特务是要将他置于死地了。他挺直身躯，昂起头走出牢门。几个魔鬼把他带到贵阳图云关黔灵山下，惨无人道地用刺刀戳死，并用刺刀划开肚皮，翻肠倒脏，夺走了他年仅二十六岁的年轻生命，死后，敌人还不准收尸。

春祺哥哥英勇就义后，贵大师生无不为之悲痛。当时的贵大经济系教授陈述元，曾挥泪作词以抒悲愤，以表哀思。词中

写道：

“离别了年迈爹娘，来自天各一方。非刑种种苦难当。坐飞机，压双杠，石灰水，辣子酱，还有那菘藜酒给你尝。这班狗特务都是狗肺狼肝。盼只盼贵阳早解放，血债要用血来还！”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贵阳解放了。贵大师生们曾到特务杀害我哥哥金春祺的地方，去寻找他的忠骨，但已无法找到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贵阳《新黔日报》第四版，以“血海深仇”为题，报导了特务用刺刀开肚剔脏杀害我哥哥金春祺的罪行。十二月二十七日贵州大学为了悼念学运中牺牲的死难同学，隆重地召开了追悼大会。学生会编印了《追悼特刊》，该刊第二页载有《记忆中的春祺》一文。第三页载有《金春祺先生事略》。贵大助教会与农业经济系在他被捕的寓所前立死难纪念碑，以留永念。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二版，以大半版篇幅登载了丘冈×、何非撰写的长篇文章《血海深仇——国民党匪帮在贵阳的暴行实录》详细报导了我哥哥金春祺与其他死难同志和敌人斗争及被害事迹。

时间象行云流水般地逝去，我的哥哥金春祺和我永别已经过去了三十五个春秋。祖国大地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为实现“四化”的征途上奋勇前进，而春祺哥哥却过早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和家人时时怀念他。他的故乡——全椒的亲友们也时时在怀念他。

# 回忆校长印书城

叶 松

一九三九年春，全椒县城第二次沦陷，县政府撤到程家市南的大汪村；全椒县立初级中学随县政府撤至其附近的大孙村，借用孙家祠堂复课。这时，县长汪心森辞兼校长，由印书城接任。我当时在该校读书。

印书城，字雍侯，全椒城内人，清末秀才，擅长古文辞赋，道德文章为乡里推崇。他是无党派的爱国人士，一贯主张抗日，拥护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虽愈花甲，为培养桑梓，不顾体弱多病，毅然出任校长，并兼授高年级的国文课。

当年夏，朱遂任全椒县长，与先生相处甚契，常有诗文往来。在三九年冬的一次“总理纪念周”上，印老请朱县长来校为师生讲话。其后，每逢星期一早晨做纪念周，朱遂县长率领县政府公务人员，来与学校合并举行。朱县长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救亡的关系，孙中山先生主持召开的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等；使我们学校师生开拓了视野，认识到抗日救亡的必由途径。当时，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对朱县长的行政措施，极为不满，散布流言蜚语。而印老则毫无顾虑地为朱县长提供讲台，实属难得。他常对我们说：

“朱县长勤劳俭朴，廉洁奉公，为人正直，其演讲实属至理名言”。

一九三九年冬，朱县长派李翼任全中政治教官，印校长欣



然接受。按抗战时期的中学校设置军事课，派有军事教官任教。公民课，即国民党的政治课，由国民党员教师担任。设政治教官，仅有全中一校。李奚教官年纪很轻，态度和蔼，对学生亲如家人。他常常带领学生深入农村，书写抗日标语，教唱抗日歌曲，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一次，李教官嘱学生赵大勋用石灰水在学校山墙上书写“反对分化政策”一幅大字标语，非常醒目。一天，省教育厅派来一位督学（姓名记不得）来校视察。他走到学校门口，看到这幅标语，便气势汹汹地查询写标语的人。皆云：“是学生赵大勋写的”。赵经传问，被迫说是李奚教官所嘱。督学在学校办公室斥责李奚教官，并罚其“立正”，又命工友刘温取来扁担，扬言杖责后上解立煌查办。印校长见督学如此蛮横无理，污辱教师，气愤难平，说道：

“不能这样对待教师。我们现在是要团结抗日，反对分化。李教官何罪之有？”督学无辞以对，默然而去。

一九四零年春，国民党新桂系在皖东掀起反共高潮，李奚教官于一个夜晚秘密地离开了学校。朱遂县长将全椒县政府迁至马厂后不久被撤职，解送立煌入狱。国共合作被破坏了，皖东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印校长鉴于当时国破家亡，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新桂系在皖东屠杀人民，压榨人民，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写下了悲愤满怀的诗篇。诗曰：

国破心犹在，家亡人未休。  
桂人吸皖血，白鬼笑红楼。  
老子难披甲，小民易断头。  
伤时莫饮酒，入肚更添愁。

# 怀念阮明先生

陈葆经

阮明先生，字哲符，1889年出生于赤镇大阮村。1918年全椒县立中学校毕业，入南京两江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前身），得校长李梅庵之赏识，得与教务长刘仁航之妹刘劲梅女士结为良侣。嗣东渡日本，毕业于明治大学法科。归里，任县劝学所所长，建广果园于大阮村，南海康有为为之题额。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经张简斋介绍，得追随李公济深。李公以机要秘书、北伐军留守处少将参议畀之，旋出任安徽省军事特派员，回皖从事策反。当李公被蒋介石软禁汤山后，先生仍推荐吾乡吴承志（述庵）老先生为李公家庭教师。

1929—1930年李公介绍先生与浙江省主席张难先相识，授海盐县长。为官清正，除暴安良。致仕之日，群众攀辕送别。

1933年11月20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建成立，李公任主席，先生易名“椒青”，襄与其事。

“七七”事变，先生到处奔走，积极宣传抗日。1939年在桂阳曾手书一词，勉励女青年韦瑛，词曰：

轩辕遗胄，古多女杰。  
欧美两洲，仅有达克。  
木兰从军，峥嵘唐牒。  
李秀御夷，晋标史册。  
值斯抗倭，当法前烈。  
勉哉韦瑛。更望出色。

（原件影印本现存县志办。“达克”、“李秀”作者有自注）

1943春末，先生由大后方隻身回皖，在蚌埠与伪省长高冠吾备谈大局，促其抽身。曾赠高七律一首，其颈颌二联为

“眼前景物成虚幻，  
梦里河山似有无。  
不断伤心悲乱世，  
何甘俯首对狂奴？”

先生一度回全椒城，寓印端甫进士故居，自书门联曰：

“替历史争光，上则日星下河岳；  
算做人结局，昔为循史今儒林。”

又书一联于观音阁：

“更涤河山成净土，  
重开楼阁现金身！”

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夏末，返广果园小憩。时全椒中学设程家市西庵，据当时在校学生李文清回忆：先生曾应母校邀，作题为《国难当头、学生应为抗日雪耻而勤读》的训话，并以

“满目河山名士泪，  
一园桃李国民芽！”

勉励诸生。（李文清、县文化局离休干部）

1944年春节不数日某夜，汪伪全椒县第四区区长王德安，派士兵刘绍洲，龚维寿，刘绍发，杨德友等，潜往大阮村将先生绑架杀害于距村二里圩埂旁，终年五十有五。全椒县赤镇乡清兴国民学校校长黄政，率全校师生，参加哀悼仪式；全椒中学学生代表李文清、阮成荣等专程前往吊唁。

建国后，元凶王德安已伏法。1983年，先生在美及国内诸女，奉九旬老母之命，回乡为先生修墓碑，赤镇乡人民政

府给予协助。《全椒统战史料》列先生为爱国民主人士，《全椒教育志》有传，县志编纂委员会、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正向各有关方面，搜集先生事迹，以备立传和撰写纪念专文，用垂永久。

一九八五年六月

蜀道吟  
(九首之一)

叶国璋 遗作

行年五十觉前非，  
服务人民笔一枝。  
喜见清时除旧染，  
乐闻真理学新知。  
税收政策明方向，  
群众支持留去思。  
岂有文章惊海内，  
犹能报国未嫌迟。

(作者全椒人，年五十参加革命工作，  
负责编辑内部业务刊物《西南税务》)

# 忆杨尘因老师

汪传珠

“父子风流大小杨，  
大杨有子更清狂。  
沪滨写秃生花笔，  
曾记新华梦一场。”

这是全椒中学创始人之一，吾乡叶尧阶公《二砚斋诗文集》中一首赞誉杨尘因先生的诗。

诗中的“大杨”是指杨先生的父亲杨攀龙柳桥老先生，老先生是我县清末文化名人，民国《全椒县志·文苑》有传。

尘因先生是老先生独生子，幼聪慧，年十四，进了学。时值孙中山先生倡导旧民主主义革命，先生乃隻身赴沪，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受《申报》馆经理史量才之聘，任该报副刊编辑，因而结识了在上海做寓公的原北洋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唐乃向先生提供了有关袁世凯阴谋称帝活动的电文及新华宫内一些内幕情况，先生便以章回体写成《新华春梦记》小说，民国三年（1914）春出版。当时正值南北对峙，袁世凯之子袁克定即派人到上海向各书店收购此书，又托人出五千银元，向先生收买版权，先生乃迁居租界，避而不见。

《新华春梦记》，封面是灰兰色，书名下署有“杨尘因著，张冥飞校”两行字。边署“亚东图书社出版”。长沙水利电力师范学院图书馆存有残本20回。

---

本文作者为现广西《桂海诗刊》编辑

先生与梅兰芳有交往，书中有“黄浦江边，名优设宴”一章，就是记叙梅在上海戏剧生活片段的。

先生在《申报》附刊上，还连续登载过另一篇长篇小说《江湖二十四侠》。

先生与苏曼殊、柳亚子均有交往，先生生前对我说过：苏曼殊的《碎簪记》，是在日本写成后寄到上海由先生联系代为出版的。苏曼殊生于日本，常来往于中、日之间，在日本曾居其外祖母穗子家，为思念祖国，怀念亲友，在《曼殊诗集》中有：

“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

二句，句下自注：“怀念尘因、亚子诸君”。

抗日战争开始，先生回乡，先君聘先生为家庭教师，课先姐章珠和我，还有李桂年、金永泓、陶孝珍等附读。一天，先生带我们游神山寺，曾作五古诗一首，现在我只能回忆出：“石壁镌三龙、一龙飞折骨”这两句了。不久，安徽省立第三临时中学在巢县油坊集成立，校长贺义昭聘先生为国文教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贺调长嘉山中学，先生又随之到嘉山。

解放后，先生经旧友周信芳，欧阳予倩之邀，任上海戏剧学校顾问，并参加了上海作协。1961年病逝上海。《羊城晚报·花地》曾有文纪念先生。



# 全椒县县城沦陷见闻

吴 德 迟

抗日战争时期，全椒县城曾经两次沦陷。第一次沦陷，日寇盘踞不到五个月；第二次沦陷，日寇占领有六年多。自日寇投降，迄今已有四十年之久，回忆县城两次沦陷情况，（我回忆的主要是第二次沦陷情况）就我亲见、亲闻，予以片段记述，遗漏与谬误，请熟悉情况的各界人士指教。

## 一、县城两次沦陷

自“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当时县城人民开始逃亡。到1937年11月22日（农历冬月二十），日本侵略军先遣队“两角部队”，从滁县城和乌衣镇、分两路进犯县城。县长张其威前两天就向六安逃跑，县政府及县直机关星散，城内居民避难四乡，县城沦陷，不久，城内出现了“维持会”，街上除了维持会里的极少数汉奸替日寇搜刮食物、带着鬼子到附近村庄作恶以外，家家关门闭户，等于一座空城。1938年5月15日夜（农历4月16日）日寇撤退。国民党县长王宗正进了城。1939年4月16日，日寇仍从滁县老路第二次进犯县城，县政府及居民事先没有准备，仓皇西撤，县城第二次沦陷。直到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县政府从程家市进了城，大发“劫收财”。

## 二、组织汪伪政权

当日寇第二次进犯县城，从滁县带来乌衣人石震卿，组织

“全椒县政筹备处”，石震卿任筹备主任，石季超任秘书，周朗为任第一科科长，×××任第二科科长，王三乱子（绰号）任第三科科长，筹备处地点在南门大街。后到40年，这个伪政权改为“全椒县政公署”，43年改为“全椒县政府”，吕咏春、高杰，文北源等先后任伪知事、伪县长。

汪伪政权组织起来了，城内居民虽然比第一次沦陷时多些，但毕竟寥寥无几。汪伪政府为了欺骗人民回城，于是大搞“安抚”宣传。日寇驻滁县的宣抚班，派班员石川和日寇“全椒警备队”治安部部长小川，以及“县政筹备处”的科长王三乱子，在东门何家房子里，集会宣传。王三乱子四处赶人开会，街的东西两头，枪兵放岗，来往行人，一律驱入会场听讲，直到散会，才准离开。宣传时，由日寇轮流讲话，翻译译出，讲的内容，都是“和平建国”，“共同反共”，“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等一套鬼话。当时，城内人民无法讲究卫生，一种叫“抖抖病（似疟非疟）流行，脓肿疮蔓延，日寇假仁假义地推着医药车上街，替老百姓医病，把事先运来的针剂“撒而支”，指定患者去买，高抬药价，大发其财。这就是日寇的“安抚”。

### 三、奴化教育

1940年，日寇设立“全椒县联络官事务所”，联络官叫齐藤辛雄。他指使日汪县政筹备处，开办学校，实行奴化教育。这时东门有几家私塾，他们说私塾教的课本是反日书籍，把几家私塾改为小学，接受“新秩序”教育。塾师们谁敢不依，只有屈从！在何家房子里成立了汪伪第一小学。从南京找来一个通日语的名叫蔡钧当校长。后在南门大街庐州会馆内办了汪伪第二小学，伪校长由商会副会长周慎之兼任。周是一贯媚敌，每逢星期六，邀请日汪头面人物来学校讲话。还有县城西门一家



田姓私塾，被改为第三小学。每个学校都是拼拼凑凑、班不成班、教的课本是战前课本，其中课文，有的被圈掉，有的被撕掉，地理、历史课，一律不准教。日寇为了进一步推行奴化教育，在伪第一第二两所小学，开设日语班。日语班学生，有从社会上招收来的青年，有保送来的，有从伪职调来的，由日寇翻译陈炳南上日语课，日寇警备队，联络部，不断派人来讲话、灌输奴化思想。

#### 四、商会成立 掠夺物资

县城第二次沦陷，日寇在加强军事、政治侵略的同时，通过日汪政权进行一系列的经济侵略活动：

1.成立商会：1940年，原住城内的商人高士文（又名高效子）由滁返全，在汪伪县政府公署授意下，对城内商店、摊贩及手工行业进行登记造册，准备成立商会。因高未得到众多商户支持，商会终未组成，仅留下一份表册了事。后来回城居民渐多，市场情况稍有好转，汪伪政权又指使周慎之着手筹组商会。1941年由孔长金（扬州人、懂日语）出任会长，周慎之任副会长，伪全椒县商会正式成立。

县商会以下分设南货、布业、京货、粮食、木业、浴室、运输、瓦工、酒馆、茶社、理发以及麻、烟、鱼、草行等各行各业公会。各业公会由理事长负责会务。各从业户均须按系统向汪伪县政公署（后改为县政府）领取执照并交捐纳税，负担差役，方可营业。

2.物资交换：1942年，日本商人木春运来一批盘纸、香烟火柴向城内商人换取苧麻、油料等土产品，开展“物资交换”业务。接着有一个乌衣人王国钧在东门大街（今公安局对面）开了一月“同兴麻行”，收购苧麻、生仁等物资与日商换取“洋

货”。这项交易从少到多，逐步扩大，并由木春同驻全日寇联系，使贩运物资来城的人在日寇庇护下安全通行，以利其掠夺物资。

1943年冬，滁县大成面粉厂经理范先敏，汽车公司经理童进贵来县城与孔长金洽谈“物资交换”。在取得汪伪政府支持以后，租赁袁家湾盛家三间房屋，正式建立“物资交换站”，以棉布、盘纸、食盐、食糖、火柴、蜡烛及煤油兑换粮食、麻、黄豆、花生等农产品。他们任意抬高“洋货”、食盐的兑换比值。

这种交换物资的交易范围日渐扩大，连驻在古河镇的国民党皖东军政当局（以下简称古河方面）也和他们挂上了钩。一次，来自古河方面身带“十纵队”符号的一夥三十七人，贩运物资来县城，他们行至斩龙岗，被驻在那里的日寇扣留。汪伪商会会长孔长金外出在二郎口，闻讯赶回县城向日军求情。这夥人全被释放，货物也未受损失。

1944年二月，古河方面的广西军派李明初、秦汉三、李麻子三人来洽谈交易。范先敏、童进贵早在和平旅馆恭候，热情接待。李等人返回古河后，范、童和孔长金三人由城内汪伪保安团副段某派便衣兵护送，三人行至三叉河，古河方面已派人来接。他们抵达古河后，会见了“十纵队”司令柏承君，又在巢县油坊集和广西部队肖团长见了面。从此双方勾结密切，物资交换更为便利。仅此一次，汪伪方面即从国民党“官商”手中弄到苧麻一项就有二百担，此外还有芝麻、黄豆等物。古河方面换得一批棉布、盘纸、火柴、蜡烛、食糖等物。这次货物交换是由南京日商“钱田洋行”与古河国民党军政机构由滁河水路直接兑付的。从此高喊“抗日”口号，反对“资敌”的国民党官商老爷与日商之间的肮脏交易渠道沟通了。

3.食盐统制：1942年汪伪政权按照日本主子的指令建立了“物资调查委员会”、“商业统治委员会”等机构，进行控制物资，实行经济控制。由于日寇的控制，造成当时市面食盐奇缺。汪伪县政府得到驻全日寇联络官的允许，从“滁县盐务公司”运来一批食盐，在全椒城内东西门各设一处“食盐公卖门市部”，由汪伪县政府掌握，对持有“县民证”的居民定量供应，这是日寇对我抗日军民实行“禁运”的阴险手段。汪伪政府当权者对城内居民请领“县民证”故意刁难，有的要花钱行贿方能领到。汪伪政府以调剂为名，给亲信属下批售成包食盐，让他们走私，高价出售，争取暴利，相互分脏。

4.商业组合：上面说到的“商业统治委员会”表面是汪伪政府属下机构，实则全由日商洋行掌握。日本商人在蚌埠设有“中华洋行”、滁县设有“福田洋行”、“三井洋行，专管物资配给工作。全椒城内由县商会主管，组织商人集资入股，成立“商业组合”，集中资金全部交给日商洋行作为固定保证金，以取得听候分配物资的权利。商人每次要请孔长金出面，求日军联络官出具“配给证”，然后带现款到洋行购货。其实，日商洋行是拿这些商人的资本经营，反过来再赚商人的钱。商人自己也自会盘算，最终受害者还是老百姓。“组合”由洋行购进货物，仅以一小部分由商会“平价配售”，大部分货物按股分给商人，让他们任意走私外运高价出售，或“屯积居奇”，伺机获得高利。

## 五、毒害人民

沦陷区里的鸦片烟，是公开买卖，公开售吸。日寇设有统制鸦片烟土的机构，名叫“宏济善堂”，汪伪政府在县级设有“禁烟局”。配合日寇推行其毒化政策，榨取中国人民的钱财。

“宏济善堂”的总部，设在南京健康路，从属于日寇远征军联络部。它们从意大利和日本本土运来红土，烟土分成一两、五两、十两等包装，形似木工用的斧头，烟民叫它“小斧头”、“大斧头”。还有五十两重的大块，叫“大块子”，上面烙有“宏济善堂”钢戳，外用红、黄等色纸包装，供应沦陷区的土膏店。土膏店都是与汪伪政府有关系的人集资开设的。开店的手续：申请登记，交付固定保证金，保证金的数字，须与每次配售的烟土价值相等，经汪伪政府保证，日寇联络官批准后，发给执照，才可开业。

全椒县城土膏店，由汪伪区长王德安、段义彬等组成，地址设在袁家湾马宅，名叫“和记土膏店”，并与乌衣镇吴小平开设的“普济土膏店”挂勾、相互调节，保证供应。在鸦片烟土公开买卖的情况下，城内吸毒人，一天天多起来，到1943年，烟馆达三十六家之多。汪伪政府的禁烟局，名曰禁烟，实际鼓励烟馆营业，好增加税捐。他们征收烟土买卖的捐税，名目繁多，有统税、特税、禁烟税、灯照税。灯照税有售户、吸户之分，又有一月照、三月照、临时照、长期照、按类别交纳灯照税，否则，或抓或罚，以违禁处分。害得烟民既穷又病，走投无路。

鸦片烟馆几乎是日夜灯火，人来人往，川流不息。1943年，日寇把汪伪政府头头们叫到联络官事务所，说是：烟馆易藏“坏人”，天黑一律停止营业，否则就要抓人。烟馆靠夜晚做生意，烟民靠夜晚吃烟过瘾，这怎么办？伪禁烟局和土膏店想出妙计，成立“售吸所”，集中售吸，便于管理。日寇批准，在城内成立了三个售吸所：东门有古城售吸所（现食品公司隔壁），袁家湾有乐华售吸所（襟襄楼）西门有合成售吸所。所内有经理、帐房，司锅等人；设有房间，有一室一铺、有一室

两铺，烟民因而倾家荡产，沦为盗匪和被逼丧命的，时有斯闻。

日寇禁烟局，仗恃日寇势力，对烟民榨取，百计千方，伪禁烟局主任张某，大家叫他张矮子，烟民被其敲诈，恨之入骨。西门贾××，开设烟馆，深受其害，但不敢公开报复，他想出“暗里藏刀”的办法，当张矮子到他家检查灯照时，他用好茶、好酒、好烟，殷勤招待，暗将鸦片细末，掺在茶、酒中，张有利可图，每天必至，久之成了大通瘾。贾见计已成，托病停业，张到别家烟馆，通瘾不能解决，自己买烟，烟价昂贵，因而勒索烟民，更加狠毒，以致怨声鼎沸，被撤职回家（芜湖），无法生活，一命呜呼，烟民闻之，莫不大快。

## 六 慰安所与娼妓

县城沦陷后，日寇约每周派来一些日籍妇女，到日寇驻地与官兵伴宿，名曰“慰安”，第二天就离开。后来听日寇翻译说：她们大都是被征集来的，有组织、名称，每月发给一定的工资。以后那些日籍妇女逐渐不来了，强迫中国的青年妇女代替。

1941年在县城东门环清池浴室正式设立“慰安所”，开始时，有两个日本女人和一个男人住在里面。日伪政府军政人员常在这里置席摆酒，日女在贵客进门时躬身施礼，请安问好，宴席中执瓶斟酒，殷勤献媚。后来不知从何处弄来好几个中国青年妇女住进了慰安所，听任日军前去发泄兽性。这些娼妓性的妇女还外出招摇，勾引汪伪人员外宿。这种慰安所，一直存在一年多。

这时城内出现一个妇女叫喻洪霞，是百子楼喻家槽坊人，嫁在陈浅，不安于家室，背夫跑到县城。喻年不到三十岁，头面生得整齐，喜爱打扮，经日特介绍，被日寇警备队准尉军官

山田信仁看中，于是就赁屋而居，俨然夫妻。从此喻得以出入日寇警戒防地。山田信仁是县城“太上皇”，喻当时成为县城第一流红人。喻洪霞神通广大，抓住这个时机，要大发国难财，一面敲伪政府头头的竹杠开酒馆，一面开妓院。

喻洪霞在袁家湾街襟襄楼，开了一个“全椒乐”酒馆（后改为乐华春），请日汪政府的县长、局长、区长、团副等帮助资金，这些头面人物如王德安等，各拿出伪币（中储卷）五千元，三千元，两千元不等资助。从此喻洪霞当上了大老板。“全椒乐”开张那天，喻打扮得花枝招展，带着从南京搞来做妓女的三个女人，以美酒佳肴，宴请所有资助人。就此一席酒，了结了所有的资助金，“全椒乐”酒馆全属喻洪霞所有了。从此汪伪政府宴客，由“全椒乐”酒馆包办，帮派特务、奸商大贾、日汪人员，都是馆中常客。一时“全椒乐”酒馆生意兴隆。

襟襄楼上东西两角，各有一个阁楼，可容一床一桌，喻洪霞从南京找来三个女人，就在这里公开做娼妓营业。这三个女人无人光顾时为酒馆当招待，招揽顾客。他们卖淫收入，与喻洪霞四六分帐。这时已没有慰安所了，每逢假日白天，日寇士兵，阵阵前来发泄兽性。喻洪霞对鬼子兵也要先付钱才开票上楼，直到士兵一个个发泄兽性完为止。真是与禽兽何异。

喻洪霞在城内趁机收了数以百计的干儿和徒弟，自称“喻大姑”“喻妈妈”，与乾儿子鬼混在一起。山田杏仁调走后，她就与干儿子夏帮才结婚了。

# 古河血案

——柏承君大屠杀记实

陈葆经 潘禹三

## 一、当日之古河

古河是全椒县西南边陲的一个集镇，地与和县、肥东、含山等县毗连。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县城沦陷，设县政府于此。次年五月，安徽省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赵凤藻设署、部于镇西徐家仓房，接着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第五战区第十、二十两个游击纵队司令部，安徽省党部第五区党务督导专员办事处，三民主义青年团全椒分团部，第五、九区行政干部联合训练班，第五区军官训练班，皖东田粮办事处，古河军警督察处，豫鄂皖苏边区党政分会苏皖区会，苏皖党政总队第一大队部等机关亦先后设此。从此，古河即成为国民党新桂系统治皖东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时作为新桂系统治皖东中心的古河，自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第二次国共合作遭到破坏以后，杀人魔王柏承君曾在这里一手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血案。全椒人民，特别是古河人民受害尤深。

## 二、柏承君其人

柏承君字袭侯，辽宁省辽阳县人。1932年前后（确切时间不清），随其同乡和县县长刘广沛任卫士班班长，不久，刘保送他到安庆集贤关安徽省军管区军事教育团受训。他结业回

和县任壮训分队、中队长等职。1937年冬，和城沦陷，他杀死县长赵永智于南乡耿华二村，乃盘踞于南乡姥桥一带，以抗日为名，招兵买马，抢枪抢钱，自称团长，当五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赵凤藻到任后，被收编为第五区保安第二团团长（第一团团团长刘子清）。1938年冬，李本一接任专员，第五战区第十游击纵队成立，李兼司令，保安团改为支队，柏被任为第二支队长（第一支队长刘子清，第三支队长由副司令赵香山兼）。1941年夏，刘子清投敌，秋，姜一华接任专员。李本一专任十纵队司令，迁司令部于大墅街。1942年春，李本一升任138师师长，十纵队司令职由龙炎武接任，柏承君升任副司令，仍兼第二支队长。1943年夏，龙炎武调长八纵队，柏承君升任十纵队司令。秦润民为副司令，司令部设于邱家花园，古河血案也就是从这里泡制出来的。1945年日寇投降后，柏承君部被整编为安徽省保安独立第三团，驻防津浦线上固镇。1947年初，全椒、和县部分被害家属和地方人士向南京国防部控告柏承君，柏乃被逮捕入狱。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经天主教于斌出面奔走，并使用黄金行贿，柏得以逍遥法外，活动于南京、芜湖之间，嗣投靠驻屯溪的安徽省流亡省主席张义纯，参加其保安司令部，妄图东山再起。大军渡江后，又偕其妾安淑英随张义纯转移沪杭，逃亡台湾，任台北市八里乡民众服务馆馆长，1981年在台北市被汽车撞死。

### 三、血案的开端

柏承君自升任司令后，恃其有三千之众，骄扬跋扈，干预各县行政，安插其亲信，妄想称王于皖东。其部属则拉牛绑票，敲诈勒索，凡属第十纵队防地，一时商不能旅，农不能耕，群众怨声载道。1943年夏，专员姜一华调走，由第七军副军长漆道徵兼任，



漆因返桂奔丧，专员职交驻防肥东的171师师长曹茂琮代行。1944年二月，曹曾到各县视察，回古河不久，《皖东日报》上便发表了《歇田与军风纪》一文，锋芒直指向第十纵队。曹又当面批评了柏，柏乃火冒三丈，认为这是有人有计划地打击他，急图报复。于是召集了他手下的五大黑干将，人们通称为“五鬼”的秘书王斗南，助理秘书王铎，军法官程咏农，政治部主任孔繁仁，副官海南屏等密谋策划，要翻掉那篇文章。就在这前后，有司宗彝被逮捕后自首叛变，并被委为“锄奸”大队长。柏乃利用其口供，决心泡制一次所谓“破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便以逮捕李伦才为突破口，揭开了古河血案的序幕。

#### 四、邱家花园的冤声

国民党全椒县政府录事李伦才，家住程家市北洼子李村，李原在本村办小学，抗日战争开始，学校停办，在县政府工作。李思想进步，早在1939年，省动员委员会第二工作团曾住过他家，乃被司宗彝供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柏派特工队长杜震亚把李抓来入狱。柏与“五鬼”密商之后，乃定李为“中共全椒县委书记”，严刑逼供，勒令承招，指定要供出韦雨农、林世忠、罗世华、刘子厚等。接着大逮捕开始，谭文榜、杨继尧、林太阶、蒋玉衡，汪翠岩、金百川、阮业明、王福伟、刘保善、傅明、陈仲豪、杨仁玉、童盛银、雷天鸣、杨寿宗，《皖东日报》编辑张如柏、黄世善以及和县、含山、巢县、定远、肥东等县青年约四百余人先后被逮捕，分别被送进邱家花园、军警督察处、古河的十纵队支队部，大队部内关押。抓去的都是黑名单中所列的“支书”、“支委”，并勒令每一个人要供出其“支部”中包括自己在内的七名成员。

柏承君立即电报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李品仙，一面又派人

送去从南京买来的马裤呢、华达呢、西药、西餐用具等。目的在于求赏。同时拉拢在古河的中统特务为其上报，造成既成事实的局面。柏又向曹报告说：“师座：共产党已打进我们各机关，多么危险！这次如果不是发现得快，我们的皖东很难讲。现在一定要把新四军潜伏分子彻底清出来。”柏一面在表功请赏，一面在发泄对《歇田与军风纪》那篇文章的仇恨。当时各县县长对柏逮捕这大批所谓“地下党”认为不是事实，建议曹把这案件提到专署审理，曹不敢得罪柏承君，更不愿自己找麻烦，但对柏的行为也不表示积极支持，抱着，你（指柏）抓得对，对我也有利；你抓得不对，由你自己负责任的态度。柏承君看到这种情况，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对曹“将起军”来。要曹交出专署主任视察兼《皖东日报》总编辑沙平怡，并说沙已被供出是共产党了。沙理直气壮地到了邱家花园，经过篾千子刺穿十指，被逼从电话里向曹承认他是共产党派来的人。曹明知戏中有戏，却也无可奈何。

邱家花园是土围子，碉堡密布，墙外前有一条丈余深的水沟，后有滁河。在沙平怡被捕入狱后即开始对关押人员进行疲劳审讯，使用多种酷刑，如皮鞭抽打，夹棍夹，指缝加楔子，坐飞机，挂石锁，灌辣椒水……更有甚者，时当正午，酷暑蒸人，陈仲豪被脱去上衣，肩压重石，悬吊树梢，受皮鞭抽打；还有以两束香烧炙两腋，以刺刀直刺两股，林世忠就是在这两束香、十三刀酷刑下度其牢狱生活的，最后仍不免一死。

柏承君的淫威声，五鬼咆哮声，凶手们的狂吠声，受刑者的惨叫和呼痛声，交织在一起，古河邱家花园一变而成为阎罗殿了

## 五、“会审”

此案从三月开始到六月计一百多天，波及到第五区专员公

署所属各县县政府、区、乡及银行、教育、新闻、商业各界。柏承君正式宣称：“皖东基层干部多数为共产党人隐身”。这不能不使代专员曹茂琮感到不安，迭次电请李品仙派人来古河处理此案。这时漆道徵从广西回来了。李品仙于是授权漆道徵并催促其早日到古河结束这一案件。漆乃从六安独山的第七军军部来到古河就五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职，并以皖东军政指挥官的身份，总辖五、九两区的军政大权。漆来古河就职，柏承君认为自己一手泡制的血案，漆如何决定，关系重大，因此，对漆极尽其逢迎之能事。漆来古河前两天，柏就秘密地派了副司令秦润民（广西人）带了厚礼到梁园迎接。漆来古河那天，却绕道油坊集，天气正热，曹茂琮率领大小官员在邱家花园前迎候，独柏不在，原来柏早跑到离古河十里路外的油坊集去接漆了。争取漆对他的信任。

漆到任后，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对柏所谓破获“共产党地下组织”这一要案，明知戏中有戏，但由于反共目的一致，假戏仍须真唱。尤其是考虑到一旦柏走了刘子清投敌的老路，他手下三千亡命之徒，关系皖东安危。同时为了不让柏居“首功”，乃以皖东第一人身份主持审理此案。七月上旬一天上午，在古河五区专署里布置了临时法庭，漆任主任审判官，171师师长曹茂琮、九区专员赵凤藻、十纵队司令柏承君、皖东党务专员余瑶石任审判官，五、九两区各县县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中统调查专员陪审。（九区县长、书记长大半缺席）审讯中，有的开始翻案了（后据出狱人说：有人送进纸条给受审者，上写一个“反”字）；有的见柏在审判台上，仍自认是“共产党地下人员”。经过两天的审问，漆宣布：坚不吐实者，交皖东指挥部看守所看押候审；其余还押十纵队。不久，还押的人大多数被柏秘密处死；看押于指挥部的人又经审讯，全部集训后

交保释放。

## 六、蒙蒙细雨血殷殷

柏承君常说：“不杀不能建威。”杀人，是他想称王皖东的唯一手段。诚然，遭其杀害者实难数计。

定远人王耀祺，被绑在邱家花园操场旗杆上，用乱刀戳死。

东王集农民何朝恩正在田里栽秧，被柏部抓去，带到古河，未经讯问，一弹丧命。

邱家花园前后，滁河两岸，坑埋刀杀，不可胜数。

1944年农历七月初九日，细雨濛濛，李伦才、沙平怡、韦雨农、傅明、罗世华、张一林、杨寿宗、雷天鸣、刘子厚、谭文榜等二十余人，被押到巢县方山大洪岭集体枪杀。先此数日，还在含山境内圩埂上及全椒独山脚下集体杀死近三十人，其中仅有曹晓华一人以金钱贿赂刽子手而幸存。柏杀人都是秘密的。被捕家属谁也不知其自家人被杀了没有，许多人家去尸场乱翻乱找。阮业明家曾买了棺材去收尸，结果，尸体被人收完了，乃以衣冠而葬之。事后一打听，阮尚在看押中。

当日惨不忍睹，今日惨不忍书，书之亦未尽万一。

## 七、血案之余波

黑名单列名多少，局外人不得而知，当时被捕者达四百余人，受牵连者则难以数计了。大屠杀之后，血案并未了结，仍有余波，乃以全椒为重点，开始大办“自首”。

被捕入狱者，杀的杀了，未杀的，一律分批集中古河大王庙受训两星期。第一批集训约九十人，写自首书，交“组织”关系，行开释礼。由十纵队政治部主任孔繁仁主持，强迫行将开

释的人在一幅关羽居中，周仓、关平侍立的画像前，燃点香烛宣誓。誓词中有：“今后决无行为不检、言语不慎等行为。如有违犯，遭五雷击顶，不得善终”等词句、宣誓后，柏训话，并观看京剧《斩魏延》。散会前，高呼“释放后乱说者斩”的律条，然后交保释放。古河小姜村姜天柱释放后，流露狱情，不几天即遭暗害，弃尸滁河中。

释放者编成小组并协助办理“自首”事情。柏派海南屏在黄家庵关家仓房、朱心源在程家市小蔡村，分片包干、办理“自首”。挨村挨户，凡属青年壮汉都要“自首”。“自首”时，挂白布条，上写“自首”二字，照像后贴在“自首书”上，编入小组，三日一回报，并要出钱买十纵队的破枪听调，名曰“赎罪”。实则扩充其势力，仍妄想实现其称王于皖东之野心。

春耕既误，夏种已迟，白色恐怖，笼罩以古河为中心的皖东。当时古河通往肥东、和县、巢县、含山、全椒等县的大路，在这四、五月间行人裹足，一片荒凉景象。距古河二十华里的程家市，原有七个流亡县政府，茶馆酒店二十余家，每日座无虚席，此时此刻，则冷冷清清多数关门。

## 八、结束语

日本投降，战时机构取消，五、九两个专区各还旧制，柏承君部始则被整编于固镇，继则柏本人被控下狱，虽行贿脱身，逃往台湾，终被辗死于车轮之下，遗臭万年。

古河血案，范围之大，波及之广，刑具之酷，受害之众，实所罕见。事隔四十余年，历者见者，尚有不少人健在，本文所记，仅具轮廓，希望知情者有所提供，尤期邻县知情人士，开展协作，相互交流，集中资料，辑成专辑，以全史实。

# 北极阁今昔

吴 坪

全椒县城北郊有座高丘，人称“北极阁”，因清代曾在此建有一“阁”名“北极阁”而得名。历经战乱，原来的古阁早已荡然无存，剩下一片荒岗，后人一直还称它“北极阁”。

原“北极阁”又名元武阁，亦名玄武阁，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叔祖父吴勖（字大力，吴国对的次子）于清康熙年间倡建。此阁甚高大，可和当时的“尊经阁”（即国光楼）媲美，是吴氏故居北面最高处的一大建筑。

吴敬梓出生在全椒一个科第仕宦名门世家。他的曾祖吴国对，清顺治戊戌年中第一甲第三名进士（即探花）。他的五叔祖吴昺，清康熙三十年中第一甲第二名进士（即榜眼）。吴氏家门的景况，正如吴敬梓在他的《移家赋》里写的，“五十年中，家门鼎盛”。吴氏故居探花第就建在北极阁南面，范围甚广，正宅约十进，前门至河弯街肆，后园达高丘下的州门涧（即后坝）。园内有“赐书楼”、“文木山房”、“遗园”。这些地方（连“北极阁”在内）正是吴敬梓少年时代读书游乐的所在。吴氏故居在兵燹中被毁，但其残存的遗迹还依稀可辨。探花第门前立旗杆的“石鼓子”至今还在。北极阁下，古建筑用的筒子瓦残片及墙砖迄今还偶有发现。

据民国《全椒县志》载：“北极阁，北门外，吴勖倡建，南与笔峰相望，雕甍画栋，秀出林表，邑人士游燕，称盛一

---

本文作者现为全椒县政协委员

时，咸丰兵燹毁。其遗址尚存，址高丈余，广数丈，皆巨砖甃成。民国三年大旱，游人拆砖窃售，有司之不禁。二百年之遗迹，一旦荡然。”

古阁被毁后，清末这座高丘上下，竟成了地方兵勇练武的场所。因此从前当地人还称过这里叫“走马岗”或“马道子”。民国以后这里一片荒凉，到了一九三一年，周崇颐任国民党全椒县长时，把北极阁高丘上种上了一行行松树。以后杨中明任国民党全椒县长期间，又在丘下种了些桃树，使这里又呈现出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抗日战争爆发，全椒县城两度沦陷，新四军领导下的抗日人民武装，时常在这一带活动，伺机袭击日寇。驻城日军为清除城郊四周障碍，强迫民伕将这里的林木砍尽。以后，北极阁荒丘逐渐被垦为一片岗田。

如今，登上这座高丘，极目远眺，南有凤台，西有独山，玉屏山绵延于西北，花山起伏于北方，彼此遥相呼应，皆隐约可见。一条清溪（即州门涧又称“后坝”）从高丘下缓缓东流与襄河相通。溪水常年清澈，两岸垂柳拂水，清风徐来，微波荡漾，游鱼来去，宛如与水中倒影相嬉戏，妙趣不尽。两片翠竹林，分布东西两侧将北极阁环抱其间。稍往前看，襄河穿积玉桥朝东流去，“国光楼”矗立于襄水北岸。城内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街道两旁绿树成行。居高临下，仔细观赏，全城景物，四野风光，尽收眼底，着实令人心旷神怡。

由于北极阁与吴氏家世有关，是吴敬梓少年时代就曾研读“四书”、“五经”，渔猎“诸子百家”，爱读野史笔记，博览群书，谓为“书淫”的历史见证。尤其它四周环境幽美，在全椒城厢莫过于此，因而领导决定将“吴敬梓纪念馆”兴建在北极阁高丘上。“纪念馆”工程在县领导重视和全县人民支持之下，并得到我县旅居外地有关人士的关心和赞助，进展迅

速，即将竣工。古朴典雅之厅堂矗立于高丘顶上，芬芳秀美之花木点缀在庭院其间，恬静幽雅，引人入胜。北极阁当年游人不绝，称盛一时的盛况又将重现，而成为人们向往的游憩胜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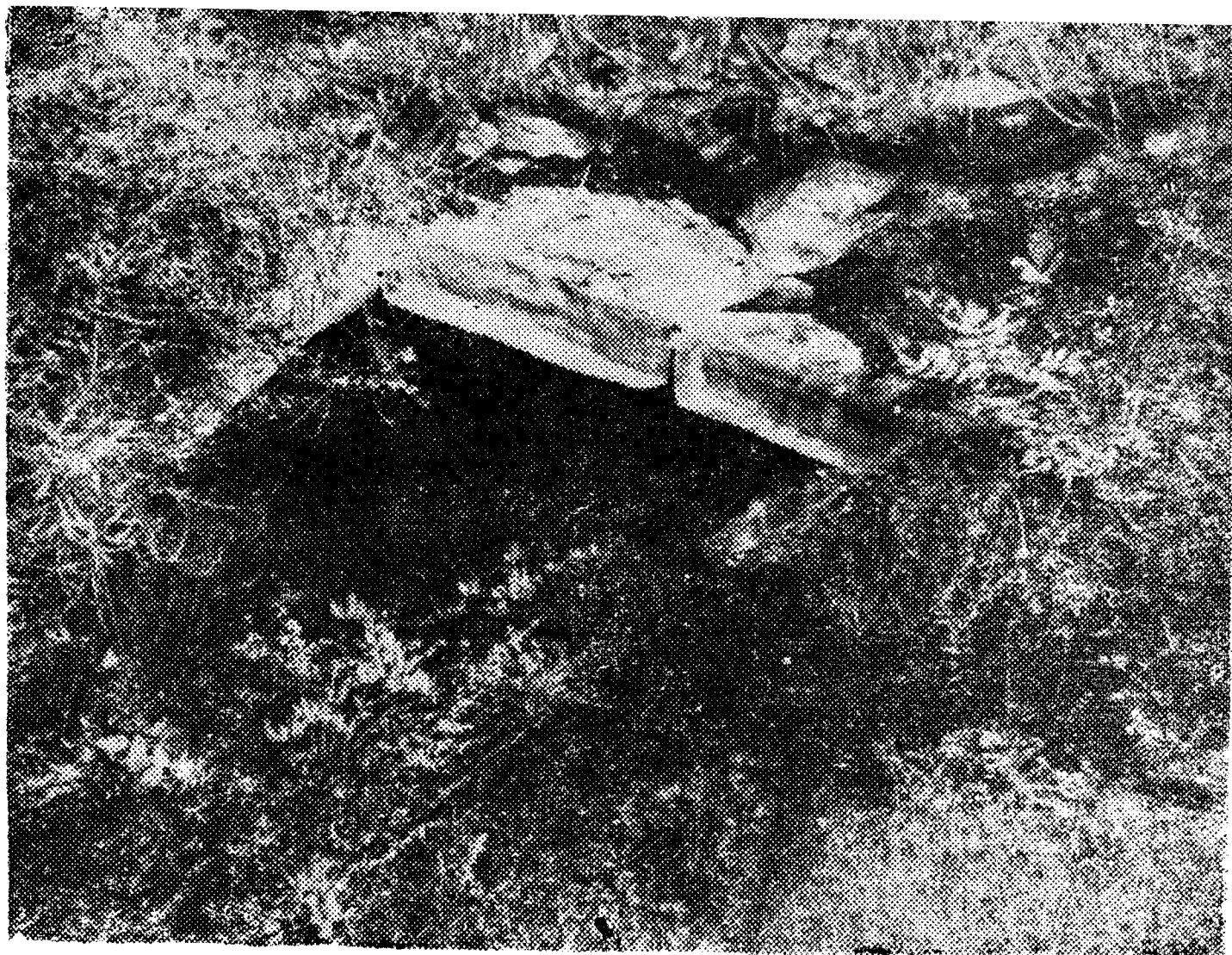
怀海外堂兄东原、南原

王尊山 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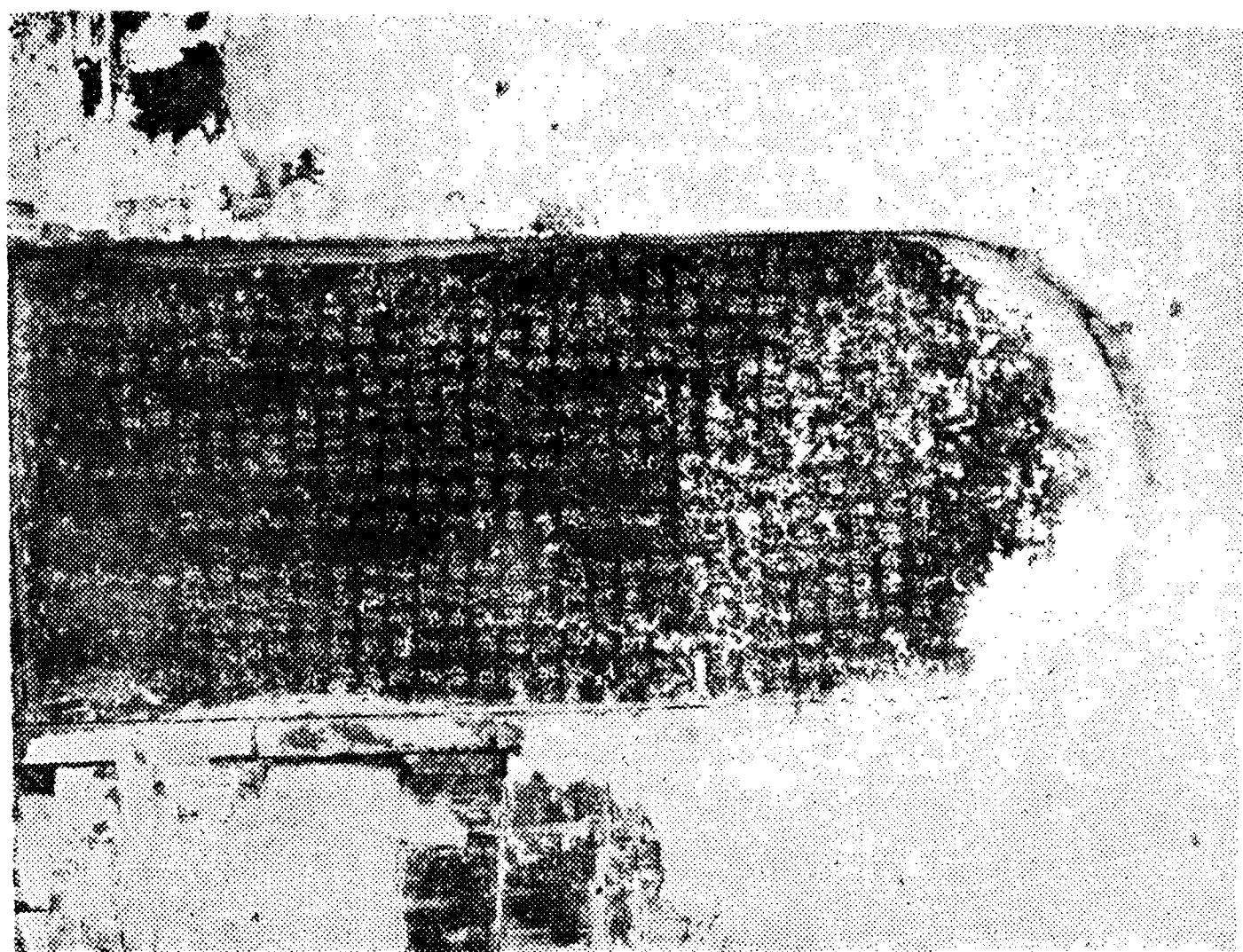
东西球不见，  
一别三十年。  
心头多少事，  
只有梦中牵。  
祖国无限好，  
侨策益善全。  
何时赋归来，  
同沐舜尧天！

（作者生前为县政协委员）





白石泉



嘉靖年重修神山寺碑记

# 史迹话神山

叶 松

全椒神山，唐代，山中有一道士（即有道之士人），不知姓名，居神山洞中，不食烟火，尝煮白石（俗名观音土）为餐，故称白石道人。有文才，常与太守作方外游。唐滁州太守韦应物曾寄以诗云：“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神山中有神山寺。全椒县志载：“神山寺建于大历年间”。按大历为唐代宗晚期年号，共十四年（公元七六六至七八零年）。而韦应物于德宗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年）出刺滁州，时神山寺当已建成，白石道人当为神山寺之主持，亦为该寺之创建者无疑。于诗可见，道士常去滁为太守客，韦应物亦曾来神山作方外游。故后人立祠于寺旁，以为志念。旧志云：“韦公祠，在神山寺右，祀唐韦应物，今圯。”

五代末期，后周皇帝柴世宗（柴荣），冀图统一中国，于即位之当年（显德元年，公元九五五年），首先对南唐（都金陵，今南京）用兵。世宗命李谷统十二军进攻南唐之寿州。东正阳一战，南唐军大败，死万余人，周军遂克寿州城，继向淮南推进。后周大将赵匡胤率大军进抵全椒境。

赵匡胤抵达全椒后，安营于神山。神山位于我县大山南部山高谷深，进可攻，退可守；既扼卢州、金陵之要冲，又东可进取滁、扬。且山中有神山寺，屋宇宽广。赵匡胤屯营于此，实

---

本文作者现为县政协委员

有军事见地。

次年，（显德二年，公元九五六年）周世宗亲征淮南，拟全力围攻南唐江北门户之滁州。柴世宗驾临前线神山寺营地，命赵匡胤由寺北，沿北山（今花山）进抵滁境清流山，配合他军围攻滁州城。显德三年，柴世宗登清流关督周师与南唐军决战于清流山下，赵匡胤大破南唐李景十五万大军，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外，遂克滁州城。是故，旧县志‘神山寺’载：“宋太祖经此，从背山之侧破滁。”

因神山古迹名胜甚多，国家文物局在《中国名胜词典》中将神山列为中国名山之一，安徽省将神山寺列为佛教名寺之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神山位于县城西三十里，草庵乡北部，由数条山梁与三条山谷组成。山高谷深，林壑优美，层峦叠翠，石障磷珣，山泉潺潺，鸟语喧喧，奇花异草，山珍野味，不一而足。松柏出于岩隙，修篁充于山坳，梨李植于溪畔，獐、獾、狐、兔、雉，出没于林野。且有药材、葛藤、蘑菇、萱草（黄花菜）、竹笋、山楂、山茶、鱼、鸟、花卉之利。沃草广布，宜于放牧。如开发山区经济与旅游事业并举，实为良图。按神山古迹名胜，其景有八：

仙人洞：神山以多岩洞著称，有白石洞，仙人洞、菩萨洞、团山洞等。白石洞距寺东南里许。山川志云：“白石洞，又名百十洞，小洞联缀。”仙人洞在寺西四里八道涧下之山腰中。旧志云：“仙人洞在神山西，上有石门，循磴而下，广一丈，高三丈，深五丈许；后渐小，仅容一人卧。相传过此，又复宽广。石壁有泉涓涓滴，足够一人用；下生石盘接之。亦异境也。”戚贤诗云：“春雨初晴春树新，病夫乘性到山岑。白云间锁仙人洞，漫忆当年煮石心。”据此，该洞为我县一大石灰岩溶洞，极其深邃，宽狭不一。内中石钟乳、石笋、石幕等，天

工巧凿，形若仙境，故名。近人入探，据其所述，余以为千百年过后，溶洞之发育更臻完美，已超过志载之规模；况前人未敢深入探索，故不能尽述其奥也。

白石泉：西洼中，有泉泻于大石岩下，翁然仰出，清冽见底。各色苔藓，光怪陆离，映人眼目，自觉清凉无比。以白石道人常饮此泉水得名。其下游涧阔溪深，多鱼类，适宜垂钓。

大雄宝殿：该殿为神山寺建筑群之主体，高大雄伟，结构奇特。现存明碑四块，可证为明代重修。殿内莲花柱基，据考证为唐代之文物，足资证明该寺始建于唐。全寺依山势而建，三进三阶层，居高临下，巍为壮观。庙门为两层楼房，循阶而入。楼殿间两庑迴廊均完好。后殿为观音阁，毁于火灾。大殿左右为藏经阁，阐房、斋室，均毁于兵燹。

龙文石刻：由于宋太祖屯营，周世宗亲征，两朝圣驾幸临，宋人于大殿白石阶上，建立龙文浮雕。三条巨龙栩栩如生。惜为红卫兵所损。

柴王碑：为纪念柴世宗，后人于寺后山崖壁上镌立柴王碑，已早蚀。后人补刻又蚀，因石灰岩易于风化，故痕迹模糊。

柴王井：当年建寺时，凿石汲水之大石井，亦命名为柴王井。惜井栏石刻已无存，易以新栏。该井在寺内，地势虽高，而井水极富。石照远诗云：“诗篇传刺史，石井话柴王。”

龙鼻：寺后柴王碑崖脚下，有一小泉，甘冽不外溢，终年不涸。以其形小似鼻，为纪念两朝皇帝，故名龙鼻。

神山石塔：寺前路旁山陬，曾有七级石浮屠一座，现仅存巨石塔基，可想当年之雄伟壮观矣。

赞曰：名山名寺，名不虚扬，风景优美，史迹丰藏。资源丰富，供尔暇觞。

## 征 稿 启 事

《全椒文史资料》第一辑，现已与读者见面了。为了开辟史料积累、研究的新领域，用大量正反两方面真实、具体的历史资料，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会不断编辑、出版续集。希我县各界人士踊跃投稿。特别是我县旅外同乡投稿或提供史料线索，更为欢迎。

稿件所写史料，应为从戊戌变法（1898年）到“文革”以前（1965年）这六、七十年间的我县近代、现代历史资料。史料范围可包括政治、军事、工商、经济、科技、卫生、交通、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华侨以及风俗人情、山川变化等方面。

文稿力求叙述一人一事，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出当时历史面貌。稿件务请誊抄清楚，写明作者姓名、所在单位及联系地址，直寄政协全椒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来稿一经采用，即付给稿酬，如不刊用，也酌给笔墨费。

政协全椒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



神 山 寺



井



积玉桥

全椒文史资料(第一辑)

编辑：政协全椒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印刷：全椒县印刷厂

出版日期：1985年10月1日

安徽出版总社  
皖非出字(85)2050号